



周恩来政论选

下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七大开幕演说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逼近胜利的今天，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地开幕了。我在此，预祝大会的成功！

从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七个年头。在这两个大会之间的十七年中，我们党经历了国际、国内、党内多次的重大事变，走过了千辛万苦，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锻炼成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是一个很强大的很有能力的共产党了。

我们党现在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多党员，比起六大时候的党员，已经大了三十多倍。在全国最重要的地区，都有了我们党的组织，有了党的报纸，有了广大群众的关系。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真正群众性的政党啊！

我们党现在领导了中国解放区的九十一万多正规部队，二百二十多万民兵，近千万的人民自卫军，而在六大时候，我们才只有散在各地的数万农民游击队。经过这十七年的战争，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为中国人民锻炼出一支永远打不败的人民的军队了。

我们党现在在敌后建立了十八个解放区，连陕甘宁边区共十九个，解放了九千五百五十多万人口，组织人民选举了自己的民主政府共九百一十五县。而在六大时候，我们才只有极少数几个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县区政府。经过这十七年的奋斗，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为中国人民在大块土地上，建立起永远推翻不了的人民的政权了。

这样的党，是怎样锻炼成的呢？

在二十四年的历史中，我们党是从永远不息地反对国内外敌人的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从永远保持群众的联系中锻炼出来的；是从永不放下武器以保护人民利益的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从不断地反对民族中反动的思想和派别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从长期地反对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从勇敢地实行自我批评中锻炼出来的。

二十四年来，我们依靠了什么力量锻炼成的呢？

我们依靠了全党同志的努力奋斗。

我们依靠了数十万党内外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

我们依靠了上万万人民大众的共同奋斗。

我们依靠了国内民主党派的合作和国外进步人士的同情。

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

同志们！这是快要胜利的党啊！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将保证顺利地引导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

我们号召全中国人民，全中国民主党派，全中国民主分子，我们愿和他们一道，为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奋斗到底！

我们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进步的人民，我们愿和他们一道，为消灭世界法西斯主义及其最后残余，重建世界民主和平，奋斗到底！

我们在此警告国内外一切不愿意承认或不重视中国共产党这种代表人民的力量和意见的人们，如果他们仍要继续这种态度下去，他们将不能解决中

国任何问题。

同志们！我们的面前困难还多，但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革命完全胜利的路程还长，但我们一定要把它走完。

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

消灭日本侵略者！

抗日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同志万岁！

为英国《新闻纪事报》写的文章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中国共产党愿望他们与中央政府间的纠纷和平解决。不幸，共产党遇到严重的困难。甚至谈判处于高峰之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已命令各战区司令长官“剿匪”（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匪）。政府军队在恢复交通和解除日军武装的掩饰下，深入解放区，实际上是对抗日的军队作战。共产党军队起初忍让以待政府与他们之间的分歧用政治解决，但最后被迫自卫。

美国正运输国民党军队至各战略地点，为他们登陆作先遣，替他们巡逻铁路，扩充物资和财政的援助，甚至直接参加军事行动。中国人民觉得他们的同盟国不应干涉他们的内政。同盟国应让他们依据大西洋宪章的精神，民主地决定他们本同的问题。整个中国必须有一个民主的代议性的政府。但是没有和平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不取消在全国扫荡共产党的命令的话，中国就不可能复员和恢复。

注 释

大西洋宪章，参见本书《九一八十年》一文注 。

关于国共会谈的经验教训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

从这两个时期的商谈 经验中，可以看出多年来两党的对立，要求得一个协议是怎样的困难。因此我们觉得，从痛苦的经验中能够得到一点教训，来供这次政治协商会议诸位参考，或者比之空论过去较为有益。现就商谈中得到的四点经验教训，特向各位陈说：

第一点，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既然商谈了，就是要政治解决，也就应该互相承认，不应互相敌视，尤其是商谈的双方代表，更要常常保持这种态度。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出一位在抗战前半期奔走团结而故去的国民党朋友张淮南 先生，应该对他表示纪念。彼此承认不可敌视，不但两党当事人应该如此，就是两党党员也应该如此。中共方面有这样一个信念，不管冲突怎样严重，我们对于已经承认了的并不改变，举几个主要的说：（一）我们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今日中国所必需，我们承认，我们拥护，而已在我们自己的工作的区域内努力求其实现，决不因为冲突而抛弃自己已经承认的信念。（二）我们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不仅在过去抗战的八年中，在抗战胜利以后仍然如此，这在民国三十一年中共七七纪念宣言中就提到此点，这句话，相隔四年多，现在证明了。（三）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我们始终尊重国民党在历史奋斗中得来的地位。（四）国民政府虽然是国民党一党统治，且到今天为止还是一党的政府，但是我们既然合作，所以从民国二十五年底以来，就没有不承认国民政府，也没有任何时期想推翻国民政府，而只是要求改组政府。只要看自抗战以来敌后的民主政府是地方性的，始终没有树立另外一个领导的中心政权，就可以证明。就是去年解放区筹备召开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也只是解放区人民的联合组织。这些承认，我们认为很重要，有此承认，可以证明不是敌视，而且是建立政治解决的基础。因此，我们同样要求国民党方面给我们以应有的承认，如我们过去所常提到的，中共合法地位问题、陕甘宁边区及其他解放区问题、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问题，因为承认是一事，承认了并不等于这些部队就不能整编，这些地方政府就不能改选。

第二点，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既然是政治解决，就是要互相协议，而不是一方面决定了，通知别方面去做，这样是无法求得解决的。此次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对于这一点若能处理得更好，一定可以树立起一个协商的楷模。过去许多纠纷，常因不能互相协商，徒然引起更多隔阂，树立更多障碍，朋友间处理一件事尚不能如此，何况两党的事，关系国家人民的事！我们希望，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对于国家人民的大事，能在协商的空气中求得解决。

第三点，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既然政治解决，总是要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既然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那么两党之间，各方面之间，有什么不可以让步的？不错，立国的原则，像今天中国所需要的三民主义、民主国家制度，这些是不能让的，没有这种准绳与方针，就不能谈到合作。不过在这种大前提下，许多具体问题应该力求互让。如同过去所争执的军队问题、地方自治问题、人民权利问题，都应该在立国方针和制度之下，求得互让解决，

不应要求独霸。有人说：你们只向政府要求民主权利，你们中共所领导的地区怎么样呢？我们诚意地回答，凡是向政府提出的，保证在我们活动的地区，不仅是同样实行，而且愿首先实行。假如我们实行得不够，愿意接受各方面的批评，谋更好的改革。假如大家不信，我们愿意欢迎任何人去考察、参观、指教。尤其欢迎因抗战而流亡在外的人士全部回乡，因为他们是那些地方的主人。

第四点，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我们觉得既是政治解决，求合作，那么两党也好，各方面也好，总有些意见不同，应该在工作上竞赛，在地方上努力，而不是说你做好了，我不高兴，或者这一方面做好了，那一方面不高兴。因为好的事情都应该欢迎，不管行之何方，出之何党。

只有这样，中国人民的力量，民族的精华，才能不互相抵消，才能有益于建国。

以上四点，是从九年来双方商谈中得来的痛苦经验与教训，虽似泛论，但很希望各位先生和全国人民了解，这是一种由衷之言。我们诚恳希望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能够认识到这方面。

注 释

两个时期的商谈是指国共两党在抗战开始之前和抗战胜利之后两个时期举行的会谈。在抗战开始前的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国共两党代表举行了会谈。通过会谈，实现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至十月上旬，为了停止内战，和平建国，国共两党的代表再度举行会谈。这次会谈结果，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十二条，但墨迹未干，国民党政府便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新的内战。

张淮南，参见本书《国内问题应迅速解决——致蒋介石》一文注 。

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

诸位先生：在政治协商会议 之后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我们曾寄以很大的希望，但二中全会的结果实令人失望，因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国民党内为数不少的顽固派利用二中全会通过了很多重要的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这不足为怪，而可怪的是这两个会议的决议既如此相反，却都是在蒋主席主持和领导之下通过的。

一、关于保障人民权利问题。在政协开会时，蒋主席曾作了保障人民权利的四项诺言，但在政协开会后，就连续不断地发生了沧白堂打人、较场口事件，捣毁新华报馆、捣乱西安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一直到捣乱执行停战决议的北平执行部事件。这许多事件至今没有一件得到解决。如言论、出版的自由问题，限制言论自由的法令名义上虽已废止，但实际上仍限制重重，并且采用了极不平等的限制办法。像中共在北平出版的《解放》三日刊受到非法的禁止，而别的新出版的报纸在上海则得到许可。又如释放著名的政治犯，除叶挺、廖承志外，不论中共或其他党派及无党派被捕的人和青年学生，至今仍毫无消息。现在的政府仍然是国民党一党政府，这些违反保障人权的事件，国民党负有责任，但二中全会对这些问题一字未提，所有决议案中，没有一字谴责这些妨害人权的罪恶行为。

二、关于改组政府问题。改组政府是件大事，究竟是否结束训政走向宪政，在此过渡期间成立举国一致的各党派合作的政府，二中全会无明确态度。它不仅避开结束训政不谈，反而要把各党派推选的国府委员拿到国民党中常会去选任，这是完全违反政协决议的。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到二中全会后将要“恢复”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性质，很可能“恢复”到从前指导国民政府的政治委员会去。果如此，国府委员由国民党中常会选任，中政会又要指导国民政府，这说明政府仍是一党的政府，决不是民主的各党派合作的政府，与政协会议、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全国人民以及友邦的期望完全背道而驰。

三、更重要的是关于宪草问题。宪法关系中国今后是民主或仍是一党独裁的大问题。政协修改宪草的原则是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全体起立通过的，对这些原则如有任何变动，一定要经过政协各方代表的一致协议。国民党内有些人特别指责宪草修改原则不合于五权宪法。我们且不说这些修改原则是在蒋主席主持下，经政协代表（包括政府代表在内）全体起立赞成通过的。即从五权宪法本身来说，五权宪法，第一是主张五权分立，孙先生是反对中央集权于一人或一院的。第二是地方均权，某些权应归中央，某些权应归地方，故孙先生主张实行省自治并得制定省宪。可见政协的修改原则是与孙先生的五权宪法原则完全符合的。至于根据这些原则如何规定政府组织，那就要因时间与条件而定，过去的办法不一定适合现在。如说孙先生遗教的一个字也不能修改，那么，国民党今天所做的，就违反了建国大纲。根据建国大纲的程序先实行县自治，然后实行省自治，在全国有过半数省自治后，才可以召开国大，实行宪政。现在政府并没照这程序做，可见政府的组织程序是可以变动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与国民党协商。为了减少国民

党内主张民主和平团结统一的人士在其党内所遇到的困难，最近各方又商得了三个协议。但这种让步，反而增加了顽固派的嚣张。二中全会对于宪草通过了五点修正原则，所增加之两点半关系至大，其目的就是推翻政协修改宪草的原则，不受政协拘束。另外，吴稚晖先生又提出了三点反对意见，立即在二中全会上成为决议。他主张“五五宪草”，政协协议事项，二中全会决议……

并提交国大参考，这是与政协决议完全相反的。按政协决定，只能将宪草审议委员会的修正案提交国大，并无其他，国大代表个人虽自由，但各党派要负责约束其自己的党员，使这个民主的宪草得以通过，这样，包括十年前一党包办的旧代表的国大就不是重要的了，重要的还是要保证能通过一个真正民主的宪法，所以在国大问题上，各党派曾向国民党作了极大的让步。但今天，国民党却想利用各党派承认的国大，反转来反对政协决定的宪草修改原则，来动摇民主宪法的产生。这种违反民主的做法，是任何人不能忍受的。

四、国大问题。国大代表中地区代表还未最后确定，国大组织法也还没有修改，根据政协决议，国大的职权只限于制宪，而宪法要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才能通过，但国大组织法如再迟迟不改或改而不当，就很有可能被利用，只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就可以通过决议，来做更多其他不利于民主的事情。这样，将来的国民大会就会更便于做一党专政的保镖。

五、整军问题。在政协会议中，军政部次长林蔚氏报告，政府军队现有三百八十万，要减到一百八十万，编为九十师。但在二中全会中，同一人的报告则说政府军队及机关学校现有四百九十万，将来只减到三百四十七万，仍编九十师，这和政协报告中的数目比较，多出了一百六十七万。即去掉机关学校，仍然会多出很多，那就是所谓兵工总队，成为正规军的后备队或补充队。这是违反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中复员计划的，因这既不能减少国库开支，且将保持额外的一部分队伍，完全与复员精神相反。

六、停战问题。国民党二中全会在宣言上要求中共部队即速停止继续攻袭，但实际上究竟是谁不遵守停战命令[21]实行继续攻袭？只要听到方才林、郑两位[22]关于广东、湖北情形的报告，就很清楚了。在山西，任何人都可看到，太原、大同的日军到现在还没有被解除武装，因为阎锡山氏[23]还在利用他们攻打中共和解放区的军民。在华北、华中其他地方，继续进攻和蚕食中共地区的村镇的事，还在不断发生。

关于东北的情形，马歇尔将军[24]在两个月前曾提议派遣执行小组去东北调处军事冲突，当时我们立即赞成，政府却在最近才同意了那个提议，可是又发生了执行小组的任务问题。我们曾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无条件派遣执行小组去，立刻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并调查当地实际情况，把问题带回来提供三人会议[25]解决。另一个更好的办法是先在重庆谈判关于军事、政治问题解决的一般原则，然后再派遣执行小组根据已经谈好的原则去具体执行。这两个办法，都还没商得结果。我们向来主张东北的内政与外交问题应分开解决：外交问题，过去一直是政府负责的，现在依然如此；但是内政问题，大家都有责任，必须用政治方法和平解决。这不仅仅是中共的意见，这也是其他民主党派和东北人民的意见。

以上所说的绝大部分，都是国民党二中全会所表现的。国民党内顽固派有意识地破坏政协整个决议，并不奇怪。但是，亲自主持政协的蒋主席，竟

使顽固派的要求得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通过，实使我们奇怪。虽然，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中也有表示要执行政协决议的话，但是容许了上述反政协的决议存在，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前一可能。同时，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又着重于反共，说中共如何如何。中共愿坚决实行自己签了字的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也愿意朋友们善意地（而不是恶意地）来督促我们。但是我们要反转来问问国民党朋友，你们一方面要求人家来做，另一方面又把违反政协决议的东西写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上，这不能不说其中包含了欺骗。骗什么呢？就是想模糊过去。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各党派参加了政府，国大开成，宪法照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要求通过，中国不就是“民主”了吗？！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受骗，也决不去骗人民。我们要向人民说真话，谈实事，一定要先弄清楚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定是想做些什么？这不是一人或一党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欺骗老百姓的问题。我们不能把没有完全和平对人民说成有了完全和平，还没有民主说成有了民主，还没有稳定说成已经稳定。

我们同意马歇尔将军说的：中国在今后几个月内，将是一个极严重的时期。照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发展下去，将会更加严重，不能像某些国内外舆论那样的乐观。但情势不是不能更改，这须要全国人民的努力，友邦的帮助，特别是政协各方代表要努力来维护政协决议。

此外，亦如马歇尔将军在华府招待记者席上所说：国民党当权一派，不愿把大部分权力交出来。其实政协决议并未要求国民党交出大部分的权力，只是要求人民能有自由权利，如各党派在政府中能有充分代表性。现在国民党无论在中央政府，在各省乃至在国大，仍占第一大党地位。可是就是这一点点民主，顽固派还是不愿意让人民享有，只是压迫和打击人民与其他党派的民主运动。而且照杜鲁门总统的声明[26]及三国外长会议公报[27]中所指的内容来看，也可见政协决议还没有达到那样的民主要求。现在军队整编统编方案是有了，但是组成一个有充分代表性的政府仍未做到，就连政协决定的这样一点点民主，国民党还不愿实行，还要由国民党中常会来选任国府委员。

因此，我觉得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28]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对三人会议关于停止冲突与军事小组关于整军方案的协定，也是一样的。人权若无保障，就无法改组政府成为真正的民主合作的政府。修改宪草，各党派如不受约束，如不照五方通过的修改原则制成修正案，国大一定开不好。

军事冲突，若不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下来，和平也无保障。

我们要求的是一个真和平、真民主、真稳定的中国。

我们愿号召全国人民、盟邦朋友、各党派朋友，一致来拥护并监督政协全部协议的实现。特别希望国民党内主张民主团结的朋友，在蒋主席领导之下，来纠正和推翻党内这种反政协的企图。且这种企图现在已成为决议，快要实行了。我们应提醒国民党的朋友，因为国民党对今天的政治是负有最大的责任的。由于这一缘故，在国民党二中全会闭幕之后，来做这一声明，是有必要的。我们不愿蒙蔽舆论，而愿诉诸舆论。

注 释

[1]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在重庆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从一月十日开始，至三十一日结束，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决议，合称“政协决议”。

[2]蒋介石的四项诺言是：（一）保障人民自由；（二）保障各党派合法地位；（三）实行普选；（四）释放政治犯。

[3]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重庆各界人民组成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每天在沧白堂集会，邀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进展情况。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派遣特务捣乱会场，殴打会议主持者及与会群众，跟踪、威胁到会讲演的政协代表。[4]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重庆各界二十多个团体的群众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打伤李公朴、郭沫若及新闻记者六十多人，这就是较场口事件。

[5]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特务操纵重庆沙磁区部分学生举行反苏游行，并乘机捣毁《新华日报》、《民主报》（民主同盟机关报）的营业部，打伤两报工作人员多人。随后，《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也被特务捣毁。[6]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国民党特务在西安煽惑部分学生举行反苏游行，并乘机袭扰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

[7]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平以“河北难民还乡请愿团”名义，纠集逃亡地主、特务、流氓等于余人，举行反共游行，骚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8]叶挺，参见本书《论统一战线》一文注[51]。

[9]廖承志（一九〇八～一九八三），广东惠阳人，生于日本东京。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1933年3月被国民党逮捕，经营救获释，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2年参加领导中共南方工委的工作，5月被国民党逮捕，1946年1月经中共中央营救出狱。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后补中委，在中共八届至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他是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0]孙中山在所著《建国大纲》中，把建设民国的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按孙中山的设想，训政时期需由政府选派考试合格人员，协助各县筹备自治，即进行县政建设和训练民众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在达到规定的标准后，始能实行县自治。一省全数县已实行自治时，始可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全国过半数省份开始实行宪政时，才能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市宪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长期以训政为名，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实行法西斯统治。

[11]国民党反动派力达到一党专政的目的，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公布的“训政纲领”中规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责“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决定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各院院长及各政务官的人选。

[12]政治协商会议规定的宪草修改原则的主要内容是：“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立法院对行政院有同意权与不信任权，“监察

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同意、弹劾和监察权。“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得制定不与国宪相抵触的省宪。

[13]五权宪法是孙中山提出的实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制度的宪法原则。

[14]建国大纲，是孙中山一九二四年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见《孙中山选集》第569—571页。

[15]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在政协综合小组会与宪草审议会协商小组举行的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在宪草修改原则问题上作了让步，商得了三个协议：一、无形国大改为有形国大；二、政协商定的宪草修改原则第六项第二条条文取消（这一条文是“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再提请解散立法院”）；三、省得制定省宪改为省得制定省自治法。

[16]为了维护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了推翻政协商定的“宪草修改原则”的五项决议：一、“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根本之依据”；二、“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集中开会之方法，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之职权”；三、“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四、“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五、“省无须制定省宪”。这里讲的“所增加之两点半”，指上述五项决议中的第一项、第四项和第二项的“用集中开会之方法，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之职权”。

[17]吴稚晖（一八六六～一九五三），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贯支持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坚决反苏反共。

[18]五五宪草，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宪法草案》的简称。这个“宪草”的主旨是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

[19]国大，参见本书《论统一战线》一文注[62]。

[20]整军方案，即国共双方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签订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全文共八条，主要内容是规定全国陆军为一百八个师（每师不超过一万四千人），其中中共部队十八师；双方编余人员应在十二个月内全部复员；此外还对国共双方部队的统帅权、统一编制的时间、地区配置以及地方部队的组织等作了规定，并确定以军事调处执行部作为实施本方案的执行机关。

[21]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同日下午下达了停战令。停战协定和停战令规定，双方军队应在一月十三日午夜就各自位置停止军事行动。但蒋介石在下达停战令的同时，密令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接着又不断地调动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同年七月蒋介石公开撕毁了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22]林，即林平（现名尹林平），当时任广东东江抗日纵队政治委员。

郑，即郑绍文，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江汉军区政治委员、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处长。

[23]阎锡山，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7]。[24]马歇尔（一八八～一九五九），美国职业军人，政客。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驻中国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离华回国。

[25]三人会议又称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是一九四六年一月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马歇尔参加组成的停战机构，马歇尔担任主席。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各地执行小组都受其领导与指挥。由于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政策，蓄意破坏停战协定，美国又执行助蒋内战政策，同年六月以后三人小组会议停止活动。

[26]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美国竭力主张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全国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他们在国民政府内得享有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美国政府认为此举就需要修改……一党训政制度。”

[27]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二十七日发表会议公报。公报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问题上提出：“在国民政府领导下有一团结的与民主的中国之必要，并且必须广泛地吸收国内一切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各级）机构中。”

[28]五方面代表，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五个方面的代表。

“四八”烈士永垂不朽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

若飞[1]！博古[2]！希夷[3]！邓发[4]！黄老先生[5] 以及一切遇难的中美朋友、同志和扬眉[6]！你们集体牺牲，你们已成了“四八”烈士。

十天过去了，沉重的十天！沉痛的心，悲愤的泪，残酷的回忆，还有，你们遗留不来的沉重的担子，抑压得我们还只在默默无言中悼念你们。

二十多年来，成千成万的战友和同志，在共同奋斗中牺牲了，但没有一次像你们死得这样突然，这样意外。突然的袭击，意外的牺牲，使我们更加感觉到这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二三十年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奋斗生涯，已经把你们锻炼成为人民的英雄，群众的领袖，青年的导师和坚强不屈的革命战士。你们中，像若飞等七位同志，都经过一二十年共产党的教育，已成为久经考验永远忠于人民事业的党的优秀领导者和党的骨干。你们是中国人民的瑰宝，你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现在竟活生生地把你们从我们中间夺去，从中国人民中间夺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不幸！这是中国人民的最大不幸！

抗战胜利后，若飞等同志为中国的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事业，努力奋斗，奔走呼号，从未息止，双十国共会谈纪要[7]、政协五项决议[8]、停战协定[9]、整军方案[10]，直至三月二十七日的东北停战协定[11]，都有着若飞同志的共同筹划以及其他同志的后来参加。尤其近两月来，为保障人权，为保护政协五项决议，为坚持宪草修改原则[12]，为反对破坏停战协定，若飞、博古两同志更站在斗争的前线，与一切破坏分子的反动阴谋作最坚强的搏斗。四月八日飞回延安，也正是为保护政协决议、坚持宪草修改原则而向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的，不幸竟遭大难。你们是为国奔波、为人民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口气的。你们的功绩，在人民历史中，将永垂不朽！你们的精神，激励着千百万群众、党员向着你们的奋斗目标，补上你们的岗位前进。

如果没有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也就没有你们这次冒着恶劣天气飞回延安的必要。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协决议、停战协定和整军方案的实施，是决不会顺利的。中国人民为求和平民主的实现，已付了极大代价，没料到还付上这样惨重的代价，并且还未付完；反动派正在改组政府、召开国大和接收主权等表面文章后面，进行着更大的独裁、分裂和屠杀的阴谋活动呢！烈士们！同志们！你们的责任已尽。我敢向你们保证：有中国人民在，有中国共产党在，有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力量在，我们决不让反动派破坏政协、破坏停战、破坏整军的阴谋活动成功。你们坚持的方针，是全中国人民的方针。和平、民主终必会在全中国实现。

若飞！你最后一夕话，是为中国人民及其代表所受到统治者的压迫鸣不平的。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万万以上的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已经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思想领导下永远不会离开他们的。我们要为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世纪奋斗到底！

博古！你是为修改宪草而粉身碎骨的。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坚持完成一部民主宪法、建立民主中国而奋斗到底！

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

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一出狱，你就要求重新入党。一见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难同志，检讨皖南事变[13]，要我交涉继续放人。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保护人民队伍和释放一切政治犯而奋斗到底！

邓发！你是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最后，你为中国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同时也是为世界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建立了光辉的成绩。但是这成就刚刚开始，你竟一去不返。为继续和发扬这一成就，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中国和世界的职工联合运动的彻底成功而奋斗！

一切飞延遇难的中美朋友、同志！你们每一个人的优点和成就，都是人民中的希望。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我们要继续你们遗留下来的为人民教育服务、为革命工作努力、为培养革命后代而自我牺牲、为努力中美合作而奋不顾身的精神，并把它们永远坚持下去。

我们要将一切悲痛化成团结的力量，向一切反动派搏斗！

和平民主，就是你们的旗帜！“四八”烈士永垂不朽！

注 释

[1]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黄齐生等都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的烈士。

王若飞（一八九六～一九四六），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发起组织少年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以后，历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等职。一九二八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一年回国，在绥远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狱中坚持革命斗争。一九三七年夏出狱后历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中共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等职。一九四四年五月任中共代表参加国共谈判。在党的第五、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

[2]博古，参见本书《论统一战线》一文注[23]。

[3]希夷，即叶挺，参见本书《论统一战线》一文注[51]。

[4]邓发（一九一六～一九四六），一九二二年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省港罢工和东征战役。一九二七年参加广州起义。一九二八年后历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组织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长征时任军委二纵队副司令员。一九三八年起历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民运委员会书记等职。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四五年九月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

[5]黄老先生，即黄齐生（一八七九～一九四六），教育家。清末在贵阳创办达德学校，曾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二一年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主办遵义中学。一九二九年后在晓庄学校任教。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为抗日运动奔走。一九四五年赴延安。一九四六年较场口事件发生后，代表延安各界赴渝慰问被殴打的民主人士。

[6]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与王若飞等同机遇难的还有八路军中校参谋李绍华，副官赵登俊、魏万吉，叶挺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儿子阿九，女工高琼，黄齐生先生的孙子、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黄晓庄和美军驾驶员兰奇上尉等四人。

[7]双十国共会谈纪要，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自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四十三天的谈判斗争。蒋介石被迫于十月十日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签订《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会谈纪要》表明、双方谈判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是：一、承认了中共的地位；二、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三、承认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与数目。没有达成协议的是地区问题和政权问题。形式上承认而实质上执行的是受降、遣俘和改编伪军的问题。

[8]政协五项决议，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1]。

[9]停战协定，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1]。

[10]整军方案，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0]。

[11]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议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占东北，坚持停战协议不包括东北地区。在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在重庆签订东北停战协议。但协议签订才三天，国民党军队就在美国的援助下，向我营口、鞍山，四平街等地发动了新的进攻。

[12]宪草修改原则，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12]。

[13]皖南事变，参见本书《为皖南事变题词》一文注[1]。

以披发纓冠之心为奔走和平之举
——致张君勱、黄炎培等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

君勱、任之、漱溟、伯钧、行知[1]诸先生：

东北已演成规模空前之大战，大江以北亦烽烟四起。政府当局，决心内战，不惜以全国人民之命运，作孤注之一掷。周恩来等来京以后，与马歇尔[2]将军不断商谈。奈政府方面始终坚持发动全国内战，三人会议[3]迄未举行，政治协商尤属遥遥无期。当前局势严重如此，吾辈惟有以披发纓冠之心，为奔走和平之举。局势业经大明，想诸先生之焦虑，必尤胜于吾人。亟盼民盟方面，速有代表来京，共同努力，俾大局得以扭转，人民免于倒悬。兹特烦华岗、梓年[4]二同志，前来趋候，面达一切。如蒙赐允，不胜翘盼欢迎之至。专白。敬候起居！不一。

周恩来

董必武

陆定一

邓颖超 同启

五月二十日

注 释

[1]君勱、任之、漱溟、伯钧、行知，即张君勱、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陶行知，当时他们都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以第三方面代表的身份，参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

[2]马歇尔，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4]。[3]三人会议，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5]。[4]华岗（一九三~一九七二），浙江衢县人。当时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

梓年，即潘梓年（一八九三~一九七二），江苏宜兴人。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任《新华日报》社社长。

就有关时局各项问题答中外记者

(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

问：今日中宣部公告中，曾称：“整军实施方案与指定驻军地区之协定，限期成立”，不知限期多久？

答：不知道。今天我见马歇尔将军时，他也未提及。

问：你是否认为现在的局势，是休战的延长呢？

答：我从马歇尔将军处得到通知，他说：政府将要发表一个文告，内容是继续停止进攻，继续谈判。但这只是一个文告而已，未见政府下令继续休战。彭氏之声明，说在某种情况下不进攻，在另一种情况下，还是要有军事行动。所以，这不能算是有期限的休战，更不算是长期停战。也许彭先生之妙处就在此。比如在江北，政府现有几个军，武装所谓“难民”还乡，且正准备借保民名义，先向苏北发动进攻。又如在山东胶济路上之政府第八军，借保护交通名义，向我发动进攻，已于三日前，占领益都。诸如此类事件，政府可以随时利用借口来发动战争。并且公告中写着“驱除”两字，这不是进攻是什么？当然，照彭氏的话来看，在国民党军队暂不拟发动进攻的地方，或可暂保和平。总之，这个公告，可作多种不同之解释，看你愿意用哪一个。这就是这个公告的妙处。

问：据各报所载，整军的关键，似为防区问题，不知防区究是如何划分？

答：关于军队驻地问题，整军方案中已作了原则规定，如华北驻多少，华中驻多少。现在则要把它具体化，如各师驻于何处，军部驻于何处。依政协决议，军事部分与整军方案之规定，此问题不应与政治问题分开来谈。政协决议的原则，是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军党分离。因此，只有先改组政府，成立民主统一的国防部，才能处理这些问题。但政府坚持要先谈军队驻地问题，我们为求得和平，又作了让步；答应先谈驻地问题。然而，这决不能改变政协规定的整军原则，即军队的正式整编，必须由改组后的国防部，经军事调处执行部[1]来执行。在整编中，军队应与地方行政分开，不应干涉地方行政。整军的另一原则，就是军训、军政、军令分开，这就是马歇尔将军根据美国军事制度的精神提议的。按原则，补给区没有军队指挥权。军队在战争时管作战，在平时管训练。而国府主席则经过国防部，行使统帅权，并须取得国府委员会或国会之同意。因此，目前谈驻地问题，不应该违反这些基本原则。现在政府提案，要把军队驻地和当地民政连在一起，变成以军于政的防区制，或军管区、师管区制。这就是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政府认为苏北威胁南京，承德、张家口威胁北平，铁路沿线中共部队威胁交通，应一律撤退，实在毫无道理。因为整编统编之后，大家都是国家军队，不能说谁威胁谁。反过来，如果我们也说南京威胁苏北，北平威胁承德、张家口，铁道线上驻军威胁附近各县村庄，那么，问题便无法解决。这样的提法，并不是从国家观点出发的。政府要求虽如此不合理，但我们还是让了步，答应可以在某些地区不驻兵。然而政府还不满足，一定要这些地方的党政军民众团体一律撤出，实在太不合理；而且赶出驻军的范围是我们不能接受，也不能考虑的。

问：马歇尔所提的过渡方案，内容是什么？其中哪几点是中共能够接受

的？

答：此方案，政府尚未同意。其内容我也不便宣布。但可奉告诸位：中共对其中绝大部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部分，包括驻军原则，军队比例和东北问题的处理等。大都是同意的。但政府坚持要接收其所指定的区域，致使方案未被同意。现在政府的“接收”，已从东北发展到关内来了。照这样逻辑发展下去，最后只有“接收”到延安，才算完事。

问：你觉得马歇尔之过渡方案，政府若能大部分接受，那是否今天就可以成立一个协议，而不致如现在仅发表一个含混的声明？

答：是的。

问：以后商谈，是否还根据马歇尔的过渡方案呢？ 答：我希望如此。

问：以后商谈方式，用三人会议，还是间接商谈？ 答：可能两种方式都用。

问：将军既以改组政府为先决条件，而中共至今尚未提出改组政府问题，即使整军获得协议，此项协议将如何执行？

答：对的，我们曾数度提出开政协会议[2]，至少应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来同时解决政治问题。并曾在致蒋主席及政府代表之建议书中提出过。但政府坚持先谈整军问题，对召开政协并不积极。我们为实现和平，也迁就政府。但我们并未放弃这个主张。同时仍在督促政府召开政协会议，迅即召开政协及其各小组会议，我们认为这也是打开僵局的一条出路。

问：改组政府既是原则问题，但据报纸所载，似乎马歇尔着重于实际细则问题的解决，是否如此？

答：不是。马歇尔很注重原则，否则整军方案何由产生。不过解决问题时。总要先谈具体问题。中国政府之必须改组，是符合于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声明及莫斯科三国公告的。马歇尔将军对此，亦甚关心。但此问题不在三人会议或军事小组范围之内。

问：近阅报载：苏北中共军有将撤退之说，是否属实？

答：并无此事。

问：你对中宣部公告中所称潍县、大汶口、大同被攻击事，如何解释？

答：潍县冲突，因该处国方第八军向益都进攻，并进占该地，我军为牵制起见，曾破坏该地铁路，以阻其进攻，这是战争中之状态。大汶口事早已过去，日前之传说，我并无所闻。大同则系阎锡山利用日伪军，向甫进攻，我曾在大同附近集中军队若干，加以牵制。我可负责声明：绝无进攻大同之事。相反的，在豫鄂边区，政府军已向新四军李先念部进攻五天了。国方进攻之部队，有九个军二十一个师，已占领去四个战略要点，刻平汉路两侧均在激战中。政府的计划，是要聚歼该地我军，而政府却在宣传我军向西移动。现我们已与该地失掉电讯联络。据我想，该地我军为自卫计，可能于政府军力薄弱之处，设法避开惨遭消灭之命运。国方占领该地我军之四战略要点为虎湾、佛塔山、邓店、杨平口。

注 释

[1]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来中国“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签订停战协定，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代表各一人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

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军事冲突地点进行调处。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后，美方协助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积极训练和装备国民党军队，供给大量军火和作战物资。是年八月，国民党进行反人民内战的准备已经完成，美国宣布“调处”失败，让国民党放手发动内战，军事调处执行部随之结束。

[2]政协会议，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1]。

反对扩大内战与 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

中国目前最严重的最急迫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内战，二是政治暗杀。我代表中共代表团，特发表严正的声明：

(一) 目前内战形势已经从局部向全面发展，大规模内战主要地已在四个战场上进行。首先是中原战场：国民党军三十万，于六月二十六日开始对中原军区“围歼”[1]，二十九日占宣化店，六月三十日和七月一日，我军开始突过平汉线，现仍在被迫击中。第二是山东战场：国民党军五个军，约十五万人，沿胶济路向我进攻，其济南、潍县间已于本月中旬会师。第三为苏北战场：国民党用十二个军，加上地方团队约五十万人，于本月十五日从三方面向我军作全面进攻，并有海空军配合。第四为晋南三角地区：胡宗南[2]的第一军于七月三日由陕西过黄河，占茅津渡，配合阎锡山[3]军队，已占我闻喜、侯马。此等情势，如果任其发展，平汉、津浦两线与热河及东北也很快有卷入内战的可能。我们要求国民党当局，少作违反事实的宣传，立即下令全面停战，否则应负内战全部责任。

(二) 昆明两次政治暗杀，足以动摇全国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当局团结合作的大局。李公朴[4]先生被刺后四天，闻一多先生父子又被刺[5]，这完全是有人计划的，而且是肆无忌惮的暗示。西安、南通之血案[6]未了，昆明今又继之，则重庆、成都、武汉、北平、广州，甚至南京、上海亦可以任意杀人。这完全赤裸裸地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残暴的法西斯本质，采用了最卑劣的手段来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及其代表人物。如果国民党当局对此仍不采取紧急处置，改弦更张，取消特务，则一切政治协商都将徒然无望。

注 释

[1]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组成了中原军区，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治委员。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以三十万军队向中原军区大举进攻。为了保仔力量，争取主动，在原解放军在六月底分路突围，实行战略转移，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

[2] 胡宗南，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党两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职。

[3] 阎锡山，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7]。[4] 李公朴（一九一〇～一九四六），爱国民主人士。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和群众文化教育工作。一九三六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推为负责人之一。同年十一月与沈钧儒等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抗战开始后获释。一九四五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5] 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爱国民主人士，著名诗人、学者。

这是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重庆《新华日报》。本文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

一九四三年以后，由于痛恨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腐败，积极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一九四五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长子闻立鹤为掩护闻一多也受重伤。

[6]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国民党特务捣毁西安民办报纸《秦风工商联合报》。四月逮捕并杀害该报法律顾问、民主同盟盟员王任律师。四月三十日夜，国民党特务绑架枪杀西安民主同盟青年部长、《民众导报》主编、中共党员李敷仁（当时伤重未死，经群众抢救掩护辗转到达延安，任延安大学校长）。这就是西安血案。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军调部淮阴执行小组到达江苏南通，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执行小组离开后，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杀害参加欢迎的群众二十余人，随同执行小组到南通的新华社记者孙天平同时遇难，这就是南通血案。

暗杀枪声已洞穿一切政治欺骗
——致高真[1]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

闻一多夫人礼鉴：

惊闻闻一多[2]先生紧随李公朴[3]先生之后惨遭特务暴徒暗杀，令郎义和[4]君亦受重伤。暗无天日，中外震惊，令人椎心泣血，悲愤莫名，真不知人间何世！此种空前残酷、惨痛、丑恶、卑鄙之暗杀行为，实打破了中外政治黑暗之记录。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今已暴露无遗。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中华民国已被法西斯暴徒写下一个永远不能洗掉之污点。中国法西斯暴徒如此横行，虽极猖獗疯狂，实法西斯统治的最后挣扎，自掘坟墓。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为李闻诸烈士复仇，消灭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平与民主，以慰李闻诸烈士在天之灵。敝代表团誓为后援。兹先电唁，尚盼节哀，并祝令郎早日康复！

周恩来
董必武
李维汉 叩
邓颖超
廖承志

注 释

[1] 高真（一九 三 ~ 一九八三），湖北黄冈人。闻一多夫人。

[2] 闻一多，参见本书《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一文注

[3] 李公朴，参见同上文注[4]。

[4] 义和，应为立鹤，即闻立鹤，闻一多的长子。

对中外记者谈三大问题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

我想说的是三件事：一件是各地的冲突，一件是关于救济的问题，一件是最近的昆明事件。

关于各地的冲突事件。现在的情况是由局部的内战向着全面的内战发展和扩大。事实上最明显的在四个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战争。第一个地区是在湖北、河南边境。在这个地区，李完念将军[1]领导的六万多军队被包围。依照去年国共双十会谈纪要[2]和今年整军方案[3]的规定，他们应该撤退到别的地区。但是，政府不让，因此，李将军的部队一直在包围中。曾有多次冲突，最近一次在六月里，政府增加军队，企图缩小包围圈，向宣化店发动进攻。这个地区是很小的，南北东西只有百里左右。故这部队在政府军队深入进攻的时候，不得不转移。六月二十九日政府军队进攻宣化店，中共军队是在六月三十日、七月一日越过铁路向西突围。从这两个时间，可以证明政府军队进攻在先，中共军队突围在后。突围后，马歇尔将军[4]和中共方面将在湖北的两个执行小组人员召至南京，提出要求政府停止进攻，使中共军队能够依照原订协议撤退到华北。但这提议提出已过半月，没有得到任何回答。现在平汉路西政府有五个军追击，一个军堵截，情况极严重。现在李部的确实地址我不知道。从新闻报导中看，据说一部分在湖北，一部分在河南，还有一部到了陕西的东南角。

第二个地区是山东胶济线。自从六月中旬起，政府增加两个军到山东，一个军在青岛，一个军在济南，发动向胶济沿线进攻。自潍县以西到济南，在这一个月内打通了这一线，占领了六个城市，十几个大的车站，由此引起了中共军队的自卫行动。这方面的战争，现尚在进行中，在青岛方面，政府军队在青岛外围以北进攻，占领了即墨城。

第三十战场就是大家所注意的苏北。在这方面政府最近增加了三个军：第五军，是从南方调来，现到浦口及其以北地区、在六合到来安一线；另两个军空运到徐州，一个军已到，一个军仍在运输中。政府的计划是从十五日起，分三方面进攻。第一，由徐州向南；第二，由蚌埠向东；第三也是主要方面，沿长江北岸自南通、扬州、浦口一线向北进攻，现在报纸上所揭露的仅是这一方面的战争。据我所知，第一绥靖区司令汤恩伯将军已下令五个军的力量进攻。东面三个军（四九，一百，二五等三个军）外加一个师是在南通、靖江、泰兴、泰县、扬州诸线。这样的十个师的兵力，向如皋至姜堰一线进攻，十五日拂晓开始。我直率的说，我们预知了政府的这个计划。所以在这一线准备了抵抗。战争很激烈。据报载中共攻占泰兴，据我所知，泰兴周围本来是解放区，中共出于自卫的战争是可能的。但至今泰兴城仍在政府手中。另外两地，宣家堡和姜堰。报上也说我们进攻，但实际上这两地本是解放区，战事在这两地进行，正说明是政府进攻我们。

西面，政府的一个军（第五军），十三日开始，从六合、来安向天长、盱眙进攻，现已推进八九个村镇。原驻南京的七十四军，亦已移到江北岸作为预备线。预料徐州蚌埠亦会向南向东进攻。萧县一度曾被政府军占领，现在报载战事又在那里发生。

政府方面并动员空军第五大队配合进攻。报上说中共在淮阴有二百架飞机，这完全是谣言。淮阴有执行小组，可以证明。相反，政府飞机倒常去淮阴侦察，并在附近轰炸。现在政府空军轰炸解放区各处，虽执行小组抗议亦无效。而政府海军，亦在配合进攻。一部在苏北沿海巡逻，一部在江阴镇一带掩护渡江。照此看来，苏北的战事。会更扩大。

第四个战区在山西。上个月到这个月，胡宗南将军指挥了两个军渡过黄河。一个军在潼关、朝邑渡河；一个军从陕州开去，到达山西的三角地区，向中共所在区进攻。占领了黄河的重要渡口茅津渡及同蒲线上的闻喜，继续向侯马进攻，报纸上说已占领该城。

在上述四个地区是大规模的进攻，此外还有各地冲突。但东北比较平静，杜聿明将军也承认这个现象。为什么原来东北的情势严重，关内比较平静，而现在反过来了呢？原因是政府军队增加的地方，战事就会起来；现在东北政府军队没有增加，而且比较分散，力量是比较不够，就没有发生大的冲突。这正说明一个真理，究竟谁是进攻的一方。

因为战争范围扩大到这样多的地区，战争又如此激烈，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不予制止的话，内战将由局部向全面发展。谈判在这样的情形下，也难有结果。在半个月加八天的谈判中间，在马歇尔将军的帮助之下，曾谈到四个方案，就是全面停止冲突，恢复交通，执行小组中美方代表职权的增加，整军方案的补充条款。本来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因政府提出新要求，要中共退出下列四个地区，问题便僵持了：一堤陇海路以南苏北皖北的全部，一是山东胶济沿线，一是热河全部，一是东北的安东；这要求超出了休战商谈的范围，并还反政协决议。依照政协决议，原来的地方政权应维持原状；俟政府完全改组以后，再行解决地方政权问题。这可以政协决议为依据。而政府这次提出的要求，或者叫做划防区，或者叫做割地划防，这不是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们拒绝了 this 提议。后来的五人会谈，也没有结果。而四个地区的冲突日益扩大，更使谈判难以进行。

如照报纸上所说目前的局势是边谈边打，则政府今天是偏重于打。形式似乎在拖，但实际是向全面内战发展。我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我们的态度是全面的长期的停止内战，把已经谈好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方案签字，召开政协，改组政府，这才是和平民主的轨道。

第二个问题是救济问题。我两次来沪的直接原因，是参加行总、联总及水利委员会的联席会，解决黄河堵口复堤的问题。我方担任的是黄河旧道的复堤，险工及其他工程。五月十七日得到协议，五月二十五日开工，已经进行了快两个月，此项工程经中外工程师前往察看，都认为满意。政府原应供给器材、经费、工款及河道居民迁移的救济费，但具体的解决，迁延极久。这两天虽有初步协议，但救济费还待今晚的会议解决。

至于堵口工程的迟缓，联总、行总、水利委员会都应负责，时间的耽搁是多方面的，我们应负之责很少。堵口早已动工，但现值夏泛，客观条件已不容许堵口。因为继续堵口，一面仍然泛滥，一面就要受灾。现在必须讨论的是在堵口的地方实施一些补救的办法，这必须要到河南当地根据实际工程解决。

关于救济的问题，已有很多的材料，这里不多谈了。我们有权利要求参加行总。过去救济物资分配给解放区的数量大小，而且如何分配，我们也不知道。不要事情发生以后，再来代我们。所以我们要求参加行总各部门及有

关地方的实际工作。

第三个问题是最近发生的昆明事件[5]。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暗杀，我们非常愤慨。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这两位先生都是民盟[6]的负责人，而这类事件并非是从他们两人身上开始。远的不说，在政协以后，捣乱挑拨的事件不一而足。政协开会时，沧白堂扔石子[7]，开会后，较场口打伤人[8]，李公朴先生就是当时被打伤的一个，捣毁新华日报[9]，在北平、广州和别的地方也有捣毁报馆的事件。暗杀的事件从南通、西安起，现在发展到昆明。这一串事件都是有计划的。为什么敢于这样做？因为政府没有明令制止上惩办过，而已政府的宣传机关还为之掩饰袒护。尤其是连下关书件[10]，依然没有追究出一个水落石出。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因为这是打击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及久学家。在内战的前方，还可说两方都有武器。而在国民党政府管辖的后方，有的是宪兵、警察、军队、法庭、监狱等的镇压，还要用暗杀的手段来镇压政府党所不满意的人士。这真是无耻卑鄙之至！

对于这类暴行如再不停止，再不惩办，再不追究，找出根源，则可以扩大到全国，重庆、成都、广州，以至上海、南京都会发生的。陈立夫先生[11]又来上海了。他是来布置统一党政军的行动，镇压民主运动的。黑名单上列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逮捕、凶打、绑票和暗杀他们。民主人士的名字都在陈立夫先生的手上，更不论我们共产党人了。我们来谈判就是准备着的，过去在重庆准备了八年，今后再准备八年吧。但这个代价对于他们还是不够的。他们还向手无寸铁的文学家、新闻记者、工业家、学生、平民索取代价，来维持统治者的独裁。我们不能忍受，我们要控诉。现在已经不是抗战以前的时候了，杨杏佛、史量才[12]的案子不能伸雪。现在不行了，我们要伸雪，我们要控诉。如果以陈立夫为首的特务机关说我是冤枉了他，希望他有所声明，并拿出事实来看。我们欢迎他的声明，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真心悔过的人握手。我们和多少人握手，我很难过的说，甚至和手上染有血的人握过手。为了人民，为了民主，为了国家，我们不惜忍气吞声地这样做。我们日夜祈求停止此种暴行。我为什么在诸位面前控诉？因为诸位受到的压迫、威胁、恐惧比我们多。诸位是手无寸铁者。希望以清位的笔、口，来控诉，以制止这种卑鄙无耻的暴行。

现在情形如此严重，我们仍力和平民主而奋斗。只要能永远停止战争，我们仍愿在政治协商的前提下，解决任何争执的问题。

注 释

[1] 李先念，一九〇九年生，湖北黄陂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参与创建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九年率部开辟鄂边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集中三十万兵力围攻中原解放区，他指挥部队突围，带领主力一部完成战略转移。他是中共第八届至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八〇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三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

[2] 国共双十会谈纪要，参见本书《“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文注[7]。

[3] 整军方案，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0]。

[4] 马歇尔，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4]。

[5] 昆明事件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镇压反内战运动的罪行之一。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撕毁《双十协定》，进攻解放区，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十一月二十五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六千余人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国民党派军队包围会场，放枪恫吓，并在学校附近戒严，禁止师生通行。二十六日起各校学生联合罢课表示抗议。十二月一日，国民党军警特务至行校殴打罢课学生，并投掷手榴弹，杀死南菁中学教员于再，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明工校学生张华昌等四人，伤十余人。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大城市学生举行抗议和示威，掀起了更广泛的反内战运动。

[6] 中国民主同盟，参见本书《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的重要谈话》一文注

[7] 沧白堂打人，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3]。

[8] 较场口事件，参见同上文注[4]

[9] 捣毁新华报馆，参见同上文注[5]

[10] 下关事件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镇压和平民主运动的罪行之一。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全面内战，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二十三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各界人民十万人，举行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游行示威，并推派马叙伦、盛丕华等十一人为代表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呼吁和平。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包围毒打，马叙伦等人受伤。

[11] 陈立夫，参见本书《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注[24]。

[12] 杨杏佛（一八八三～一九三三），一九二五年随孙中山北上，任秘书。后任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一九三二年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进行反蒋抗日的进步活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被蒋介石特务暗杀。

史量才（一八七八～一九三四），一九一三起任《申报》总经理。蒋介石统治初期采取拥蒋立场，“九一八”以后政治态度逐步改变。上海“一二八”抗战后，曾捐款支持抗日，并任抗日群众组织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后来又积极支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被蒋介石特务暗杀。

抗议国民党轰炸延安
——致徐永昌[1]并转蒋介石
(一九四六年八月四日)

次辰将军阁下：并请转蒋主席赐鉴：

八月二日正午，延安上空，突来国民党徽飞机七架，计 p47 式驱逐机六架，B24 式轰炸机一架，自正南方向窜入，到后即扫射城郊达二十余分钟，发射机枪弹万余发。旋即飞至于家坪——中共军延安总部所在地上空，投弹十一枚，最近处只距总部房屋约四百公尺，事后检视炸弹片及子弹壳均美造，炸弹为延性弹。

查延安城自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年，四年间历遭敌机轰炸，久已成为废墟，城市居民及当地军政机关均移居城郊四周窑洞，军令部驻延联络参谋皆熟知之。今国民党飞机突至延安城郊，集中目标轰炸中共军延安总部所在地，其为有计划的发动全面内战之信号，已属毫无疑义。盖延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及中国解放区军队总部所在地，久为世界所公认，且其地又为远离冲突地区之后方和平城市。国民党空军之暴行，半年来虽已侵扰，扫射或轰炸解放区城镇至二百六十八次之多（从一月十一至七月二十八日止），但轰炸此远后方和平中心城市——延安，犹为首次。

本人兹奉命向国民政府提出最严重之抗议，政府如不承认此举为全面内战开始之信号，则请立即实行下列两项办法，以制止此类暴行之扩大：

一、下令调查此次暴行之经过，并严惩此次暴行之负责者。

二、将全国空军置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2] 管理监督之下，以保证中国空军不再参加中国内战。

事态发展至速，务请迅赐回答，以利和平商谈，不胜企盼之至。

专肃，敬颂

公安

周恩来 谨启
三十五年八月四日

注 释

[1]徐永昌（一八八七~一九五九），字次辰，山西崞县（今原平）人。当时是负责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等问题的三人会议的国民党政府代表。

[2]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参见本书《就有关时局各项问题答中外记者》一文注[1]。

答记者问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关于谈判的经过、症结与前途

问：蒋主席发表文告后，中共经过马司[1]两氏与政府谈判情形如何？

答：蒋主席曾经过司徒大使向我们提出五项条件（即要中共退出苏北皖北、胶济线、承德与承德以南，东北退至黑龙江、兴安与嫩江北半省及延吉、山东山西退出六月七日后中共占领地区），因不合政协原则，我们当即予以拒绝。不久，蒋主席即发表了文告，该文告不但重弹老调，而且强调必须中共退出若干解放区，方能停战，因此这是继续并扩大内战的文告。

司徒大使后又提议先谈改组国府委员会的事，我们认为：依政协精神，本应光停战；后谈改组政府，但停战商谈由六月以来未得结果，因此，为使政府放心，先谈改组政府以促成停战亦未尝不可。但我们必需弄清两个问题，即：一、政府是否愿在改组政府问题谈妥后，立即下令停战？二、政府是否在谈改组问题时，放弃上述五项条件不谈？回答如是肯定的，则我们愿意先谈改组政府问题。否则，即使改组政府问题谈出结果，而战仍不停，或又以五项条件来纠缠，问题依然不能解决。那末，谈判仅仅是用来掩盖内战的存在，便于政府取得外援，以达到其“拖”的企图而已。我们反对此种“边打边谈，拖中大打”的局面，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战，照政协决议办事。

我们认为：如果政府真愿停战，改组政府问题并不难商谈解决，因此问题已有政协成议可循，而尚待商谈的只有两点：一、是国民党以外二十名国府委员名额的分配问题；二、是对有关变更和平建国纲领议案时的否决权的保障问题，但照目前这种打与拖的样子，照国民党报纸的宣传，政府当局似并无依照政协决议改组政府的意思，也许将来会在“扩大政府基础”名义下，请几位党外的人来粉饰门面，而拒绝与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组织联合性的举国一致的政府。

问：与宋子文氏之会谈有何发展？

答：这是一幕滑稽剧。宋氏声明并非政府谈判代表，仅在听听我方意见。

问：今日报载蒋主席同意在中共退出苏北与津浦线后，即可停战，是否表示国共意见已有所接近？

答：此消息确否不知，但即使如此，亦丝毫不能解决问题。自六月东北休战后，中共已在预定的停战、恢复交通、整军等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使商谈已有百分之九十五达到协议，但政府方面仍拒不签字，并且节外生枝地提出了中共应退出某些解放区来作难题，致使谈判宣告失败。此种所谓中共自某某地区“撤退”并由国民党政府来接收的问题，既不属于政府在休战中所提议的三项商谈范围，且又极不合理。因为：第一、它直接违背政协决议之地方自治民选政府的原则。第二、解放区之地方政府，乃系当地人民选出，并非上级委派，叫它撤向何处？如认为民主基础不够广泛，则只能在改组国民政府后实行地方重选，谈不到撤退。并且国民党统治区域，各级政府全是

这是在南京梅园新村寓所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问答要点的综合编述。会上并分发《群众周刊》第十二卷第四、五期合刊社论《立即无条件停战！实行政协决议！》的摘要以代声明。本文原载《群众周刊》第十二卷第六期。

委派的，将来改组政府结束党治后应该撤退而改为民选的，倒不是解放区而是它们。第三、要求中共撤退的借口是威胁和平与阻碍交通，所谓威胁，就兵力言，国民党自称强于中共，受威胁的应是中共，而非国民党。对人民言，战争就是对和平的最大威胁，交通是因战争而受阻碍，只要停战，“威胁”与“阻碍”当然不存在了。故这个借口，乃是要要求战争，并不是要求和平。倘照此要求谈判，则只有取消所有解放区，方能达到其目的。因此，关于这一类违反政协原则的任何要求，都是我们不能接受与无法考虑的。我们方面从来没有向政府提出过这类要求。

政府说，如不接受，便只有打。我们是要求和平的，但如果政府打来，则只有动员全解放区人民抵抗。抵抗的目的，在使政府知难而退，知道用战争决不能解决这类问题。过去打了二十年，没有解决，肯定说，再打二十年，还是不能解决的。

关于马、司徒调处与美国对华政策

问：中共对马、司徒调处的态度如何？

答：调处问题，既已愈趋复杂。去年马歇尔将军来华时，正在杜鲁门总统对华声明[2]与莫斯科三国公告[3]之后，马氏热心奔走，努力调处，在今年一、二、三月间确获得很大成绩，我们感谢他，人民也赞成他。虽然，当时美国也在援助国民党政府，但我们认为内战除东北外既已停止，政府如能很快改组，则这些援助也会转移到联合政府手里。不料三月以后，内战由东北扩大并延及关内，美国不仅未停止且更扩大了这种援助，美军亦仍留在中国未撤，这更鼓舞了国民党法西斯派的战意，而敢于放手大打。我们对此，不能不加以批评和反对。尤其严重的是六月正在休战商谈之时，美国国会忽提出延长援华租借法案十年，并赠送大批舰艇来华，致使政府当局有恃无恐，敢于推翻成议，继续内战。今内战日趋严重之际，彼得生氏又来华商谈让售太平洋诸岛美军剩余物资问题，且为数达三亿五千万至五亿美元之巨，此非鼓励中国内战而何？我们如何能再忍而不言？此种一手调处，一手帮助一方面扩大内战之美国矛盾政策，必使马歇尔将军与司徒雷登博士之调处完全归于失败无疑。我们固希望马、司徒调处成功的，但必须美国政府能改变其错误的政策，方可达到目的。

问：美国对华政策是否有改变之迹象？

答：现在还看不出美国有改变对华政策之症候，彼得生之活动即可得其反证。

问：加拿大与英国驻华使节，是否亦将参加调处？

答：中国事已非一国问题。去年三国公告时，各国均下反对美国调处，但调处到现在，既未成功，反而使内战越打越大，这对三国公告负有责任的国家，以至所有联合国，恐不能不关心过问，甚至互相咨询。至于英加两国大使将参加调处事，我方毫无所知。

关于全国战争与中共军力

问：中原停战两周的协议，实施效果如何？

答：执行小组原在老河口有协议，命令政府军队停止追击截击，中共中

原部队停止移动，并派代表参加商谈。但因政府军始终未停止追击，故中共部队的代表无法派出。旋执行小组飞到西安，李先念将军电派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代主任周子健为代表，政府方面又不承认，并横加搜查侮辱，这是毫无道理的。李部至陕南镇安境后，即直接派三代表取道柞水赴西安参加商谈，并通知政府方面接待，但此三代表到政府军防地后，至今下落不明，而胡宗南将军对此竟下承认。我们又要求由西安执行小组三方派入去陕南找李先念将军所部，请政府保证小组安全，而政府方面又谓无法通过。最后，政府方面竟谓李部已打散了，无法找到。实则，李部至今仍与延安有电讯联络。可见，一切协议协商均为国民党当局破坏无遗，其唯一目的，即在用一切手段，企图消灭中共中原部队。我可断言，中共中原部队决打不散。我们原只要求中共中原部队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倘政府方面相逼太甚，使他们无路可走，则只能向豫、鄂、川、陕、甘等省寻求生路，如是，一切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

问：太原、大同军事情势如何？

答：在山西，我军为阻止胡宗南部八个师违约渡河北上，及太原方面阎锡山军南下，配合进攻解放区，曾截断正太、同蒲两路，并予两方面的进攻以坚决抵抗，于是政府方面即宣传我军进攻太原。大同原为我解放区包围中之一据点，政府军为配合晋南晋中攻势，拟空运万人到大同，我方为阻止其实现，故乃围困大同，破坏大同机场，但政府仍增运到四千人，现在战斗在城郊进行。

问：中共军事力量究有若干？

答：在停战协定时，关内我军有一百二十万，其中九十万为正规军，三十万为地方部队，关外因处于战争中，当时始终未能停止冲突，故无正式统计，估计为五十余万。关内自停战后即进行复员，至四月止，已复员了三分之一（正规军余六十万，地方部队余二十万），后因内战复发，复员不得不停止，现在数目，则不清楚。

政府常责我们未交出整军名单，试问当美国在中国内战中保有二重身份（一为调处之中间身份，一为国民党政府之作战帮手）之时，我们如何能够以军队之编制，人数，驻地的清单，交与美国代表之手？

目前，政府进攻解放区之兵力，已达到二百一十七个师，二百万人以上，占其总兵力百分之八十人，规模之大。为近二十年所未有，且部队仍在增加未已。政府每在何处增兵，战事即在何处爆发。政府现又在东北增兵三个军，连以前七个军将为十个军，故东北的战事又将爆发了。中同现已存在着全面性的内战，政府不但使用空军大肆轰炸，残杀无辜民众，且现又运大批毒气至徐州一带，准备使用。对此，我们不得不加以揭发与控诉。政府为掩饰自己的企图，常故意诬蔑中共军实行决堤，实行空炸，使用毒气，实则都是政府军自己在实行这套狠毒办法。我们很盼望报馆记者及社会公正人士，能亲往前线。实地视察，看究竟是哪方面在制造祸害，荼毒人民。

关于实现和平的因素

问：中国问题之解决，要靠国共两党互忍互让，还是靠国际干涉？

答：靠三个因素：第一，是中国人民不容许战争打下去。中国老百姓没有一个愿意打内战的。诸位或将怀疑人民有何力量获得和平？但我们则坚信

人民力量的伟大。中共二十年来即完全依靠人民的拥护，并代表人民的要求而存在而发展的。诸位或将问最近中共不是号召解放区人民作战吗？是的，我们号召他们实行自卫战。因为国民党法西斯派的进攻战已经打进他们的大门，他们不能不起而抵抗。如果我们号召他们，实行全面进攻，他们必将反对，政府不愿使大家看到解放区人民拥护中共的这种实际情形，故常阻止新闻记者去解放区参观考察。诸位须知：我们虽然武器较差，但因为受老百姓拥护，而又是自卫战，保护家乡，故人力无缺，战斗力强。国民党军队虽然武器精良，但打的是进攻战，到处侵占土地，屠杀人民，故广大官兵都不愿作无谓牺牲，普遍厌战，甚至经戴笠一手训练出来的交通警察总队，亦复如此。最近在胶东，有交通警察一个大队反战起义，在苏中，有交通警察两个纵队约五千人放下武器。从六月七日到现在，两个半月政府军因进攻而受到损失的已超过十六万人，这不单因我军是哀兵而胜，还因政府军是进攻者，致官兵厌战而败。

我们极欢迎各位到各解放区去参观，以便亲自问问他们为什么要放下武器。

第二，靠国共两党有和平民主决心。我们是有决心的，故愿意立即无条件停战，照政协决议办事。国民党广大党员官兵也知打不下去，打内战是痛苦的。现在只有国民党领导人物还在做武力统一迷梦，但这种人数越打越少，如不觉悟，最后定成孤家寡人。

第三，是国际因素。中国长期内战，民穷财尽，对国际安全合作，很大不利。各国均需要中国安定，始可发展经济合作，尤其为美国着想，亟需如此。但按美国政府目前政策做下去，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不过各国政策，不仅决定于其政府，抑且决定于其人民，只要使各国人民了解中国的实情，自然会起来纠正其政府的错误政策的。

以上三者之中，我们认为最基本的还是人民的力量。

注 释

[1] 马、司指马歇尔、司徒雷登。

马歇尔，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4]。

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美国人，生于中国杭州。一九四六年七月出任美国驻中国国民党政府大使。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后，仍然留在那里观望。同年八月离开中国。

[2] 杜鲁门总统对华声明，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6]。

[3] 莫斯科三国公告，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7]。

在上海对中外记者的谈话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

从上次八月底和诸位见面后，过去了的九月份正如所预料的一样，是在“拖中大打”的局势中过去了。全国内战越打越大，现已打到察哈尔大门。政府的军队动员了将近九个军的数目，从三个方面，即：热河、河北、绥远向察哈尔推进，进攻已从前两天开始。晋冀察军区司令聂荣臻将军已电北平调处执行部抗议，南京中共代表团，已向蒋主席提出了最严重的抗议，我个人已向马歇尔将军提出备忘录，叶剑英将军在北平也向执行部国民党政府代表提出了抗议。这一切抗议和备忘录都指出：如果政府军不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军事进攻，我们便认为蒋主席决心破裂，最后放弃和平谈判，一切严重的后果和责任，都应由国民政府负之。

空前大规模的内战

自从日本投降以来，中共的态度一向都是力和平、民主、独立、统一而奋斗。从马歇尔将军担任调人起，我们始终主张彻底停战和照政协决议办事，这两项主张，是全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国际爱好和平人士的愿望。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从没有改过口。但是，国民党当局则完全相反。在有些时候他们也口头赞成停战，但在大多数时候反对停战，而不论赞成或反对，他们总是提出许多使对方不能接受的条件，所以，实际上就是反对停战，破坏停战。去年双十公告[1]后，打了三个月，好不容易战争在今年一月才停下来。可是对东北，国民党当局始终不愿停战，结果在三月以后，东北大打，六月东北休战以后，又转入关内大打，一直打到今天。现在国民党军队动员了二八个师，即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兵力十进攻解放区，出动飞机八百多架，轰炸解放区，就是沿海的军舰，也在许多海口巡弋，并担任运输。中国政府在战场上，从来没有用过这样大的兵力。最近蒋介石主席夸耀过去江西“剿共”时的功绩(?)，那时国民党在全国用的兵力不过八十几个师，现在则是三倍于它的数目；空军那时也没有现在多，海军没有动用。抗战初期，虽然动员了全国极大数目的军队，但那时师的数目只有一百多，现在却比抗战时增加了一倍多。所以说现时内战规模之大是空前的。在这次内战中，九个月来，国民党军已占去解放区城市一七座，村镇五千多，飞机轰炸三百多处，仅就最近三个月的统计，单在关内，国民党军的损失，就付出了二十二万多人的代价，人民的损失更不用说。这样大规模的残酷的内战，怎能还说规模不算大，甚至说中国并没有内战以欺瞒国内外的人民？

内战责任应由谁负

关于谁负内战责任的问题，我想举几个主要时机的关键问题就可证明。
第一、当一月十日停战令宣布时，命令应在全国有效，那时东北还有冲突，美方和中共都主张派遣停战小组到东北去，但国民党政府始终反对，不愿派

遣小组，不愿在东北停战，因之，停战协定，首先为国民党方面所破坏。

第二件是关于东北的停战。经过许多次的协商才达到三月二十六日的协议，三方同意派遣小组去东北调处，规定的任务是停止一切冲突，政府代表亦签了字，小组也派出了，但政府方面却拒绝执行协定，致造成东北四五两月的大打。且中共主张停战，并没有选择过任何时机。当四月十一、十二两天苏军快要从长春、哈尔滨撤退时，中共军久在长春哈尔滨外围，彼时，在重庆的东北团体出来调解，他们对我说，陈诚将军答应只要中共军队不进攻长春、哈尔滨，就可以马上停战。我当时立刻答复说：“好，只要马上停战，我自然可以担保不打长春、哈尔滨。”说话的时候是四月十二日正午，但当天下午东北团体代表去找陈诚将军时，陈将军回答须请示蒋委员长。结果，第二天一早，陈将军就飞到上海来了，于是乃有四平街之战。这又一次证明政府宁愿破坏了停战协定，也不愿意在即使对政府有利条件之下停战而放弃武力解决中共问题的。

第三件是六月东北休战协商。大家晓得那不是停战，而是休战，以便谈判。当时政府提出的条件有三项，即：一、完全停止东北冲突；二、恢复交通；三、整军方案的补充条款。对于这三项，我们曾尽量让步，甚至当政府提出于美方最后决定权时，我们虽然原则上坚决不同意这种出卖民族主权的办法，但还是设法在调处方面，予美方人员以某些权力。可是政府提出的条件却越来越多，最后要中共退出从敌人手中解放了的地区，包括地方民选政府在内，于是休战谈判又告失败。虽然这次休战协议，即照政府代表王世杰先生的说法，也已完成百分之八十五，可是还不能签字。这又一次证明政府没有真意停战，而只是以谈判当作进行内战的掩盖。

第四件是六月以后的谈判。我在七月里便对诸位说过这是一个拖的局面。果然如此，我们明知政府是拖中大打，以谈判来掩盖全面内战，但我们为满足人民的希望，还是不断在这里委曲求全，设法迁就，谋取和平谈判的成功，七八两月我在南京不断与美方代表接触，马歇尔将军亦曾经不断奔走于南京枯岭之间，司徒大使带病参加谈判，但所得的口答是不能停战，一切都证明政府决心打下去，想用政治拖谈掩盖大打的局面。后来，司徒大使提议召开非正式五人小组，是打算用商谈改组国府委员会的办法以达到停战的目的。我们同意参加，只要求政府保证谈好后即下令停战。但是，结果政府经过马歇尔将军回答我们的是不能给予停战保证，同时，美方代表也不能保证。

不仅如此，政府方面并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停战的条件：

一，政府军队占领了什么地方，即继续占领下去。诸位记得，在六月休战的谈判中，政府曾提出双方应退出六月七日以后占领的地区；现在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方多了，于是已成立的协议就不算数。这种条件，等于说政府要在完全有利的时机才肯停战，果如此，这种条件，永远不会实现，而战争将无休止的打下去。

二，在六月休战中政府所提规定中共军队驻地的要求，我们没有完全同意，现在政府仍要中共完全接受，才肯停战，这等于说要中共从陇海线南（包括苏北皖北地区）、津浦沿线、胶济沿线、山东半岛、同蒲沿线、热河以至东北，最大部分的地区撤出。这些要求完全是一方压倒另一方，完全违背整军方案要规定双方驻地的协议。即使如此，中共在六月休战协议中仍答应某些地区在整军时中共可以不驻正规部队。不料现在政府的要求越来越多，越

提越无理，使我们实在无法考虑。

三，过去政府的五项要求（即要中共从苏北、胶济线、热河、东北大部分地区及山东川西许多城市撤出）我们久已拒绝考虑，而政府现在却说，这些地方自然会解决的，意思就是政府要以武力达成官的要求。

四，同样无理的是要求中共先交出参加国大的名单，政府才能考虑停战，这就是要中共递出降表，它才考虑停战。

上述的四项条件，比之六月休战谈判中的条件，更加苛刻而无理。那时问题未获解决，现在条件又增加了，我们如何能接受？如何能相信在商好改组国府委员会后，便立即停战？因此，非正式五人小组之召开，已失去其实际意义。惟鉴于目前内战情势严重，我们乃提出立即召集三人会议的要求。因为这是今年一月间国共双方请马歇尔将军担任调人以来就成立的合法的停战机构，马歇尔将军担任该会主席，北平执行部和各地执行小组都受三人会议的领导与指挥。这一停战机构在如此大而广的内战面前，不能坐视不问，而且照过去习惯，经任何一方要求，主席均应召开会议，又六月以后，该会已停会三月，而内战却愈打愈大，这种情形再不能继续下去，我们有充足理由要求，召开三人会议。因为政府没有回答，马歇尔将军也很迟疑，我在南京无事可做，便到上海来等候三人会议之召开，不料一等半月，毫无消息。

现在政府正在进攻张家口。在战争这样严重的情形下，可以设想政府不仅不会马上停战，定会在打下张家口后提出更多的要求。不错，马司两位最近又提议同时召开三人会议和非正式五人小组，我们认为不管是一个会或两个会都是形式上的问题，中心却是停战。在今天，主要的关键是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因为绝不能再向解放区军事政治中心之一的张家口进攻的炮火中，来一条一条的商谈停战协定，改组国府及召开国大等问题。这等于拿刀放在人家的脖子上逼其投降，这种希望，是永远不可能在中共身上达到的。

再看政治方面的情形。在政协决议通过之后，从二、三、四三个月在重庆举行的政协综合小组和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的争论来看，全国人民都懂得：破坏政协决议者，就是国民党的二中全会，就是从较场口打人，捣毁新华报馆直到李闻被暗杀案。国民党当局是在破坏他自己的四项诺言、推翻政协决议和宪草修改原则，不遵照政协中对中共和民盟在国府委员名额中共占十四名的默契，以保证对破坏和平建国纲领的否决权，巨而破坏和平建国纲领中地方自治的原则，要取消许多地区的民选的地方政府，要增加同大代表的名额。最后，蒋主席在四月二十四日曾与各党派协商，规定国大无限期延期，与将来再经协商始得召开，但到七月三日，国民党当局未经各方协商，却单独宣布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大，现在又不经各方协议，即命令各党派提出国大名单。这是破坏政协决议，维持一党专政，不但中共不能同意，即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以及全国人民也不能同意。

现在国民党政府更要拿召开国大的事来进行分裂与压迫，一只手拿着刀于进攻张家口，另一只手又拖你去开会。在这种情形下，不仅中共绝对不能文出国大名单，即政阶中其他真正民主党派分子也不会参加，今天民盟致蒋介石主席电，也反对在炮火连天中召开国大。因为这样的国大，一定是一党包办的分裂的国大，而不是包括各方面参加的团结的国大，这是可以断言的。所以，我们认为，下管是三人会议也好，非正式五人小组也好，国大也好，一切问题的中心，都在于停战。只有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才有和平谈判的余地。否则，就表示政府决心放弃和平谈判的可能，而造成全国分裂的局面。

因此，全面内战的一切责任，都应由国民党政府担负。

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

关于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我愿多说几句。在整个谈判中，我们认为杜鲁门总统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声明是好的，马歇尔将军根据这个声明在第一阶段的调处是有成就的，他促成了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及恢复交通协议，并促使政协成功。但马歇尔将军回国后再次来华，情形就变了。首先在东北停战问题上，美方不是站在调解的地位，而是帮助国民党运军队运军火，大打东北，压迫中共。六月后关内大打，情形更坏，美国政府以海军船只送给国民党政府，向国会提议对华租借法案延长十年，以八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美军剩余物资转让给国民党政府，这都是更露骨的帮助国民党进行大规模的全面内战。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国民党要进行像今天这样大规模的内战，是不可能的。

诸位能说我的话是夸大吗？请想想：现在国民党空军所有的一千余架飞机，可以说全部是美国来的，在战场上的二百五十多架轰炸机，一百六十多架战斗机，如果没有美国的炸弹、汽油，能够飞吗？能够炸吗？如果机器坏了，没有美国器材的补充修理，这些飞机能够再动？那是不可能的！国民党政府所有的二百多艘美制的运输舰，加上最近送给中国政府的二百七十一艘军舰与登陆艇，如果没有美国的训练、炮弹和修理，能打仗吗？能行动吗？国民党五十七个师的美械装备，今天全部用在进攻中共解放区的战场上，也全都靠美国的补充，如果子弹、炮弹、战车、汽油没有美国的补充与技术训练，能打能用吗？自从日本投降以来，经美国海空军运送的国民党军队达四十多万人，都是运到进攻中共解放区的战场上。假使没有美舰美机运送，这许多军队能跑去吗？这一切都证明没有美国的帮助，国民党军队连动都不能动，更没有可能打这样大的内战。有人说：即使美国不帮助。今天国民党存下的美式军人，还可以打半年仗。但是美国假如真正停止帮助，则政府就要考虑半年后打完了怎么办？战就会停下了。可是现在据悉国民党政府正在和美国谈判将存放在美国的七亿五千万美金中，拨出一万万到二万万购买军火，以便大量补充。此项谈判的成功就是几十万中国人民的死广。这如何能使中国人民不起来要求美国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呢？

还有人说：美国军队驻在中国是为了中国和平。我看，相反的是摧毁中国的和平。请想想：美国军队在中国控制了这么许多基地，举例说，南京光华门外与上海江湾两机场是美国军人在那里管理，气象台上的美国军人就在担任中国空军的气象指导。在我们上下飞机的时候，就可看到一架架轰炸机装了炸弹起飞去炸苏北，一架飞机出去，就有成百的同胞死伤，而这就是美国军人在那里指挥。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保护铁路和城市，实际上就是帮助守卫国民党军队的据点和铁路运输线。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在秦皇岛、青岛、上海等地可以自由的来往起落凌辱中国同胞。美国的军事顾问团今天正在训练国民党军队使用美式武器，屠杀中国人民。这能够说是帮助中国的和平吗？完全是摧毁中国的和平。有一种理由更荒谬，说美军撤走以后，苏军或别的国家军队就要来，难道说中国应该是让外国军队驻扎的殖民地吗？在中国很大的地区，如像西北，并没有美国军队，也没有别国军队，中国人民正在那里和平的生

活着，何况外国军队撤出中国是莫斯科三个公告所规定，谁也不能违背，因此这种理由纯属无稽之谈。

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我们就是反对美国的援助与合作呢？不是的。我们认为只有在联合政府成立，军队进行整编之后，我们和美国才能真正平等互惠的合作，而今天美国是处在调人地位，就应善尽其调入的责任。

必须立即撤退驻华美军，停止任何片面的援助，以便有助于制止中国内战。否则，表面上是调解，实际上是倒在一方，帮助国民党政府大打内战，必使马歇尔将军司徒大使陷于今天这样困难的尴尬地位。撤军、停援、不仅中国人民如此的要求，美同人民也在这样要求。解决这个问题责任，就落在美国政府及其代表的身上。

空前严重的局面

今天中国的情况是空前严重的。如果国民党政府不改悔，仍继续向张家口进攻，如果美同政府仍旧公开的或隐蔽的帮助国民党政府打仗，继续保留军队驻华，那末，中国的内战是无法停止的，中国必将是一个全面破裂的局面。内战的继续扩大，将使中国人民遭受更惨痛的牺牲，经历更长期的黑暗。但我们深信，中国人民有力量走完这段艰苦的过程，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内战制造者与援助者。中共始终为中国的和平、民主、独立、统一而奋斗。将来仍然如此，但决不屈服在一党独裁内战和外国奴役之下。我们永远依靠人民的力量，我们深信中国人民一定能独立起来。人民是杀不完的，何况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它是全世界第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一定可以从内战中奋斗出来，实现中国和世界的真正和平，中美人民的真正合作与全世界的团结。在这个紧急的关头，我们呼吁全肚界的舆论的援助。

注 释

[1]双十公告，参见本书《“四八”烈士水垂不朽》一文注[7]。

致马歇尔将军备忘录 (一九四六年十月九日)

马歇尔将军阁下：

阁下令柯艾上校转来的蒋主席十月二日的备忘录，业经在上海收悉。

蒋主席的备忘录不仅拒绝答复我九月三十日备忘录所要求的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的军事行动，反而进一步向中共提出违反政协决议及整军方案的两项要求。故我未立即作复，而只由王炳南先生将我的意见口头通知司徒大使，以期待阁下与司徒大使将继续为中国的和平而进行公正的努力。

如王炳南先生曾经通知司徒大使的，我们所以能接受蒋主席的两项要求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一) 依照既定协议中的原则，中共及民盟必须在国府委员四十名中获得十四名，即三分之一强的票数，才足以保证和平建国纲领不致被单方面变更，而政府所提议的十三名不能给以这种保证，且将无党派一席算入中共民盟，亦与政协决议不合。

(二) 国大名单仅能提交改组后的政府，且必须在宪法草案业经政协修正为提交国大的唯一草案及国大代表名额业经最后商定之后，此乃政协决议的程序，蒋主席要求立即以国大名单交给一党政府，显与政协决议相违。

(三) 为切实实施整军方案，应规定在整军时，双方军队的驻地，而不应只规定中共军驻地，让政府军得保持随意调动，随时威胁与随便进攻中共部队及解放区居民之自由。不意我方期待，竟至落空，七日接读阁下六日致司徒大使的备忘录，得悉蒋主席仅在实行他的上述二项要求之下，才同意对张家口的进攻暂缓十日，这显然是迫我屈服的哀的美敦书，使我不能不坚决拒绝这一提议。

现在，除已由董必武、王炳南二先生口头转达我方意见外，我愿向阁下更作如下之申述，并请转达蒋介石主席：

(一) 在九月三十日的备忘录中，我业已声明政府军对张家口的进攻，即系表示其不惜全面破裂的决心。故现在只有立即无限期的停止进攻张家口并将进攻部队撤至原防，才足表示政府愿意重开谈判，避免破裂。否则一切严重后果应由政府方面负其全责。

(二) 为表示最大的诚意和让步，只要政府立即无限期的停止进攻张家口，我方愿意参加三人会议，和非正式五人小组或政协综合小组，俾同时讨论停战及实施政协决议二项问题，关于此二项问题，中共有如下的提议：

(甲) 关于停战问题者：(由三人会议讨论之)

(一) 双方军队在关内应恢复一月十二日的位置，在东北应恢复六月七日的位置。

(二) 在整编中，双方军队的驻地均应规定。

(三) 政府方面违约调动的军队，应退回原驻地。以便整编。

(乙) 关于实施政协决议者：(由政协综合小组或非正式五人小组讨论之)

(一) 在国府委员会中，中共及民盟应合占十四名，以保证和平建国纲领不致被单方面所修改；至此十四名名额之分配由中共与民盟以方协商定

之。

(二) 行政院应与国府委员会同时协商改组。

(三) 依照政协决议之原则及其规定之程序，由宪草审议委员会修正宪法草案，作为提交国大之唯一宪法草案，各党派并须保证该草案之通过。

(四) 国大之最后召开日期及国大代表增加名额之分配应由政协综合小组协商决定之。

(五) 在政府按照本项一二两条改组后，各党派应根据前条商定之名额，将国大代表名单提交政府。

(六) 地方政权问题，应依照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暂维原状，以待政府改组后实施地方自治。

(七) 力保证蒋主席一月十日在政协会议上关于人民自由权利之四项诺言的确切实施、须首先并立即释放政治犯，彻底查办本年一月以来各地发生之惨案，惩办凶手，取消特务组织，并恢复本年一月以来所封闭与停止的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及人民团体。

(八) 根据政协的军事决议实行军民分治并切实复员。

上列两项提议，悉本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及政协五项决议，实为解决当前时局危机之最可靠的办法。如政府当局尚有诚意履行此等协议应无不赞成之理，否则空言政治解决，实施政协决议，实际为武力解决，推翻政协决议，不惜以内战独裁造成全国分裂之局，中共方面将坚决反对到底。

专此并致敬意！ 周恩来谨启

在上海鲁迅逝世十周年
纪念会上的演说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

鲁迅先生死了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中国是从内战进入抗战，现在又回到了内战。内战乃鲁迅先生所诅咒的，抗战才是鲁迅先生所希望、所称颂的。他希望的事在人民大众努力下实现了，而他诅咒的内战可仍还存在，这应该是我们参加这会的每个人所难过的。人民希望民主、独立、团结、统一，而日本投降了一年多了，这一个愿望还没有达到。鲁迅先生逝世那年也在谈判，到今天足足谈了十年了，还不能使中国人民谈出一点和平，我个人也很难过。但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的问题。今天，我要在鲁迅先生之像面前立下誓言：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逼得进行全面自卫抵抗，也仍是力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

鲁迅先生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之立场。在人民面前，鲁迅先生痛恨的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所谓之千夫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假如是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过去历史上有多少暴君、皇帝、独裁者，都一个个地倒下去了。但是历史上的多少奴隶、被压迫者、农民还是牢牢地站住的。而且长大下去。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鲁迅和闻一多，都是我们的榜样。

对国民党召开“国大”的
严正声明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已于昨天开幕了。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不但这一“国大”的开会日期未经政协协议，更重要的它是一党召开的分裂的“国大”，而不是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政协协议的国大，依照政协决议及其程序与精神，必须将政协决议次第付诸实施之后，在改组后的政府领导之下，始能召开。

政协各项决议[1]，是各党派协议的临时大宪章，是一个整体而不可分割的。十个月来，政协决议不但未曾丝毫付诸实施，而且被国民党当局破坏无遗。停战协定是经过政协决议批准的，但内战从东北大打到关内，政府当局已彻底破坏了一月间停战令[2]的位置。政府当局在政协开幕时所宣布的四项诺言[3]，从较场口大打[4]直到李[5]、闻[6]暗杀案，已被国民党特务统治破坏得一干二净。政府改组迄未协议成功、和平建国纲领遂亦无从实行，而对许多解放区的地方政府，国民党当局不仅不准其依照纲领规定维持现状，且欲实行“接收”，不允则实行武力占领。军事决议的基本精神是军民分治，但现在国民党政府的各省主席几无不以现役军人充当。宪草审议在重庆既未完工，中共代表当即有全部保留之声明；政府迁南京后，国民党当局更将其一搁至今，从未再议。国大问题的协议，是政协开会期中最后一个妥协。国民党当局保证不开一党包办的分裂的“国大”，并保证通过政协审议完成的宪草，其他党派方允许十年前一党包办的代表[7]得保留在区域与职业的代表名额之中，且必须增加各党派代表与解放区代表。在内战完全停止、政协决议已付诸实施、人民自由权利已获保障及政府改组之后，才能够召开国大。这样的国大，才算是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现在开幕的所谓国大，不只违背上述决议及其精神，而且连开会日期或延期也由一党政府决定。代表名额，据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已公布者竟达一千五百八十人，在原协议二千零五十人中，已侵占其他党派名额四百一十人，尤其是已侵占解放区二百人代表名额至一百四十人之多。可见这一“国大”是彻头彻尾一党包办的分裂的“国大”。所谓空出名额等待中共参加，既系破坏政协，又属完全骗局，实际上只是想骗取中共以外的其他党派参加，以粉饰国民党当局个人独裁的面目而已。

一月来，南京商谈经第三方面人士的辛勤努力，中共方面曾不断提议商谈形式可以不拘，但必须依照政协决议及其程序办事，惟均被政府当局拒绝。一党“国大”的会议期愈近，我们愈主张停开一党“国大”，方有可能使军事三人会议[8]、政协综合小组及宪草审议委员会得以同时开会，根据停战协定、整平方案[9]与政协决议，分别解决当前的军事政治问题，并立付实施，然后方能在和平的环境中，从容召开共产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但急于粉饰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之后，蒋介石立即发布命令，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妄图通过一个所谓的宪法，使其内战、独裁、卖国的路线“合法”化。“国大”召开的第二天，周恩来同志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书面声明，刊载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重庆《新华日报》。本文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

独裁的政府当局，对此根本不予考虑。

现在开幕的一党“国大”，不但使中共及第三方面最近在商谈中的协议成为不可能，并且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同时也很快地彻底揭穿了政府当局十一月八日“停战令”[10]的欺骗性。这一党“国大”还要通过一个所谓宪法，把独裁“合法”化，把内战“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卖国家与人民利益“合法”化。照这样做下去，中国人民一定要陷入苦痛的深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和谈之门已为国民党政府当局一手关闭了。一党“国大”中将要玩的一切把戏，乃至改组政府，我们决无一顾之必要。参加了这一个“国大”，承认了这个把戏，就必然推翻了政协决议，破坏了政协以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轨道。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进攻解放区的血战方殷，美国政府援蒋内战的政策依然未变，假和平假民主绝对骗不了人。我们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注 释

[1]政协各项决议，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1]。

[2]一月间停战令，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1]。

[3]四项诺言，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

[4]较场口大打，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4]。

[5]李，参见本书《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一文注[4]。

[6]闻，参见本书《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一文注[5]。

[7]一党包办的代表，参见本书《论统一战线》一文注[62]。

[8]军事三人会议，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

[9]整军方案，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0]。

[10]停战令，指国民党反动派在撕毁政协协议、召开分裂的“国民大会”的前夕，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八日单方面颁布所谓“停战令”，以掩盖其政治上分裂的阴谋，推卸扩大内战的责任。

为庆贺朱总司令六十大寿的祝辞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亲爱的总司令朱德同志：

你的六十大寿，是全党的喜事，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我能回到延安亲自向你祝寿，使我万分高兴。我愿代表那反动统治区千千万万见不到你的同志、朋友和人民向你祝寿，这对我更是无上荣幸。

亲爱的总司令，你几十年的奋斗，已使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

亲爱的总司令，你为党为人民真是忠贞不贰，你在革命过程中，经历了艰难曲折，千辛万苦，但你永远高举着革命的火炬，照耀着光明的前途，使千千万万的人民，能够跟随着你充满信心向前迈进！

在我们相识的二十五年当中，你是那样平易近人，但又永远坚定不移，这正是你的伟大！对人民你是那样亲切关怀，对敌人你又是那样憎恶仇恨，这更是你的伟大。

全党中你首先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

亲爱的总司令，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辛亥革命[1]、云南起义[2]、北伐战争[3]、南昌起义[4]、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生产运动，一直到现在的自卫战争，你是无役不与。你现在六十岁了，仍然这样健壮，相信你会领导中国人民达到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亲眼看到独裁者的失败，反动力量的灭亡！

你的强健身体，你的快乐精神，象征着中国人民的必然兴旺。

人民祝你长寿！

全党祝你永康！！

注 释

[1]辛亥革命，参见本书《革命救国论》一文注[10]。

[2]云南起义，指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云南爆发的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起义。蔡锷等在这一天通电各省，宣告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发动讨袁战争，随即得到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的响应。次年六月，袁世凯病死。

[3]北伐战争，参见本书《论目前抗战形势》一文注[8]。

[4]南昌起义，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击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直接领导下，在南昌发动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占领了南昌，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参加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部三万余人。起义部队八月五日撤离

了南昌南下广东。九月底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在彭湃、颜昌颐等率领下，同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撤出的武装力量相结合，在东江地区继续活动；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会合，合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

就当前时局问题发表的谈话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新华社记者顷就目前时局有关问题访问周恩来将军，兹记其问答如下：

问：美国杜鲁门总统今年十二月十八日的声明用意何在？

答：杜鲁门总统的声明主要地是为今年三月以来美国政府的反动的对华政策作辩护，并无新的内容；其用意则想以此种辩护来蒙蔽国内外舆论，堵塞各方面责难，而得以继续不变的执行反动的对华政策，以便一方面美国调人仍可留驻中国，扬言所谓“极愿帮助中国使其获得和平及真正民主的政府”，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又可肆无忌惮地援助国民党政府，使其放手进行内战，好加速中国成为美帝国主义殖民地与附属的过程。杜鲁门总统的这个声明，虽然不能代表美国的民意，相反的，它是与美国公正舆论对立的。在杜鲁门声明以前发表的美共参议

员佛兰德氏、民主党参议员摩莱和美国四位著名中国专家的联合声明，便是这种美国人民公正舆论的代表。

问：一年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否符合莫斯科三国公告及杜鲁门总统自己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声明？

答：从今年三月以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仅不符合去年十二月的莫斯科三国公告[1]与杜鲁门总统声明[2]的各项原则，并且完全违背了这些原则；今年一二月间在中国成立的“国共停战协定”[3]、“政协五项决议”[4]与“整军方案”[5]是符合于上述原则的，而马歇尔将军在当时确尽了他的调解与推动之力。所以直到现在即在国民党政府撕毁了这些决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及全中国人民仍然拥护这些决议的路线，我们并坚持依照一月十三日停战令的双方军队位置。实行全国停战，依照政协路线，不承认国民党一手包办的非法的分裂“国大”[6]，及其所通过的任何形式的“宪法”。

去年十二月的莫斯科三国公告与杜鲁门声明的对华各项原则，就照这次杜鲁门自己的声明，也承认为停止内争，扩大政府基础，使民主分子加入政府各部门，成立统一民主国家，保证一致遵守不干涉中国内政之政策，并保证仅仅在“中国最后向上述之途径进展时”，美国才“准备在经济及其他各方面予以协助”。但就一年来经过的事实看，美蒋两方的政策，恰恰与这些原则相反。

关于全国停战：就在一二月间，国民党政府也从未遵照协议，在东北停战，三月二十七日，国共美三方又专门成立了“东北停战协定”[7]，国民党政府仍然违背这个协定，不准执行小组前往军事冲突地点执行停战命令，反而造成东北大扫的局面。六月以后，更在关内大打，打到现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已经侵入了所有中共领导的解放区，从一月到现在，已经侵占了解放区的一百八十三个城市。自然它所付出的代价相当大，单从七月算起，它已经损失了四十五个旅（或师）左右，为占其全兵力的五分之一。这样规模空前的内战，蒋介石氏已动员其总兵力的百分之八十八约二百一十八个旅（或师）来进攻各解放区。一月停战协定早被他破坏净尽，美国政府及其特使站在调人地位，对此从无片言相责；反而也放弃一月停战协定的立场，拒绝依照一月十三日停战令双方的位置恢复和平，这不明显地是美蒋合作放手大打

么？那有丝毫“停止内争”之意！

关于美军驻华：照杜鲁门总统所云，其主要任务是“协助中国受降与遣俘”，其实，这都是借口，美军运送国民党军队至华北、华中“受降”结果、乃造成去冬从今夏以来的大规模内战。其真实目的，显然就是帮助国民党当局造成这种内战局面。在这种内战局面造成以后，自己又来装模作样的“调解”，以便达到其自私目的。遣俘用不着许多军队，亦未使日人在中国绝迹，留下的正好是那种在阎锡山等部队中担任进攻解放区的日本战犯，日本侵华第一号战犯冈村宁次[8]，现在不但未审判。且受国民党政府优待。美海军在中国沿海横行，其陆战队在华北各地侵扰均已一年多了；单就去年十月到今年七月的不完全统计，美军沿北宁路向我解放区侵扰的军事行动，便将近有三十次之多，其中有配合国民党政府军队一道行动的；这不仅是干涉中国内政，而且已参加中国内争了。

（一）一年来美国对华援助，是在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坚持独裁、并未最后向和平与民主之途径进展时进行的。杜鲁门总统在这次声明中，也不得不承认一二月所作的协议并未实现，而中国也远未获得和平及真正民主的政府，可是美国政府就在这种情况下，给予国民党政府以空前的大量援助，美国以海空军运送国民党政府军队至东北、华北、华中，不仅在一月停战令前，即在停战令后，也还违反协定运送了九个军去扩大内战。对华租借物资，在抗战中规定，装备中国三十九个师，但在日本投降前，仅装备了二十个师，战后不但没有停止装备，竟反扩张为四十五个师。物资总价已达十五万万美元，而在今年六月国共谈判最紧张时，美国政府又向美国会提议延长对华租借法案十年，并另送军舰二百七十一艘给蒋介石氏以助长蒋氏敢于使谈判破裂的决心。剩余物资的处理协定，价值八亿五千五百万美金是在中国国内大打时签字的，此项交易恰恰包括飞机、军用汽车、交通器材及一切军队中的日常必需品，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军队的剩余物资。

（二）对华贷款在战时已有七亿五千万美元之巨，战后又有一千八百万美元。因此，现时国民党政府在美存款尚有三亿美元，正在与美政府接洽购买军火，若再划出新借款五亿美元，则国民党政府受此鼓励，内战定将长期继续无疑，故单就这些最可靠而并不完全的数字看来，国民党政府得到美国的物资援助，价值已超过三十六亿美元，而这些援助，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用之于内战，决不能使中国经济复兴，反而加剧中国经济的破坏。并且在这种美造军人下成千成万的牺牲者，在一年前都曾为杜鲁门声明和马歇尔来华而欢欣鼓舞过的。

美国政府这种露骨的援蒋内战政策，其目的在想压眼中国人民将中国完全变成美国附庸。我们从最近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9]、“中美航空协定”[10]及美国军事顾问团与各种军事训练的协定看来，即可证明国民党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给美帝国主义的行为，是与美国政府援蒋内战政策相适应的，不管杜鲁门如何强辩，说美国政府“避免牵入中国内争”，实际它已是中国内战的制造者与鼓舞者；而他所说的，“仍愿保留协助中国人民实行经济复兴”的话，不过是为美国政府继续以借贷援蒋内战的政策寻找借口而已。可是，美政府这种反动政策，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与坚决反抗，不得不侵害了中美两国人民传统的友谊，并引起国际上有关国家严重的注意。

问：一年来国共谈判破裂的责任究竟属谁，美国调人是否公正？

答：一年来国共谈判破裂的责任，显然属于国民党当局。一月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为停止中国内争，实现民主之基本协定，中共方面至今仍愿为政协路线与恢复一月停战令的双方驻军位置而继续奋斗，国民党方面则不仅破坏了这些协议，拒绝恢复一月停战令的双方位置与依序实施政协各项决议，并且继续向中共所领导的各解放区做深入的进攻，企图消灭解放区及其人民武装，宣布他一党包办未经政协协议的非法的“国大”与“宪草”为合法，以分裂民族团结。国民党政府这种行动，不得已使国共谈判破裂，并且更使谈判成为不可能，杜鲁门的声明竟对此只字不提，反而说中共攻占长春，并破坏了积极性的谈判。事实上，中共军队攻占长春是在国民党政府军队破坏了三月廿七日东北停战协定，占领东北人民民主联军手中许多城市，并猛攻四平街情况之下，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而积极性的谈判，如六月休战协商、七月五人会谈、八月司徒调解、九月停攻张家口的建议、十月第三方面的调解，都破国民党政府一连串的新要求所破坏了，最后国民党政府更以召开非法的分裂的“国大”关闭了谈判之门。美国调人的态度可从这些谈判中得到回答，美蒋合作以破坏停战协定与政协路线电愈到后来愈明显了。

问：国民党政府的“国大”既已开过，其所产生的“宪法”是否有效？

答：国民党政府的“国大”与“宪草”既未经政协一致同意，又无联合政府召集，更无中共及真正民主党派的代表参加和制定，故不论这所谓“国大”已经开过，这所谓“宪法”已经通过，其性质依然是蒋记国大，蒋记宪法。我们及全国民主人士，决不会承认它为合法、为有效。

本来政协协议的国大是党派的国大，并非普选的国大，尤其是被保留的十年前的所谓“国大代表”，更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所指派。

现在国民党政府竟以这九百五十多名的所谓“国大代表”做基础，开他的非法的分裂的一党包办的“国大”。

不管青年党、民社党如何违背政协决议，去为国民党政府捧场。真正合乎政协路线的、党派性的、新的国大在人民胜利面前总是要重新开过的；所以，我们对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大”在未开会前，主张停开，开会期中，主张解散，现开会后，主张取消重开。国民党政府的伪宪，也只有把他当作袁世凯天坛宪法和曹锟贿选宪法一样看待。这些独裁者在这些“宪法”中宣布了他们所原来不打算做的东西，而人民也决不会承认它的。

问：然则国共谈判前途如何？ 答：谈判之门是国民党政府拿它召开“国大”的手关闭的，如要重开谈判，国民党政府必须：（一）根据停战协定，承认恢复一月十三日双方驻军位置，实行停战。（二）根据政协路线，取消非法国大及伪宪，重开党派会议协商一切。否则，国民党政府如果在其所召开的“国大”闭幕后，一方面再来什么改组政府等把戏，一方面仍继续向解放区进犯，并积极布置进攻延安与哈尔滨等地区，则所谓“改组政府”等的新把戏，它的欺骗性也同刚开过的所谓“国大”一样，而它的主要目的还在适应美国政府的要求，欺骗美国舆论，以便美国政府得到拨付五亿美元借款与更多援助的借口，来加紧进行屠杀中国人民的长期内战。我们与中国人民对于这种美蒋合作的意图，决不再受欺骗，决心反对到底。

注 释

[1]莫斯科三国公告，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

[27]。

[2]杜鲁门总统声明，参见同上文注[26]。

[3]国共停战协定，参见同上文注[21]。

[4]政协五项决议，参见同上文注[1]。

[5]整军方案，参见同上文注[20]。

[6]非法的分裂国大，参见本书《论统一战线》一文注[62]。

[7]东北停战协定，参见本书《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文注[11]。

[8]冈村宁次（一八八四~一九六六），前日本侵华军事首脑之一，首要战犯。抗日战争结束后，曾任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一九四九年一月被国民党政府宣判“无罪”，纵放回国。一九五〇年被蒋介石聘为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支持台湾“反攻大陆”。一九五四年起先后任“日本樱星会筹备会”理事氏、日本旧军人全国性组织“战友联”副会长、“日本乡友会联盟”会长，从事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

[9]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的大量出卖中国主权的条约。

[10]中美航空协定，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的出卖中国领主权的“空中运输协定”。

在延安各界举行的
“双十二”[1]纪念会上的讲演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诸位先生，诸位同志：“双十二”事变过了整整十年了，中国从内战转入抗战，现在又不幸地回到内战，这是值得大家研究的一段历史教训！不管现在又回到内战中，中国总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阶段：日本法西斯被打倒了，抗日的人民军队强大起来了，一万万四千万人口的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得到了真正解放，在那里，人民实行民主，农民获得土地，而全中国人民在这种鼓舞之下，亦认识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这就是“双十二”事变的历史收获。“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九一八”事变以后，人民已日渐不满于国民党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北上抗日与号召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更因之日益广泛，并影响到当时的“剿共”军队，首先影响到在内战前线的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经过“一二九”学生运动[2]、全国救亡运动、七君子之狱[3]，尤其是中国人民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转向东渡黄河抗日[4]，全国抗日高潮必然要走向抗战。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已无可阻止。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5]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6]、杨虎城[7]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而他自己也因此一逼，才勉强抗日。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先生抗战是张、杨两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张、杨两将军从此就获得人民的谅解与拥护，不是偶然的。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先生幽囚了十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蒋介石的抗战既是被逼的勉强的，所以在抗战的全部过程中，都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抗战、团结、民主的路线；一条是妥协、分裂、独裁的路线。前者为中共所坚持，得到人民的拥护；而后者则为蒋介石所坚持，得到敌伪与反动分子的喝彩。中共及人民是主张积极抗战、坚持胜利的；而蒋介石在抗战初期则联合德意，企图妥协，在抗战后期则勾结敌伪，消极抗战。中共及人民是主张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以便击败日寇的，而蒋介石则分裂抗日阵线，利用抗战不断地削弱乃至消灭非嫡系军队，首先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更不惜实行内战。中共及人民是主张实行民主，以便能动员人民的一切力量坚持抗战的，而蒋介石则厉行独裁，压迫人民，使抗战陷于无力。在这种情形下，要不是中共在敌后努力，人民在全国坚持，中国的抗战早已被蒋介石断送了。所以日寇一经投降，蒋介石便利用日俘，收编伪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今年一月在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声中，蒋介石又曾被逼地勉强地接受过停战协定[8]与政协决议[9]，但不久便被他所指使的南京二月“整军会议”与重庆三月“二中全会”

或明或暗地推翻了。等到东北大打与关内大打，更证明他接受政协决议与停战协定决非心甘情愿。内战发展到最近，五个月侵占我解放区这样多的地方，现在又在开着一党包办的非法的分裂的“国大”，蒋介石的一切欺骗作用都被他自己揭穿无遗了。

就这一年多的情况看来，蒋介石与中国人民之间依然继续着西安事变以前及西安事变以后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抗战胜利后，中共及人民是主张依照政协路线实现和平民主与独立，坚决拥护一月停战令，主张政协决议的依序实施，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退驻华美军，停止援蒋内战。而蒋介石则不惜破坏政协路线，坚决走上内战、独裁与卖国的道路。他企图以武力消灭解放区，以“宪法”形式使他的独裁合法化，以亡国的“中美商约”[10]出卖民族利益，换取美帝国主义更多的援助来进行内战，但他这种企图，一定会如十年前进行内战时一样遭遇到悲惨的失败。现在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和平、民主与独立。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奴役人民的企图，将引导自己到众叛亲离。蒋介石独霸中国、奴役人民的企图，亦将引导自己到众叛亲离。蒋介石想追随美帝国主义之后寻找出路，结果必走到悬崖绝壁。只有政协的路线才是康庄大道。人民的世纪已经降临。中国的民主新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解放区人民自卫战争的坚持和胜利，反动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各国人民的进步，将促进这一新高潮的到来。历史的发展会警告反动统治者：内战、独裁、卖国的道路是不是要走到底？

就在目前，蒋介石还高谈“政治解决”，然而，多数人已经知道这是骗局，或者叫做“和平攻势”。为辨别这一“政治解决”的真伪，我们只要求他立刻解散正在开会的一党包办的非法的分裂的“国大”，承认恢复一月停战令所规定的双方军队的位置，国共谈判便可重开。蒋介石如果肯这样做，那才有回到政协路线上的可能。不然，中国人民就会看得更清楚：对于蒋介石，“武力消灭解放区”才是他的目的，“政治解决”不过是他的欺骗口号而已。我们相信：经过西安事变以来的十年经验教训，中国人民是再不会上当的了。

注 释

[1] “双十二”，参见本书《悼张淮南先生》一文注[2]。

[2] “一二九”学生运动，参见本书《论统一战线》一文注[6]。

[3] 七君子之狱，参见同上文注[8]。

[4] 东渡黄河抗日，参见同上文注[5]。

[5]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本侵略者唆使伪蒙军李守信、王英等部，配合日军向绥东（现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一带地区）进攻，为当地军民所击溃。

[6] 张学良，参见本书《决心扫清两军间合作之障碍》一文注[1]。

[7] 杨虎城，参见本书《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一文注[3]。

[8] 停战协定，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1]。

[9] 政协决议，参见同上文注[1]。

[10] 中美商约，参见本书《就当前时局问题发表的谈话》一文注[9]。

评马歇尔离华声明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

去年今日，正是全国停战协定[1]签字与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日子。在整整一年中，情形的变化与人民的觉悟发展得真快。一年前的今天，全国人民都在欢呼和平停战。但是为时不久，全国又陷入内战的深渊。大家已明白：不取消军阀主义的统治，中国永远得不到和平。去年一二月间，全国人民都在庆祝政协成功，但是为时不久，政协全部决议[2]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大家已明白：不取消个人独裁制度，民主的政协路线是永不会实现的。一年前，全中国人民都在欢迎杜鲁门总统的对华声明[3]与马歇尔将军的来华调解，但是为时不久，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原形毕露，蒋介石政府的卖国外交亦暴露无遗。

于是全中国各大城市，从几十万学生一直到广大市民，都喊出“美军退出中国”、“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奴才外交”、“反对中美商约”等口号。

去年一年的变化，不仅国民党反动派重新挑起了内战，破坏了政协，便连一同签字于停战协定上的美国调人也不再提起去年一月的停战令了，一同参加政协的青年党[4]、民社党[5]及大部分所谓“社会贤达”也竟参加了彻底破坏政协路线的一党包办的非法的“国大”，制定完全违背政协原则的独裁“宪法”，以加深全国的分裂局面。所以，现在只有中国共产党与真正民主党派、真正社会贤达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一直为坚持去年一月停战协定与政协路线而奋斗，为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与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奋斗。回顾这一年的奋斗，不由得想起去年为停战、政协奔走的“四八”遇难烈士及闻一多[6]李公朴[7]陶行知[8]诸先生，他们与破坏停战、破坏政协的反动集团搏斗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们。

就在这一年正满，马歇尔将军于他离华前夜，发表了关于一年调解之总结性的声明。我现在借着他这个声明，略论一下一年谈判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马歇尔将军承认国民党内有反动集团，在国民党政府中占优势，而且包括军事与政治领袖，他们反对联合政府，不相信国内合作，只信武力可以解决问题，对实行政协决议显无诚意，这都是说得对的。但遗憾的是他并未指出蒋介石就是这个反动集团的最高领袖。蒋介石说，联合政府就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去年北平执行部成立后，蒋介石反对派执行小组到东北调处。三月二十七日东北停战协议[9]方签字，蒋介石便命令杜聿明[10]在东北大打。六月休战谈判未成，是蒋介石硬违背政协决议要求中共退出苏北、热河等四个解放区破坏了的。接着，他便在关内大打，直到现在。一年来，他违背停战协定，调动了二百一十八个旅（或师）占其全兵力百分之九十来进攻中共领导的解放区，至去年年底止，还侵入解放区十七万九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侵占解放区一百六十五个城市，这不是武力进攻是什么？去年召开的一党“国大”，彻底破坏了政协路线，自始至终都是蒋介石一人决定的。所以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自己。

这是在延安各界代表声援全同学生爱国运动及纪念政治协商会议一周年大会上的演说，发表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十四日延安《解放日报》。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

蒋介石反动集团用武力“维持其自身的封建控制”，但结果连马歇尔将军也不得不承认，“已使其政府的力量愈益薄弱”。至于“经济破坏”与“交通破坏”，都是蒋介石进行内战所造成的结果。蒋介石政府以其预算的百分之八十用在军费上，加以官僚资本的盘剥统治，独裁政府的腐败无能，金融如何不乱，经济如何不溃？

这样的坏政府，在同一个蒋介石领导之下，换上几个去年一月曾经参加政协，后来又背叛政协，并积极参加蒋记“国大”的某些所谓国民党内自由分子与少数党派如青年党、民社党之流的人，便可以一变而为好政府，马歇尔将军的想法，未免太廉价了罢。没有中共参加的所谓联合政府，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制度是无法取消的，也绝不会成为自由主义政府。

马歇尔将军明知去年召开的蒋记“国大”，是破坏了政协决议及其程序的，但他却故意说他通过的独裁宪法是“民主宪法”，其中主要部分均与政协原则相符合，且似已包括中共要求在内。这真正是欺人之谈。去年蒋记“国大”通过的独裁宪法，其主要部分均与政协原则相反。政协主张保障人民自由，蒋宪则限制人民自由。政协主张保障少数民族自治权，蒋宪则取消少数民族自治权。政协主张省为地方自治最高单位，自订省宪，实行地方均权主义，蒋宪则取消省宪，实行中央极权主义。政协主张中央政权实行联合政府的责任内阁制，蒋宪则恢复“五五宪草”[11]的总统独裁制。马歇尔将军想以实行蒋宪、改组政府的办法，算作结束一党训政[12]，为蒋介石独裁政府找出路，结果只会使它更加失信，更加独立，绝对得不到人民拥护。

那么，中共这样反对蒋宪，反对在现在情况下参加政府，要求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的双方军事位置，要求取消蒋宪与重开党派会议，是否如马歇尔将军所说不愿促成公允的妥协呢？恰恰相反，这些要求，正是最公允的妥协，也是最低限度的和平民主要求。连马歇尔将军也承认中共在去年一二月间是愿意妥协的。而二三月起，破坏政协、破坏停战的一切行动，又显然出之国民党反动集团。故中共直到现在，还是坚持在去年一月的停战协定与政协路线的基础上求妥协，其根据正是马歇尔所称赞的“自由而且远大的宪章”。两相比较，蒋介石是在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路线，中共是在维持停战协定，维持政协路线，究竟是蒋介石在企图消灭解放区，还是中共在追求推翻政府，岂不十分明显了么？若说蒋介石可以不接受取消蒋宪与恢复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之最公允的妥协，难道中共就应承认破坏政协的蒋记“国大”、“宪法”与破坏停战协定的进占位置，才算“公允的妥协”么？中共不承认这些无理要求，就说中共党内有激烈分子，不顾国家利益与人民痛苦，这是最不合事实的而且企图污辱中共的说法，中国人民决不会相信。因为中共为人民服务，二十六年来如一日，一切依靠人民，才有今天的威信。如果中共同意蒋介石进占解放区这些地方，让他自由压迫人民，承认蒋记“国大”、“宪法”，让他继续独裁，那才真是不顾人民痛苦与国家利益呢！而且也必然得不到真正和平。

有许多渴望和平的天真朋友，不去研究停战的可靠根据和最低保障，不愿为坚持原则而奋斗，只痴等和平之赐予。于是蒋介石看透了这点，在他进攻有利的时候，便决不停战；在他进攻失败，需要取得时间整顿军队，以便重新进攻，如像去年一二月间那样，他便赞成停战，举行所谓“和谈”。请问，这样怎能得到公允妥协呢？永远不能。公允妥协必须建立在一个对人民有利而可靠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去年一月为马歇尔及蒋介石代表张群[13]

所签字的停战协定与蒋介石所主持通过的政协决议。马歇尔将军的声明只提政协决议，不提停战协定，这不是偶然忘记，而是有意规避他签字在上边的责任，并为三人会议[14]及北平执行部的美方代表寻求解脱，但反而愈加证明美国政府是在有意助长蒋介石打内战了。

因此，马歇尔将军对中共宣传工作最为怀恨，也可得到证明。的确，在过去一年中，中共对去年三月以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曾不断揭发其错误，尤其对美军驻华，干涉中国内政，侵扰解放区（马歇尔所提之安平事件[15]，不过此中三十余件之一件而已），运送蒋军，及美政府以租借物资、剩余物资、经济借款、军舰、飞机、军事顾问、技术训练等等援助蒋介石政府军队，更不断予以暴露和抗议。而美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政策的本质及国民党政府卖国外交的事实（如缔结“中美商约[16]”、“航空协定”[17]等），又常为我们揭露无遗。七月以后，中共在蒋介石大举进攻之下，犹与美国调人不断寻求妥协之道，乃蒋介石得寸进尺，贪得无厌，无理要求，层出不穷。而美国调人始终无片言相责，反两次声明，深怪中共未能接受其调解，这自不能不引起我方的驳斥。马歇尔将军认为上述各种宣传，足以激发世人对美政府的痛恨心理，故有“罪恶性质”。其实，能激发人的并不是抽象宣传，而是活生生的事实。如果上述的事实不改，在爱好独立自由的民族看来，都是罪恶。

现在马歇尔将军回去任美国国务卿了。我很希望他能站在故罗斯福总统对华政策的立场上，为着中美两大民族的传统友谊和利益，重新检讨美国政府近一年来的对华政策，不再继续过去的错误，停止援助蒋介石政府进行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不再干涉中国内政，重新调整中美关系，那一定会有大助于中国人民对于和平、民主与独立的努力，也更有助于远东和平与国际合作。

停战协定签字和政协会议召开一周年，我们不能忘怀于这一伟大的纪念日，并且要为停战协定与政协路线继续奋斗。我们相信一切民主人士、全国同胞都愿为它一道奋斗，以求其完全彻底实现，不达目的不止。

注 释

[1]停战协定，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1]。

[2]政协全部决议，参见同上文注[1]。

[3]杜鲁门总统的对华声明，参见同上文注[26]。

[4]青年党是“中国青年党”的简称，其成员是一些地主、资本家、政客和知识分子。一九二二年在法国成立，初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年改名为“中国青年党”，鼓吹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抗日战争期间曾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后又依附国民党，参加了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逃往台湾省。

[5]民社党是“中国民主社会党”的简称。一九四六年由“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其主要成员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参加了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一九四九年五月在香港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宣布继续追随国民党，同年随国民党逃往台湾省。

[6]闻一多，参见本书《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一文注[5]。

[7]李公朴，参见同上文注[4]。

[8]陶行知（一八九一～一九四六），人民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一六年回国，先后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南京、上海郊区创办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团，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运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后，参加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区反独裁反内战的政治活动，并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一九四五年春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从事民主运动。

[9]东北停战协议，参见本书《“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文注[11]。

[10]杜聿明，一九一四年生，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战役中被我军俘虏。一九五九年被特赦释放，现任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1]“五五宪草”，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18]。

[12]一党训政，参见同上文注[10]。

[13]张群，参见本书《论统一战线》一文注[52]。

[14]三人会议，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5]。

[15]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军各数十人，“巡逻”到天津西北七十公里的河北香河县安平镇附近，侵入冀东八路军防地，并向当地守军攻击。守军被迫自卫，国民党反动派借此大肆煽动，竭力想把美军牵入中国内战漩涡。我党及时揭露了美军的侵略行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活动，严正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道歉赔偿：要求美国驻华的一切海陆空军立即撤出中国。

[16]中美商约，参见本书《就当前时局问题发表的谈话》一文注[9]。[17]航空协定，参见本书《就当前时局问题发表的谈话》一文注[10]。

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现在已进入大反攻时期。自卫战争是从去年大打起来的，为什么那时不提出大反攻，不提出打倒蒋介石，现在才提？这是同志们所关心的问题。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不是随随便便提出来的，而是有根据的。我们先讲一讲过去一年自卫战争的总结。

日本投降后，党的方针是要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用什么方法实现？大家记得，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谈判，签订停战协定[1]，召开政治协商会议[2]，通过政协决议，那是用的和平方法。党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时期，在决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的。那时和今天是不同的，今天要用武力才能实现这一目的。这两个方法不同，是不是有一个对，有一个不对？大家知道现在这个方法对，只有用武力打垮蒋介石，才能有独立和平民主。那末，过去就不对？我们答复：现在对，过去也对。同志们会以为讲不通。讲得通的。那时，和平就是要在我们这边巩固解放区，在国民党统治区那边动员人民。那时用和平方法实现我们的目的，可能性大不大？不大，但要试一试。全国大部分人民要和平，全世界要和平，这个呼声，党不能不考虑。党是人民的先锋队，看得远，但先锋队不能脱离群众，要尊重人民的意见。经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人民要和平。因为人民有这种想法。所以要去试一试和平的但也是麻烦的方法。于是就有了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3]，有了停战协定，有了政协决议，蒋介石也签了字，可见也是有可能的。这样做，我们没有吃亏。在这期间，我们的军队开进东北，不是胜利吗？对大部解放区的巩固，部队的整理，也是有好处的。另外，我们照协议办事，蒋介石破坏协议，这就证明给人民看：蒋介石不要和平。不仅一次证明，而且几次（一月停战、六月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4]等）都证明蒋介石不要和平。这就把人民的认识提高一步：和平不是靠几个协议就能实现的，要靠武力保卫自己的利益，要用武力才能取得和平。从和平到要甲武力，其间有个过程，有个变化，就是人民认清了一个道理：只有靠武力才能解决问题。

在去年七月就提出打倒蒋介石，行不行？还不行。当时提的口号是武装自卫，还不能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因为当时主客观条件还不具备。蒋介石号称四百万军队，这么多部队，一下子不容易打倒。过去有人说，“国民党打不垮共产党，共产党也打不垮国民党”，“谁也消灭不了谁”。这种说法很流行。大打起来后，在人民中，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部分中间分子，不是都与我们的想法相同，还有很多人以为是准也消灭不了谁。如果我们那时就提出打倒蒋介石，他们会不相信，不接受。同时，去年蒋介石刚开始大打，我们如提出“打倒蒋介石”，他就会反过来说共产党要打他，进攻他。如果我们把自卫口号变成进攻口号，那末就成为国共两方面都要进攻，就抵消了。我们说自卫，就是抵制他的进攻。但是怎样表明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对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我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经过八个月的激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取重点进攻的方针。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也被粉碎，我人民解放军转入了全国规模的大反攻。本文是在陕北佳县神泉堡对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干部、战士所做的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

我们要打倒蒋介石呢？就是讲我们一定胜利！讲胜利信心，蒋必败，我必胜！而不是正面说谁消灭谁。我们这样讲，人民中许多人还要想一想，成不成？我们就拿事实来证明。我们人民解放军有把握，因为我们是新生力量，茁壮如青年，蒋介石犹如垂死的肺病鬼。去年一年的自卫战争，就证明了这个道理——蒋必败，我必胜！

去年一年自卫战争，蒋介石用三百万军队进攻我们。一年作战，死伤和被俘一百一十多万，就是说被消灭了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从人数上说。从建制上看，蒋介石共有二百四十八个旅，被我消灭九十七个半旅，平均一个月八个旅，还多出一个半旅，也超过三分之一。蒋军建制被打垮这样多，把打垮的再补充起来，就没有战斗力。如胡宗南[5]有几个旅就被消灭过两次，被我消灭一次以后，再来就容易打了。不少俘虏军官在放回去时说，再碰到我们一定举手缴枪。敌军的新兵是绑来的，像我们在《抓壮丁》那个戏中看到的一样，他们没有经过训练，战斗力弱，逃亡的比老兵更多。蒋军被我俘虏和击毙的将级军官就有二百多，新提拔上来的军官，战斗经验少。武器方面也是如此，美造装备有许多缴获到我们手里来了。所以无论从人力上、战斗力上、装备上看，蒋介石都不行。粮食也是如此，胡宗南军队打到解放区来，每天要用十架飞机运粮，才够他十万人吃。蒋介石的种种困难，证明他是无法长期打下去的。蒋介石不能消灭我们是定了的。这一点甚至已成为蒋军军官相当普遍的看法。不仅被俘军官这样看，就是现在蒋介石下面的军官，见到蒋介石时腰挺得很硬，说一定消灭共产党，但一背过蒋介石就摇头。开始大打时，蒋军是一旅一旅地被消灭，后来成为一师一师地被消灭。蒋介石说我们专门打他们的司令部，所以，旅长、师长都被我活捉了。那有这样的事？！他们的司令部都是在自己队伍的紧紧围护中，部队全部被我歼灭了，旅长师长当然被我活捉。对这样的消灭，那有不寒心不害怕的？所以，一年自卫战争的结果，就是蒋介石的军队承认不能消灭我们，而且他们是要失败的。在人民中，去年下半年还有许多人不相信蒋必败、我必胜，但自今年山东等地胜利以后就相信了。这是一个发展，这个发展很快，仅仅一年，变化就这样大，因此，经过一年战斗取得的胜利，我们有根据有把握地在“七七”口号中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九月又提出大反攻，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对这个口号，人民已经能够接受了。

蒋介石一年来做了许多蠢事，也证明他已无法统治下去。他单独召开“国大”，中共不参加，民盟[6]不参加，立刻就使它不能起作用，人民就不拥护它。人民不高兴他的“宪法”，就叫它伪宪法。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又在四月改组政府[7]。政协规定组织联合政府要有中共参加。他改组政府不要中共参加，中共当然也不会去参加。他拉拢了民社党[8]、青年党[9]，这两个党，人民很熟悉，臭得很，没有人相信他们。蒋介石的办法用完了，戏法变完了，再来一个没有了。单靠政治手法也不顶用，人民还要看一看：有没有饭吃？黄金涨不涨，美钞涨不涨？现在蒋管区不仅工农劳苦大众没法生活，就是小资产阶级、公务员也没法生活。美货滚滚来，入口大大超过出口，入口货半数以上为美国货，这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哪一个人会欢迎？蒋介石靠借钱过日子，四十亿美元早用完了，又伸手向美国借。人民已看到他靠借款也挽救不了军事上的大败、政治上的破产和经济上的崩溃。因此，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到处示威，反对美军强奸中国妇女，反对美军打死中国人，有的直接起来反对蒋介石。蒋介石出席参政会议时，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到礼堂闹

起来，使蒋介石下不了台[10]。蒋介石遭到人民反对，政治上破了产，所以我们应当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

为什么我们取得这样大的胜利？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能够成功？

第一，人民拥护我们作战，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做事的。土地改革，平分土地，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推翻封建势力，贫苦农民当家作主。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实行减租减息，是争取地主一道抗日。现在日本打败了，大地主拥护蒋介石。要打倒蒋介石的势力，就要消灭地主阶级，使他们都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土地问题解决得好，人民就拥护我们，仗就打得好。全国人口中的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其中得到土改利益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样大的力量，能不打胜仗吗？

第二，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是人民的子弟兵。他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是为人民谋利的。他有坚强的骨干，坚持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经过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锻炼，官兵一致，善于战斗。我们的军队有光荣传统，是战无不胜的。

第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得好。去年以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消灭蒋军在解放区内，就是在内线作战中诱敌深入，让他占些地方，把兵力分散，我们把人民动员起来，找机会消灭他，由此转到反攻。所以一年来，我们是战略防御，战术进攻，消灭敌人在解放区内。结果，他占我百余城，我们消灭他百余万军队，包括近七十万俘虏。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防御中的进攻，消灭他的有生力量。蒋介石的战略是进攻，而战术却是防御的。这个战术与日本人的差不多。如在陕北的作战就是如此，蒋军开始凶得很，但到了岔口时，他五个旅，我用同等兵力就把他围住了。他动也不敢动，没有一点攻击精神。这就是蒋介石、陈诚[11]用的战术。他们定的办法，专说如何防卫，如何突围，如何待援，如何警戒，如像一个人患了肺病，专门讲究如何防感冒，防咳嗽，防消化不良，防这防那，这样的人距死期也就不远了。

这是一年战争的总结。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二年提出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是适当的。

现在再讲讲如何达到打倒蒋介石的目的。

打倒蒋介石，这是早就定了的。十年内战是如此；抗日是一个时期，要他共同抗日；日本投降后一个时期，是要用和平方法打倒他；现在是要打出去，全国大反攻，不是消灭蒋介石在解放区内，而是要消灭蒋介石在蒋管区。去年一年我们是战略防御，战术进攻，现在战略也是进攻，蒋介石不仅战术是防御，而且战略也是防御了。光在解放区内作战消灭不了他，因为在全国他还占有四分之三的土地、三分之二的人口。只有战略进攻，才能彻底消灭他。口号一提出，战争行动就要配合，就是全国性反攻，就是打出去，突破解放区的界线，我们的行动完全是为实现这个口号的。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南下[12]，过黄河，过陇海路，直到长江以北。黄河是蒋介石的“外壕”，陇海路是他的“铁丝网”，长江是他的“内壕”。蒋介石总想赶我们过“外壕”，而我们已过了“铁丝网”，打到他的“内壕”了。形势变动了，我们是在黄河、长江之间来发展。中国中部有江、淮、河、汉四条大水，现

在要在这之间来打。这是南线，我们已有三路大军。西北解放军也要打出去。东北解放军已经出击。这是全国反攻的形势。我们的方针就是：打到蒋管区，发展解放区，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蒋管区。这个方针在今后一年到两年间要实现。有把握没有？有把握的、有根据的。从三方面看：

先从敌人方面看，他有三个弱点：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人民反对。

第一，兵力不足。蒋介石共有正规部队一百八十万，被打剩一百五十万，非正规军一百一十万，剩下九十万。今后一年，敌人减员数目还会大。就算和过去一年一样，每月平均被歼八个旅，还将有九十六至一百个旅被消灭，这是没有疑义的。他是否还能像去年补充那样多呢？肯定会更少。就算他一切照去年一样，再只减少三十万正规军，明年不也就只剩下一百二十万了！这样，蒋介石的兵愈打愈少。第一年，他的机动兵力多，开始用半数进攻，到今年四月份只有四十个旅进攻，现在则更少了。先看南线，这是他的主要方面。他的全部兵力二百四十八个旅，在南线用了一百五十七个旅，其中只有胶东十五个旅是进攻，其余都是防御。如我各路大军再获胜利，这十五个旅也会转为守势。北线七十个旅，只有孙连仲和傅作义[13]的二十九个旅能作点地方性的进攻。除去南北线二百二十七个旅，后备只剩二十一个旅。从各方面看，他的兵力不足。

第二，后方空虚。后方剩二十一个旅，当然空虚。而且其中有八个旅在新疆和甘西，新疆有民族问题，现在又闹起来，八个旅出不来了。另外的十三个旅，放在长江以南，云南两个，川康七个，广东两个，台湾两个，其他地方都依靠民团、保安队。保安队只能守，而且数量也不多，那好打得很。所以蒋介石的后方空虚不可言状。我们到了江北，江南就恐慌起来了。

第三，人民反对。上面已讲到蒋管区经济破产、政治黑暗，到处表现出来。那里的人民运动像海潮一样，时起时落，反对蒋介石的日益增多，连大学教授、开明一点的绅士商人也会参加。我们愈向外打出去，愈能促使蒋管区人民运动的高涨。

敌人方面的这三个弱点，是我们打出去的好条件。

我们方面充分具备了大反攻的条件。

首先是我军愈战愈强。过去，我们消灭敌人一个团一个营就算胜仗，现在消灭他个把旅都不在话下了。战斗力强了，人数也增加了。我们队伍的来源，除了大量的翻身农民参加以外，同时还有大量的俘虏参加进来。在我们部队里，解放战士占半数以上。经过诉苦教育，他们就调转枪口打蒋介石。例如这次打陕州的炮兵，前一天才从灵宝解放过来，第二天原人原炮就参加了战斗，这是历史上世界上所少有的。我们的正规部队，从去年到今年，差不多增多了一半，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已接近二百万人，蒋军总数也只有二百五十万，我们与他差不了多少。我们的主力走了以后，地方武装也能打下运城，围困汾阳。大的走了，小的就长大起来了。这真叫做大的不走，小的不长。

第二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影响，不仅在解放区，而且蒋管区的人民听了也喜欢。近来在华北开土地会议，要宣布一个新的土地纲领[14]，用彻底的办法平分土地。中国农民翻身，只有依靠共产党，要打倒蒋介石，土改和打仗，二者不能缺一。

第三是扩大解放区。去年一年，消灭敌人是在解放区以内，好处是我们有群众帮助。但是打一年可以，长此下去人民负担太重。只有打出去，才能

吃蒋管区的饭，扩蒋管区的兵，打翻蒋介石的征兵计划，破坏他的总动员。当然也有困难，在新区地形不熟，人民还没有与我们打成一片。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为人民办事，领导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就可以得到人民的积极拥护，解放区就可以更加扩大。

举行大反攻，国内条件都成熟了，再从国际形势看，许可不许可？关起门来计算可以有把握，但是美国人来了怎么办？对这个问题，我们要看世界大势，要分析，不要一提到美国就给吓住了。美国不可能用原子弹来对付农民战争。美帝国主义能给蒋介石什么东西？第一是给军火。过去他给了蒋介石多少？先是说给三十九个师的装备，后来给了四十五个师的装备，东北、山东给的最多，但是我们在这两个地区的缴获也最多，有什么可怕？第二是给钱。美国究竟能给他多少？从抗日以来共给了四十亿美元[15]，日本投降以来，占二十多亿，但是都被蒋介石用光了。美国还能再给多少？美帝国主义是“阔少”，很多国家都向他要钱，但他有多少钱？能给蒋介石多少？马歇尔[16]刚走不久，魏德迈[17]就来。为什么来？是想进一步控制蒋介石的军队与经济，经营台湾。宋子文[18]主张修铁路，建军事基地，筑海港，由美国控制。现在蒋介石卖国，让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更容易动员人民反对蒋介石。第三，再厉害一些，就是美国出兵。那末美国共有多少兵？一百一十多万。全世界许多地方他都要出兵，要多少？算他拿出二十万来中国，占全部兵力的五分之一。但二十万人放在中国算什么？顶多只能放在大城市，放在台湾。日本人在华北放过一百万，美国兵是少爷兵，就算他放上五十万，又算什么？同志们的确要打破以为美国了不起这样一个观念。如果美国真的出兵，那就完全暴露他的侵略面目，更利于我们动员人民。他顶多占几个城市。我们围困他，他不被歼灭就只有逃走。美国是可以打败的。不要以为我们在神泉堡这样落后的小地方不行，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在落后的小地方十大事情！美国的困难多得很，他的政治、经济危机不能避免。世界人民的力量一天天大起来，美帝国主义的日子更不好过。

总之，我们打倒蒋介石是有把握的，第二年打出去，实行大反攻的决定是正确的。无论国内条件、国际条件，都是有根据的，是能够实现的。当然不是再打一年就能解决的，要到第三年，可能到第四年。今后两年我们将要登上山顶，还要鼓两年劲，蒋介石的力量已是下降的，但还没有下降到最低点。现在是运动战，将来还要打阵地战，太原等城市还放在那里，最后如果美帝国主义守上海，我们还是要收回，所以火力要发展，要打阵地战。我们还有困难，如军事工业基础薄弱、干部不足、粮食不宽裕等等，这些困难都要我们来克服。战胜蒋介石，也就是把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根子挖去，所以战争不是小规模。中国地区这样大，四万万五千万人翻了身，革命胜利了，对世界革命有很大意义。所以打倒蒋介石，不要说还要两年，就是五年也划得来。同志们大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还怕等不到成功？我还有这个信心呢！

同志们会问，我们现在还在乡村，蒋介石、美国人仍占着城市，如何取得城市取得全国胜利呢？中国革命就是农村包围城市而后夺取城市。主力打出去以后，地方武装起来“拔钉子”。不要看胡宗南今天还占了陕北多少城镇，一旦我们大军到了大关中，他不走出要被我们拔去的。城市要在最后取得，才是牢靠的。要从局部到全国，就是这样发展。我们是从井冈山起来的，现在要到处建立解放区，解放全中国，整个形势的发展趋势是定了的。这个规律，党的领导同志是熟悉的，现在全党同志都要熟悉这个规律。

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是我们最兴奋最高兴的。无论在哪个部门工作的同志，都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都要做一个有用的螺丝钉，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

注 释

[1]停战协定，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

[2]政治协商会议，参见同上文注[1]。

[3]双十协定，参见本书《“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文注[7]。

[4]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起，国共双方在南京举行关于结束东北冲突，恢复交通，整编军队三个问题的谈判。参加谈判的除国共双方代表徐永昌、周恩来外，还有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美蒋方面对谈判毫无诚意，拒绝了我方提出的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四项建议。

[5] 胡宗南，参见本书《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一文注[2]。

[6]民盟，参见本书《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的重要谈话》一文注[2]。[7]这次改组政府，指蒋介石在一九四七年四月收买民社党、青年党和某些无党派的政客参加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宣称，这次改组后的国民党政府是“自由主义”和“多党”的政府，用以粉饰其独裁统治。

[8]民社党，参见本书《评马歇尔离华声明》一文注[5]。

[9]青年党，同上文注[4]。

[10]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国民党控制的第四届第二次参政会开幕，蒋介石出席讲话。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和苏州、杭州、上海赴南京学生七千多人到参政会的会址国民大会前游行，要求停止内战。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打伤学生百余人。

[11]陈诚，参见本书《论统一战线》一文注[10]。

[12]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五个纵队十三万余人，从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起，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陈赓和谢富治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两个纵队一个军八万余人，在同年八月二十二日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八个纵队十八万人，同年九月上旬挺进鲁西南，进军豫皖苏地区。

[13]傅作义（一八九四～一九七四），当时任国民党军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后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起义，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部长等职。

[14]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建屏（今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15]美国政府给蒋介石的军事、经济援助，截止至一九四九年的统计数字，抗日战争期间为十五亿六千七百八十万美元，解放战争期间为四十六亿四千万美元，两项共计六十二亿八百二十九万美元。

[16]马歇尔，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4]。

[17]魏德迈，美国职业军人。一九四七年七月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华，寻求支持与控制蒋介石集团的办法。

[18]宋子文，参见本书《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一文注[5]。

击破敌人假和平运动的阴谋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 在我人民解放战争日益胜利面前, 国民党区域各阶级、党派、团体、个人都在为自己前途作打算。进步的及中间偏左的分子, 多已表示赞成我党“五一”口号中召开新的政协会议[1]的主张。国民党反动统治中, 则有不少的派别及个人, 已在美帝国主义当仅派的策动和鼓励下, 进行一种假和平运动, 企图利用国民党区域一部分人民中尚存在的对于和平的幻想, 准备在蒋介石军队更加失败、国民党局势更加危急的时机发起政变, 表面上牺牲蒋介石, 宣布停战议和, 实际上是为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喘息时间, 以便休整兵力, 卷土重来, 消灭人民力量。在这一活动当中, 许多地方系军阀政客, 以李宗仁[2]为首, 企图取蒋介石而代之。一部分中间派右翼分子, 亦企图倒蒋取得权位, 使中国革命限制于他们所要求的范围, 避免彻底的改革。此外, 确有一部分人民天真地认为在蒋倒之后会有和平, 他们对于美帝、李宗仁及中间派右翼分子尚存幻想。至于蒋介石及其死党则将尽力挣扎, 非至万不得已, 不肯轻易下台。这样, 就使在目前的革命战争和反美反蒋的人民运动之外, 有一种复杂的情况和趋势在发展着。这一可能的发展, 中央在去年十月曾经告诉你们, 要你们在群众中进行准备工作, 现在这种工作应当加紧进行。你们必须认识, 美帝与某些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和平阴谋, 是对革命不利的, 因为它能够欺骗群众。但在另一方面, 倒蒋的活动, 显示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大分裂。蒋介石一倒, 不管政变者使用什么法术, 总是无法挽救反动派的命运, 而且会加深国民党分崩离析的局面, 这是对革命有利的。

(二) 你们必须注视这一局势的发展。在人民中, 在民主党派及民主分子中, 根据事情的演变, 不断地揭露美帝与中国反动分子的阴谋。你们必须注意具有说服性地而不是笼统地武断地分析这一阴谋的企图及其所具有的危险性, 以打破他们对于倒蒋和平的幻想。同时, 又要区别反动统治内部的倒蒋和平阴谋与人民群众及民主分子中的和平要求两者之间的不同性质。如果后者把自己的要求混同于前者, 必致为反动分子所骗而阻碍革命的发展。如果后者把自己的要求严格区别于前者, 则可利用反动统治内部的分裂而有助于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所以, 你们在国民党区不应笼统地反对和平, 反对某些人倒蒋, 而应利用各种倒蒋活动分化反动统治, 使我各个击破, 并准备将敌人的假和平运动转变为人民群众的真正和平运动。这就是说, 在凡有群众的地方, 或在某些民主分子的集会中, 当着反动派的倒蒋和平阴谋与人民的和平要求尚混杂在一起时, 我们不要害怕和逃避, 而应积极参加, 领导群众, 坚持人民对于和平民主独立的革命要求, 以区别和揭破反动派的阴谋。同时, 对于企图发动政变的国民党反蒋派别, 当着他们找我们商谈时, 你们亦不要拒绝商谈。一旦反动统治内部的政变果真爆发, 我们便能有准备地将敌人的欺骗口号转变为群众的行动口号, 这即是向代替蒋介石上台而依然是美国走狗的人们要求人民自由, 保障生活, 逮捕战犯, 解散蒋军, 取消伪宪伪国大, 停止美援, 撤退美军, 没收官僚资本, 实行土地改革等等, 以推动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 以配合人民革命战争走向全国胜利。同时, 也只有这样做, 才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稿, 经毛泽东同志修改过。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

有可能使那些口头上反美反蒋分子即中间派右翼分子在行动上有所表现，或者跟着我党前进，或者暴露他们的虚伪而在人民面前破产。但你们必须注意，对于一切中间派右翼分子，只要他们尚处在中间地位，尚未公开站在美帝及其走狗一边，直接妨碍人民革命的发展时，我们还必须联合他们一道前进，不要不适当地和过分地打击他们。

（三）如果你们对于上述这一策略方针能有清楚的认识，并坚定而又灵活地执行下去，你们将有可能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国民党区域进行活动，击破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注 释

[1]新政治协商会议，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里提出的政治协商会议，当时被称为“新政协”，以区别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召开的那次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仍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

[2]李宗仁（一八九一～一九六九），原为国民党桂系首脑。一九四八年四月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一九四九年一月任代总统。国民党政权崩溃后去美国。一九六五年七月回到北京。

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问题，对党来说，就是党与非党人士合作的问题；对青年团来说，就是团员与非团员合作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广大人民中间，大家彼此怎样合作的问题。这是我们进行革命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绝不是单靠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干部所能做到的。今天，青年团员才二十万，连党员一共也不过三百万，比起全国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来，这个数目是很小的，还没有达到百分之二。我们要带动全国人民前进，如果不同广大党外团外的人士合作，如何能做好呢！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过，不要骄傲和急躁，要谦虚谨慎；同时，要团结广大的非党人士，要同党外人士合作。这几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党也好，团也好，过去都有这样一个不好的传统，就是一听说这个人是党员，是青年团员，就放心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一听说是非党员非团员，马上就另眼相看。这样来划一个鸿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不管是在工人中农民中和学生中，党员和团员总是少数，少数人自己划个小圈子把自己圈起来，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就是“画地为牢”。

有的同志以为党内的同志什么都好，其实并不如此。一个同志一旦入党，那只是他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不一定完全入党。就拿我来说，我也是团员出身，后来转为党员的。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党内每个人都有长处，我们应该互相学习。党外人士也有许多长处，我们也应该向人家学习。每个党员都要长期锻炼，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成钢，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的。首先在生活上思想上作风上需要长期的考验。所以，我们入党入团以后，要很好地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才能很好地前进。这是对党员团员起码的要求。党外团外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进党进团，当然有些事情不知道，比我们差一点，但并不是没有长处。比如在农村中，许多农民比我们勤劳勇敢，比我们想办法；在工厂中的广大工人，比我们能生产，比我们能创造；广大的劳动知识分子、学生，有的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强。不过他们当中有些入觉悟得慢一点，或者一时还不愿意入党入团，我们要帮助他们，启发他们，把他们当作朋友看待，互相学习。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党员团员就另眼看待，而一旦入党入团就什么都放心了，这种态度是幼稚的，这个毛病是青年人容易犯的。

我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要在观念上，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干部一样来看待。我们先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最反动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孤立他们，反对他们，打倒他们。人民内部，当然还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最跟我们接近的是工人、农民、学生和劳动知识分子，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次是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我们要分别对待，争取他们，教育他们。共产党青年团要有这样的气概。我们今天是新中国的

主人，不能讲起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政权，人民民主的国家，可是做起来却是一小圈圈人，不像个领导者，反倒像个孤立主义者，做的跟说的不一样。青年人一定要非常谦虚，不要骄傲，应该觉得自己差得很，事情还做得很少；同时，我们还要团结所有能够争取的人。这就是说，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当然，这个宽不是没有原则的。我们首先是区别革命和反革命，对反革命不能存在任何幻想。我们这个大圈子，就是要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中最反动的几万、几十万、百把万、几百万划出去。同时还要看到，这里边有许多人还可以改造，比如地富分子，一旦土地改革以后，经过三五年的教育、改造，他们是慢慢地改变的。当然，不是一下子能够做到，但是前途还是有希望的。我们要有步骤地去做，使他们参加生产，逐渐地改造成为新人，不是囫囵吞枣，一下子都混进来。但是，我们在精神上要有这样的气概，把他们都改造过来，领导起来。

最近我们同国民党代表团[1]谈判。有的同志说，国民党代表团就那么几个人，费这样大的功夫，多麻烦！虽然是几个人，但是他们后边有一群。在他们影响下的军队、政府、党部里边的人以及公教人员，总有几百万，加上这些人家庭里的妻子儿女，就是千把万。对于这些人，他们讲的话比我们讲的影响更大一点。他们有代表性。争取几个头子就影响后边一批，有利于我们渡江，就是渡江以后也会发生作用。所以，对于反动营垒中可能分化出来的人物，要争取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

这样一想，我们就看得广了，不会把自己划在一个小圈子里边了。用这样的精神去做事情，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和我们一道走，同时反过来，我们还跟他们学习。我们要知道，有不同的意见的人跟我们来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辩证法就它的希腊字源来说，意思就是进行论战，联共党史上不是也讲了这一件事情吗[2]？在历史上，许多哲学家、政治家也喜欢争辩。圣人都喜欢辩论，何况咱们后生小子乎！为了寻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什么叫独断？就是我说的话就对，人家说的话就不对，那还辩什么呢？你的意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谁还跟你辩？即使自己有很多对的意见，但是还要听人家的意见，把人家的好意见吸取过来，思想才能更发展，辩证法就讲矛盾的统一，只有通过争辩，才能发现更多的真理。所以。青年人要学习，就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也有这样一种人，因为东听一句西听一句，把自己弄得惶惶无主，本来开始他还有主意，这样一听就失掉了主意。我们要听各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必须加以思考。一个人生着两个耳朵，能听话；生着两只眼睛，能看东西；生着两个鼻孔，能闻味。听话，能听正面的，也能听反面的；看颜色，能看白的，也能看黑的；闻味，能闻香的，也能闻臭的。所以，人体的机能也是合乎辩证规律的。我们必须听各方面的意见，辨别是非，从青年的时候起，就培养这样的思考力。还有这样的同志，见了党内的人和团内的人不怕，可是怕见生人，就像小姑娘一样。怕什么呢！我们应该去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有了这样的精神，在社会上才能团结更多的人一道前进。只有经常接近广大的群众，才能增加自己的勇气。一个人坐在房子里孤陋寡闻，这样不行，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做有大勇，我们青年很需要养成这种作风。

注 释

[1]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起，国共双方代表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的成员是：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是：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周恩来为首席代表。

[2]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 117 页。

学习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

中国人民的大革命已经走向全国胜利，我们青年要加紧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1]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在今天这个会上，我想把毛泽东同志如何值得我们尊敬和我们如何向他学习的主要的几点给大家说一说。

学习毛泽东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有极其丰富的内容的。我们青年代表回去，要向全国广大青年——农村、工厂、城市、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宣传我们代表大会的主张，动员和争取千千万万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一道前进。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旗帜就是我们最好的号召。我们号召全国青年跟着这个旗帜走，就必须认识这个旗帜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在座的朋友们向全国青年宣传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学习的时候，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了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你看这样还不够迷信吗？那个课本写毛主席的故事，把事情反过来，说他从小就不迷信，打破迷信，生而知之。毛主席说，这是不合事实的。而且一般地说，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管农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生长在十九世纪末的农村里，不可能没有一点迷信。为什么要说明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广大青年队伍中，不要因为有的人还迷信就认为他不可教育，就排斥他。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毛主席）。迷信是可以打破的。早两年你还不是迷信！你年轻时还不是有丑鼻涕！不要进步了对小孩时的丑事就不愿正视了。

毛主席常说，他也是读古书的人。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五四”那天我看到范文澜同志[2]写的一篇文章，说五四运动前后他就专门研究汉学[3]，学习旧的东西。但是当他一旦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

这是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三部分的节录，一九七八年十月八日曾在《人民日报》发表，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

所以在我们青年中，也不要因为有一部分人喜欢读旧书、研究旧东西就认为他们不可以进步，不要因为他有旧观念就不去团结他教育他，不要因为他落后一点就不理他。只要他愿意进步，就有改造的可能。毛主席说，他自己就是这样改造过来的。

毛主席还常说，他开始研究东西也是先搞一个方面，没有通就钻进去，失把这方面搞清楚。“五四”以后，毛主席参加了革命运动，就先在城市专心致志地搞工人运动。那时陶行知先生提倡乡村运动。恽代英同志[4]给毛主席写信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5]到乡村里搞一搞：毛主席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能再去搞乡村呢，这就说明毛主席当时没有顾到另一方面。但后来毛主席很快就转到乡村，又把农民运动搞通了，使城市和乡村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以后又搞军事，都搞通了，并且全面了。这也就告诉我们，有些青年人研究问题还没有进到全面，喜欢专心致志地搞一面，我们不要去打消他的兴趣；即使他不愿参加政治活动，我们也不要排斥他，可以慢慢地教育。

我讲这三个例子是说明：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我们看到在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所以对那些有迷信的青年，落后的青年，只认识片面不认识全面的青年，我们不要抛弃他们，要去教育他们。我们青年要互相学习，要让这些人跟着我们学习，同时我们也跟着他们学习。毛主席是从几千年的历史经验教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近三十年来的直接奋斗中生长出来的人民领袖。我们大家要从这方面来看毛主席的历史发展。这样，同志们中有了骄气就可以压下去了。毛主席都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哪一个人没有错误没有缺点？还值得骄傲？比毛主席差得远！

我们要学习毛泽东，还因为他是更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中国的革命自从他参加领导以后，方向就一天天地端正起来。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四个阶段都是正确的，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正确方向的。开始的时候，党中央也好，一部分革命群众也好，常常自己弄错方向，迷失方向，但是毛主席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大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但是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上接受。十年内战时期他是对的，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搞错了，没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抗战时期，全党承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抗战成功了。到这次解放战争，更加证明其正确。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正确的方向。他不断地指出真理，坚持真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在中国革命三十年中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他的方向都是正确的。

毛主席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方向的实现，只有一个人懂或者少数人赞成是不成的，要在群众中实现。要实现原则，就要使它具体化，使它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都来执行。

坚持真理是会遇到困难的。毛主席不仅指出了原则，而且还制定具体的政策、策略来实现这个原则，每个历史时期的政策都是适合这个时期的。这一点，青年们在研究《毛泽东选集》时就可以看到。大革命时期，必须使农民运动深入发展到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说明了这个真理，拥护农民提出的办法，并加以发挥，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的办法。不过当时共产党的领导机关没有接受，大革命失败了。内战时期，毛主席提倡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你们去研究毛主席在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决议案，今天人民解放军中所实施的政治工作就是从那时一直发展下来的。但是毛主席的主张经过多年才逐步实现，中间遇到许许多多的挫折。当时大家虽然在形式上接受了，但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真正到实际中具体化了，大家才能懂得它的威力。抗战中要团结蒋介石的政府来抗日，明知道他动摇、消极，但是必须推动他抗日，才能动员全民族的力量。

既要团结他，又要防备他，同他的反动的一面作斗争，所谓“有团结有斗争”。用这样的策略来进行抗战，使人民自己的力量壮大，这就需要说服很多人同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就有一些人说，既然要团结就不要批评。党内也有人有这样的意见。所以要使这个原则真正实施，就要经过许多曲折的斗争。解放战争比较顺利，但也还有小的挫折和错误，譬如土地改革中，也曾发生过“左”的错误，一直等到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告[6]出来了才得到全面的纠正。这都说明，一个原则、真理、政策在实际中实施，是要费很大的力量，做许多的具体工作的。毛主席不但能够坚持真理，指示方向，而且还拟定了许多具体政策、策略来贯彻这个真理、原则。不如此就无法使革命达到胜利。所以毛主席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使它具体化。这样才能有今天的胜利。我们青年人学习毛泽东，不仅要懂得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原则、真理，还要研究他的具体的政策、策略，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深入实际。我们青年人不是要空谈，而是要实行。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的革命领袖列宁也说过，“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7]”。这对于我们青年正是一个宝贵的教训。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我们青年要在这上边来学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体化，买现在中国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说，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总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他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所以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毛主席当看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毛主席在党内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他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如我刚才说的，在十年内战的时候就是如此。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的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不赞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着打。结果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办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像刚才说的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在长征路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他的正确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错误路线，带着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冲出了危险的局面，到达了陕北。最后证明毛主席的主张是对的，多数是错的。这都说明，正确的意见不为大家所接受的时候，怎么办？

就要等待，就要说服。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组织上还要服从。当着群众被蒙蔽的时候，不容易接受真理，等他们慢慢地觉悟起来以后，就会拥护正确的意见。所以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当然这个等待过程是痛苦的。假使那时党的领导机关很早就接受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革命就不会受那么大的损失，我们的力量就会更加壮大。但是我们这个落后的中国社会，反映到党内，反映到革命团体里，正确的意见常常不容易被大家立刻认识。这样就要等待、说服，就要经过痛苦的过程。不过，这种情形在今后的工作中遇见的会少了。因为今天共产党的中央不像当年了，绝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毛泽东这个领袖，都心悦诚服地信服这个领袖；在人民中也拥护这个领袖。但是，这也仅仅在大的方向上。譬如说，今天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在这样大的方向上大家都同意，而在具体的政策、工作上还是会有很多争论的。所以需要学习，学习毛主席这种坚持真理，指示原则方向并将其具体化，成为人民的力量过程。这不是急躁所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坚持性忍耐性，不屈不挠地把革命推向前进，这样才能达到最后的胜利。我们不能认为把一个简单的口号提出来就算了，就够了；也不能行不通就失望，行得通就自满，不再前进。那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

毛主席在坚持真理、实现真理中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他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不错，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同时今天大家也都承认他是全国人民的领袖。从中国共产党的范围来说，他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数量只有几百万，在全中国的人口中连百分之一还不到。代表这样一个阶级的共产党怎样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的根本着眼点就是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用到中国，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的圈子里来空谈革命。毛主席懂得，为把最反动的敌人消灭，就需要集合一切可能集合的力量，而不是只靠先锋队办事。无产阶级是先锋队，但不能仅靠先锋队。在大革命时，毛主席就看到农民是最广大的同盟军，不依靠农民，人民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果然，不听他的话，革命就失败。后来我们到了农村，毛主席又看到革命不但要依靠农民，而且还要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因为当时蒋介石反革命的恶迹更加暴露，只有买办官僚地主封建阶级才拥护他。但是在共产党内有一部分人又犯了“左”倾错误，眼光狭小得很，认为中小资产阶级都不可靠，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致使革命又受到一次挫折，走了一个两万五千里。以后，毛主席提出团结蒋介石上层分子抗战。有人就说，要团结就不要斗争。毛主席说，这些人是我们国内的敌人，为了打民族敌人，要团结他，但他并不是可靠的合作者、同盟者，还要提防他，如果不加提防，他反过头来就会咬你。当时毛主席就防止了右，防止了无条件妥协。这一次解放战争，在乡村搞土改，工作中又犯过“左”倾错误。因为要消灭地主，就不给地主土地，或者给地主坏地，使他们不能生活，或者定的封建富农、地主的数量过多。另外，在杀人问题上，本是除怙恶不悛、人人痛恨的要杀外，其他可以不杀，但是有时候在群众愤恨之下，没有加以区别，领导没有说服群众，以致杀人过多。这样就使我们阵线中的农民，首先

是中农受到影响。这个错误，也是毛主席把它纠正了。从这四个革命阶段可以看出，毛主席统一战线的观点是要团结最广大的同盟军，各个击破敌人。在抗日时期，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走后，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中国的反动统治。在乡村中，打倒封建地主阶级——这是反动统治的根基。在国际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围绕着这些口号，把更广大的农民团结在一起，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所以毛主席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我想，在毛主席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动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这一点我们青年要学习。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胜利实现，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做许多艰苦的具体工作，不屈不挠地前进，长期地奋斗，努力争取大多数的人民，争取大多数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走，而不是靠着我们这个小队伍。

青年联合会最大的作用就是组织全国广大青年，推动与教育他们，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共同前进。我们联合青年，不包括反动青年，不能让他们钻进来。但是，我们必须把愿意为新民主主义事业奋斗的青年完全包括在内。这些愿意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青年，思想虽然还不是一致的，但是今天他们愿意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之中有些人虽然还有迷信观念，落后观念，或单纯的技术观念和片面的观点存在着，我们也要把他们包括进来。因为我们可以教育改造他们。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学习的口号和目标，即“学习毛泽东”。这个口号和目标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不仅是进步的青年能接受，其他青年也能接受。当然，团结教育青年，并不是只给大家讲共产党的好主张，不讲共产党犯过的错误。在这个青年会议上，我们不但不向同志们隐蔽共产党的错误，相反，有好多错误在今天都讲出来了。我今天讲的一些党内的事情，你们过去是不晓得的，甚至党内有的同志也还不晓得，可是你们今天就晓得了。今天你们所代表的，不是几百万青年，而是几千万上万万青年。那就要请你们考虑，共产党不能冒昧地把他的主张压在成千成万的青年头上。这样的思想是国民党的统治的思想，人家不能接受硬叫人家接受，把帽子在人家头上一戴，像观音菩萨的紧箍咒一下子箍在孙悟空头上。学习毛泽东，我们不是用压迫的方法。这只是我们提出来的口号，这口号很响亮，能使广大青年接受。

因为毛主席在今天不单单是中国青年的领袖，而且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我们的一面旗帜。

这里需要解释一个思想自由的问题。反动派常常说他们主张思想自由，蒋介石就是这样说的，大家知道这是鬼话，在蒋介石的统治下还有什么自由呢？人民普遍地受压迫受剥削，只有少数的地主官僚资本家反动分子有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剥削、压迫、屠杀人民，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只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广大工人农民没有思想自由。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人民大众是有充分的思想自由的。只要不是反动思想，其他思想都可以存在。不仅是进步的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可以存在，就是相信宗教的思想也可以存在。除了反动的思想不允许宣传外，其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都是自由的。共产党认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最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是最正确的。这个当然要讲。但也不是不让这个思想以外的思想存在。我们以我们的思想教育大家，但是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

受，可以自由选择。这样才是一个教育的态度，领导的态度，才是一个共同工作的态度，合作的态度。

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学习毛泽东”，但也不限于这个口号。在这个口号之下，我们青年还要分门别类地学习，比如新民主主义的建设，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知识，各种专门科学技术，都需要学习。学习，也正是毛主席的一个特点。他就是日夜不息地学习，他从来也没有感到满足过，他常常说这方面不会还要学习，那方面不会还要学习。我们要做他的学生，就要学习他这个精神。

我讲这样几点当然不是介绍毛主席的全部功绩和主要学说，我说的仅仅是毛泽东思想的很少的一部分。毛主席创建人民军队方面的成就，他在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在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经济上的一些文章，在文化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哲学上的创造，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等等，多得很。毛主席的成就不仅广，而且专，而且精，在这里不多说了。毛主席的学习态度，他自己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他是最老实的，是则是，非则非。他是最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在三十年的革命运动中，他就是在反对骄傲反对急躁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他的作风也是谦虚而又谨慎的。正如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所说，既有着革命的胆略，又有着求实的精神。所以我们要学习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态度、作风上，也就应该老实，不要沾染浮泛与骄傲急躁的习气。中国共产党在人民革命运动中有过这样的经验。我在过去也是急躁的。当然这不是青年一代很容易学成功的。我们要兢兢业业，力求少犯错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重复错误。青年人没有不栽几个筋斗的，没有不碰几个钉子的。碰了钉子后，不要气馁。我们在革命斗争中不知流过多少血，遭受过多少挫折，有多少人倒下去了。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要丧气，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从地下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进。要有这样的志气，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今天即将夺取全国的胜利，光明在照耀着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因胜利而骄傲起来，觉得不可一世，而忘掉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才走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有很多很艰苦困难的工作等待我们去做，这里有两种教训值得注意：一种教训是看不起别人，脱离群众；一种教训就是蜕化了。这是我们青年的“敌人”。我们应该排除急躁、骄傲、气馁、灰心、丧气，学习毛泽东的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稳步而又勇敢地前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带动上万万的青年前进，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全国人民的民主解放和民族独立，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并且为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我们的口号是：“全国青年团结起来，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

注 释

[1]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至十日在北平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后改称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2]范文澜（一八九三～一九六九），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在党的第八、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后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

[3]汉学，亦称“朴学”，指汉儒考据训诂之学。清朝的一部分学者用汉

儒的方法研究经典，注重一字一句的考订，称为汉学，以与宋儒空谈义理的“宋学”相对立，汉学对整理古籍，辨别真伪，有不少贡献，但往往流于为考据而考据的倾向。

[4]恽代英（一八九五～一九三一），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创办《中国青年》。一九二六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三月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六届二中全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就义。

[5]陶行知，参见本书《评马歇尔高华声明》一文注[8]。

[6]这是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的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4卷，第1243～1263页）。

[7]见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7页）。

**亚洲的事情应当
由亚洲人民自己处理**
(一九五 年三月十八日)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三月十五日又发表了一篇关于亚洲的冗长演说[1]。艾奇逊近来不断地发表演说谈话，其目的是欺骗一部分对于美国侵略政策还缺少经验的人们。但是人们只要拿事实来对证一下，就可以看出艾奇逊的话是颠倒的。艾奇逊在十五日的演说中说：美国不要从亚洲“取得任何东西”，不要使亚洲人民“得不到任何机会，任何自由和任何权利”。但是在事实中，美国不但在五十多年前就取得了菲律宾和太平洋上的许多战略岛屿，不但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以后控制了日本和南朝鲜，而且力图控制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缅甸和印度。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政府为了取得中国，曾经支持蒋介石匪帮进行了大规模的内战，使中国人民得不到独立地和平地生存的任何机会，任何自由和任何权利。直到现在，美国政府还在供给蒋介石匪帮以轰炸机来轰炸中国大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美国正在以同样的方法支持保大[2]、李承晚[3]和季里诺[4]等傀儡，以破坏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朝鲜、菲律宾等地的民族独立运动。但是艾奇逊却说，美国是“支持”亚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的。这难道不是极端的颠倒吗？

艾奇逊对中国人说：你们为什么不要求美国的援助呢？美国是多么想“援助”你们啊！但是中国人已经从亲身的经验中懂得了美国的所谓“援助”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几百万人的死亡，就是民族自由和权利的丧失。自从中国人摆脱了美国的“援助”，中国就好起来了，就真正地独立起来了。这个教训，对于全世界人民都是有益的，对于已经或正在被美国帝国主义选择为侵略对象的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尤其是有益的。

艾奇逊对于新缔结的中苏两国的伟大同盟关系，企图继续进行挑拨，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他的卑鄙的造谣污蔑，不过等于一只蜉蝣想去撼动世界和平的万里长城而已。艾奇逊在一月十二日不是就宣布过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四大地区“实行合并”吗[5]？他在三月十五日的演说中为什么不敢再提了呢？一切造谣者只能有一个前途，这就是彻底的破产。

艾奇逊恫吓说：中国人民和苏联结成了平等友好的同盟，而把美国侵略者的“固有友谊”漠视不顾，这就是“敌视美国的利益”。他又恫吓说：亚洲的事务中国必须不加闻问，否则就是“不仅违反中国人民的每一种传统和利益，而且将违反他们的亚洲邻邦的、美国人民的，以及——真的——一切自由人民的传统和利益”，而且将“违反联合国的宪章”。我想，我应当代表亚洲最大的国家及其人民告诉艾奇逊：这些可笑的恫吓早已过时了，安静些，并且看看地图吧！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应当由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例如艾奇逊之流，来加以干涉！

注 释

这是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演说的谈话。刊载于一九五 年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1]指艾奇逊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五日在美国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国民俱乐部发表题为《美国对亚洲的政策》的演说。

[2]保大，原名阮永瑞，越南阮氏王朝第十三代皇帝。一九四〇年日军侵占越南后充当日本傀儡。一九四五年越南“八月革命”后被迫退位。此后，在法国的支持下不断进行复辟活动。一九四七年又得到美国的支持。一九四九年六月以“立宪君主”名义在越南南方复辟。一九五五年被废黜。

[3]李承晚（一八七五～一九六五），当时是美国扶持的南朝鲜总统。

[4]李里诺（一八九〇～一九五六），当时任菲律宾共和国总统。

[5]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记者联谊会上发表关于美国对亚洲政策的演说，他在演说中称“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满洲”（我国东北地区）、内蒙古、新疆为“中国的北部省份（地区），并认为这四大地区已经正在”从中国分离出去，使他们附属于苏联”。

向安理会发表的重要声明 (一九五 年七月六日)

成功湖

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并转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六月二十六日在美国政府指使和操纵下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并且这一决议是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下通过的，显然是非法的。联合国宪章规定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而安全理事会六月二十六日的决议正违犯了联合国宪章这一重要原则。因此，安全理事会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不仅毫无法律效力，并且大大破坏了联合国宪章。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关于朝鲜问题的行动，正加深了这一破坏性。

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六月二十七日关于以武力阻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台湾的声明和美国海军侵入我台湾沿海的行动，是彻底破坏联合国宪章关于任何会员国不得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其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原则的公开侵略行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不仅是举世公认的历史事实，而且也是开罗宣言[1]、波茨坦宣言[2]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秘书长对于美国政府这一公然侵略行动却又一声不响，放弃自己维护世界和平的职责，并成为顺从美国政府政策的工具。我现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声明：不管美国政府采取任何军事阻挠，中国人民抱定决心，必将要解放台湾，专此奉达，即希查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一九五 年七月六日于北京

注 释

[1]开罗宣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发表的宣言。声明：“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日本亦将被逐出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宣言最后声称，“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2]波茨坦宣言即《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也称《波茨坦公告》。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波茨坦会议通过并发表，同年八月八日苏联正式加入。主要内容是：盟国对日作战直到它停止抵抗为止，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

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国所决定的其他小岛之内；日本军队要完全解除武装，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远铲除；日本战犯将支付审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碍必须消除；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

建设与团结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诸位代表，诸位同志：

我很高兴今天能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去年的筹备会上，我曾经和在座的一些同志谈过中国科学工作者的任务与前途问题。现在我们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成立了科学工作者自己的领导机构，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对于自然科学，我是门外汉，谈不到贡献什么意见，主要应该向诸位学习。不过自然科学工作者也会关心另外方面的一些问题，如自然科学工作的环境，自然科学工作与各方面工作的联系和关系，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岗位和前途等等。现在我就这方面的问题讲一些意见，题目是“建设与团结”。

首先讲一讲建设问题。

先从中国自然科学家本身说起。依我看，一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认识。他们在事业上下功夫、费精神，目的是为人类扫除生存中的障碍，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和发展精神生活。学医的想把病人治好，学农的想把农作物病虫害消灭，学工的想把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搞得更好，学理的为着增加人类的科学知识，使世界文化水平更加提高。一般地说，科学家是不愿意利用科学知识来毒害人类的。当然，世界上也有一些科学家不是这样，如日本的某些细菌学家研究细菌战争，做危害人类的事。但这只是极少数，而且有的是被迫这样做的，只有更少更少的人才是自觉地去做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科学家，从他们本身学习和工作的目的来说，都是为着造福于人类的。

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呢？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有条件团结科学家们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相信科学家们能够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善良的，在旧中国他们被压迫了多少年，今天已经和人民一道翻身了。

自从海禁开放[1]以后，西方的文化科学进入中国。可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究竟得到多少好处？又受到多少坏处？中国人自己能够掌握科学来为人民谋幸福吗？在反动政府统治下，不论是清朝、北洋军阀[2]或国民党反动派，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虽然有少数科学工作者埋头从事建设工作，如铁路、水利、工程建设都有中国的工程师自己计划、设计的，不能说中国的科学家没有个别的人获得成就，但总的来说，成就是很少的。他们的工作时常遭到反动统治者的破坏。如李仪祉[3]先生在关中兴修水利，对关中的农业尤其是棉田有很大好处，但是后来孔祥熙[4]压低棉价，大大损害了棉农利益，使他们无法继续经营棉田，水利也因此受到影响。举此一端，可见全貌。

反动政府的摧残和破坏是国内的因素，而更大的破坏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站在中国人民头上，利用科学作为剥削、压迫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手段，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帝国主义者控制了我们的经济，中国的工业生产很多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农业原料也被他们掠夺了去，加上水灾旱灾连年不断，哪里谈得到真正的建设。尤其是抗日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更是数不胜数。例如，花园口的决堤[5]造成了极大灾难，创伤至今未能平复。去年淮河有水灾，今年又有水灾，直

接原因就是蒋介石在花园口决堤，黄河的泥沙流入淮河，使淮河的河床增高，洪泽湖的水位高出周围的田地，因此经常发生水灾。

由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破坏，旧中国不能进行建设，科学也很难在旧中国的土壤上生长，科学家没有办法贡献自己的能力。但是有良心的中国科学家并没有放弃建设中国的志愿，不少人为中国的前途和中国的科学发展摸索道路，寻求真理。然而他们并没有成功，他们一直受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迫，理想不能实现，计划不能实行，工作不能开展，甚至连生活也陷入困境。这部科学家的苦难受，诸位比我了解得不知要深刻多少倍。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中国人民翻了身，这就给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无限广阔的康庄大道。去年，人民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6]规定了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也就是规定了中国科学家的奋斗目标。这个方向和目标是很清楚的，这正是近百年来中国科学家所寻求的。

方向和目标确定了，但道路是要我们一步一步去走的。诸位都明白，我们所接收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要在这个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必须先打好基础才行。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接收了什么遗产呢？他们留给我们什么科学器材、设备和资料呢？太少了。这并不是说诸位科学家不努力，而是反动派不让我们做，不让我们有机会勘测地下的富源，不让我们有机会纪录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功绩，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目前我们的财政经济状况已开始好转，但要达到基本好转还需要经过三五年困难阶段，也就是恢复、整顿、调查和有重点地建设阶段，然后才能在全国规模上进行建设。

在国家建设计划中，站在科学家的岗位上，我们开始做些什么呢？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

农业方面。首先是实行土改，解放牛产力，然后求得发展。中国本不是缺粮的国家，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现在进行的土改[7]，就是要使农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桎梏中解放出来。这项工作需要两年左右时间。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做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华北的永定河，实际上是“无定”的，清朝的皇帝封它为“永定”，它还是时常泛滥。不去治它，只是封它，有什么用？国民党统治时，有一个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得不到支持，因为反动派不需要做水利工作，反动政府不是为人民办事的。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要开展这一工作，把全国的水利专家都集中起来也不够。兴修水利，联系到动力，更需要有长远的计划。

第二，修筑铁路。以中国之大，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与工业先进的国家不能相比。这件事也必须在恢复工作中大力来做。铁路交通首先要保证东北的粮食能够运出，调剂关内缺粮的地区。

第三，制造化学肥料。这一点侯德榜[8]先生很了解。我们要大力发展化学肥料工业，不然就要从外国进口，消耗外汇。

不说旁的事情，单说这几件大事，都需要科学家的努力。现在的专家不是太多而不够。代表中的萨福均[9]先生，曾和詹天佑[10]先生同时修粤汉铁路，他知道中国的铁道专家也是很少的。

讲到林业，中国森林的面积，远不够一个森林国家的标准。基础太小，林政不修，森林采伐不按科学的方法，这需要大力整顿。如东北森林地区，据调查，如果林业工作不加以改进，快则十年，慢则二十五年，就会完全毁了。不科学的采伐，没有护林和育林，森林地带也会变成像西北那样荒山秃岭。我们需要林业专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工业方面。据初步统计，我国有六万多台机床。其中有的没有转动，有的生产安排不当，如工厂距原料产地太远、产品并非急需等。这些机床的调整与修复，也是需要大力进行的工作。从国防观点来看，工厂不能都放在沿海。过去许多工厂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现在要为人民利益服务，就要面向广大的内地农村。联系到动力问题，愈到内地，动力愈不够，这就需要勘测燃料资源。大家想一想，需要有多少科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医疗卫生方，在。全国卫生会议提出普及医疗画业的问题，希望在三五年内使每一个县都有医院，每一个区都有卫生所。这就得增加九万多名医生，数十万名护士和助产士。这要用三五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来。现在我国的中医人数没有统计，西医人数估计有三万上下。医生的人数是太少了。

国防工业方面。制造兵器、飞机等都需要专家，也感到人才不够。

总起来说，各种建设从恢复、整顿和调查开始，已经看出现在的专家是不够的，我去年说过，只要整理工作有了头绪，就会感到我国的科学家不是大多而是太少。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今天我还不能把全国的建设计划向各位报告。全盘的计划要等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才能决定。不过现在可以肯定，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岗位是有的，他们的工作是国家急需的，问题是需要时间来合理调整。现在对科学家人数的统计很不完备。我很高兴这次会议成立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组织。有了组织，就有力量，就给我们以机会，从调查统计全国科学家人数着手开始工作。我正式提议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首先进行这个工作，政府愿给以一切物质上的帮助。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到底有多少？他们的水准、专长、职业、资历怎样？要做一个全盘的调查。这样，我们就可能更好地把他们安排在适当的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现在我们对这方面的情况不清楚，可能埋没了许多人才。调查统计对政府从事建设工作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调查统计之后，虽然不能人人马上都有适合自己能力和志愿的岗位，但至少可以向这个方向努力。今天安排的岗位不适当，明天就可以安排得适当些。今年的待遇差一些，再忍耐一些时候，三年左右，情况一定会好转的。我们只会一天一天好起来，下会一天一天坏下去。在旧社会，我们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受到压迫，现在精神上解放了，物质上再忍受一时的困难不算什么。我还希望现有的科学家能培养出更多的青年科学工作者，让他们跟着你们一道前进，这样，中国的科学事业才有前途。

再讲一讲团结问题。

为了有效地工作，科学家必须团结。说到团结，很容易想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在阶级社会中，人类是划分为阶级的。有阶级的区分，就有阶级的斗争和阶级的团结。我们的国家是多阶级的国家，今天要打倒的

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团结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将来阶级消灭了，还需要继续与自然界作斗争，仍然需要团结。与自然界作斗争是无限的，所以团结也是长久的。自然科学家当然懂得这个道理。

现在我们内部还有破坏团结的因素存在，所以团结问题更加重要。我们必须划清界限，分清敌友。团结谁？反对谁？团结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凡是承认《共同纲领》的都要团结。不论是私人开设诊所的医师，或是在私人工厂中服务的工程师，今天都是需要的。我们国家今天的财力有限，不能立刻建立那么多的医院，因此还需要私人开业的医生的帮助，他们对国家对人民是有益的。所以，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知识分子，不管是工农出身、小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出身，我们都应该团结，对他们都要尊重，目的是要打倒共同的敌人。现在国内的敌人已经打倒了，国外的敌人还存在，尤其是帝国主义还存在，我们必须与破坏人民事业的敌人作斗争，这就是团结的前提。我们反对甘心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少数堕落的科学家，但有一些科学家是被动的、盲目的，或者是在非常不得已的条件下跟着敌人走的，我们很愿意争取他们回来，欢迎他们回来，科学家最易于接受真理，我们可以用事实说服他们。在这方面我们要进行说服工作。人民同他们没有私人的恩怨，只有对反动派的共同仇恨。

各民主阶级团结起来了，科学家一定会比其他人团结得更好。

凡是为新中国努力服务的科学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团结。为了实现和巩固这个团结，我们必须破除门户之见。自然科学是分门别类的，大家所学的不可能一样，各人所努力的方向自然也不同，但是不能因此而有门户之见，互相歧视，如学这一门的看不起学那一门的。在同一部门中这个学派看不起那个学派。我们的自然科学，有许多是从国外学来的。学医的有德日派和英美派，彼此形成门户，同样，学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农业、交通的人，也有这类门户之见。门户之见是受旧社会的影响形成的，很不利于我们的建设事业。今天我们要强调集体合作，抛弃那种旧的影响。各方面有各方面的长处，大家要彼此看到别人的长处，保持各自的长处，去掉短处，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当然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

中国共产党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是决心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党内同志尽管在大的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各人所处的具体环境的局限，相互间容易产生隔阂。如长期处在农村游击环境中，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互相隔离，产生了山头主义，形成了门户之见。又如在白区的革命工作者，长期处于秘密的环境中，容易产生只看到局部的倾向；而在根据地工作的同志，则习惯于一切公开，容易忽视秘密工作。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不多，工业发展的程度不高，社会主义传统不深。在共产党内，党员的出身和成份不同，也容易产生不同的思想。因此，我们党开展的整风运动[11]。经过两三年的整风，迎来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2]，增强了党的团结，使我们党在日本投降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解放战争中更加显出了力量。以上是说在共产党内也还存有门户之见，需要整风。难道在共产党以外的团体，在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之间，就能够一下子很理想地团结起来吗？

我们不能空想，不能凭主观，消除这些门户之见一定要经过一个自觉的过程。要面对事实，才能寻找出正确的方法来克服我们的缺点。一个科学团体中，人们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有着不同的思想与生活方式，是很不容易

聚集在一起的。共产党员过的是集体生活，在战争时期生活在同一队伍之中，而科学家是一小群甚至是极少的几个人在一起工作的，因此养成了各种不同的性格。科学家的良心、骨气是可钦佩的，但是科学家的脾气有时是很难相处的，这都是一定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我们要用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要了解生活环境可以影响脾气，既然环境变了，脾气也是可以改的。

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筋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只有在共同的大前提下，个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在旧社会，反动派利用知识分子的弱点，孤立他们，分裂他们，这样来操纵他们。人民的国家给大家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逐步消灭一切束缚人类发展的阶级和反动势力，实现真正的进步和自由。以全人类的力量来和自然界作斗争，这是多大的自由，多大的个性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个性得到正确的发展。不然，这部分人的个性发展了，就排斥和压迫另一部分人，这叫什么个性的发展！在人类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少数人无止境的欲望，妨碍了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这样的个性发展是专制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我们集体主义者反对这种个性发展。我们要发挥集体主义的精神，打破个人主义的小圈子，群策群力，与群众结合，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今天的胜利是经过几十年的斗争而得到的。我们今天抬头、翻身、开步走了，我们应该在团结上努力，携手共同前进。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战乱，我们是欢迎和平的。我们有信心在这一辈子能看到光明、幸福、富强的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开卡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13]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注 释

[1]清朝初年，因郑成功等在东南沿海领导反清的武装斗争，清政府厉行海禁，严禁人民出海，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才允许商民造船出海，并于一六八五年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商来华贸易。一七五七年，由于英国等殖民者在中国沿海进行非法活动，清政府又下令只准在广州通商，并制定了许多外商来华贸易的禁例，继续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六一年，英、法等国家先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迫使清王朝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开辟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喀什噶尔等地为商埠，并剥夺了中国关税自主权，取得了深入内地贸易、自由传教和招募华工出国等项特权。这样，它们用炮火打破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局面。后来，人们把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这种形势，称为“海禁大开”或“海禁开放”。

[2]北洋军阀，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

[3]李仪祉(一八八二~一九三八),陕西蒲城人,水利专家。一九二二年起,历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曾提出很多治理黄河的意见,主办过陕西省泾惠、洛惠、渭惠和织女渠等灌溉工程。

[4]孔祥熙(一八八~一九六七),山西太谷人。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长期控制国民党政府的财权。一九三八年他在任行政院长时,颁行“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实行所谓战时经济管制政策,大幅度压低棉花价格,对农民进行公开的掠夺。据统计,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陕西每市担棉花所能换取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只相当于抗日战争前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5]花园口的决堤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炸开黄河大堤的事件。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徐州,随即沿陇海路西进。六月初,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以儿花园口黄河人堤,企图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西犯。结果不仅未能阻住日军进攻,反而给人民造成空前灾难。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四十余县被淹,数十万人溺死,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大水过后,留下了一片连年灾荒的黄泛区。

[6]《共同纲领》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确定了当时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7]土改这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一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8]侯德榜(一八九~一九七四),福建闽侯人,化学家。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先后创办塘沽水利碱厂和南京水利硫酸铵厂,一九三九年发明联合制碱的生产技术,称为侯氏制碱法。一九五一年时是水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一九五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

[9]萨福均(一八八六~一九五五),福建福州人,铁路工程专家。曾参加修建粤汉铁路。一九五一年时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兼西南铁路工程局副局长。

[10]詹天佑(一八六一~一九一九),广东南海人,铁路工程专家。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九年主持修建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今京包线的北京至张家口段),后又主持修建粤汉铁路:

[11]整风运动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

[12]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

在延安举行。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这次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3]大禹是传说中我国古代部落联盟领袖。他率领群众用疏通江河的办法治平水患。

抗美援朝[1]，保卫和平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朝鲜反侵略战争胜利地开始，大家看到了朝鲜人民的英勇，同时也看到美帝国主义的残暴。

七月半以后，美帝国主义向南撤退，迅速地把军力集结在朝鲜半岛南方大邱地区，意图引诱朝鲜人民军向其进攻。年轻的朝鲜人民军是勇往直前的，要一直把美国兵赶下海去。当时的形势已表现出战争将长期化。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的国家，朝鲜人民军是一支年轻的部队，他们战斗非常英勇，真使我们感动。敌人依仗暂时的强大，有意制造阴谋。现在朝鲜是困难的，但他们英勇地坚持着，在南方打游击，在北方抵抗，斗争仍在继续，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生长出新的力量来打败敌人。朝鲜地方较小，所依靠的基础是九百万人口，以这样的力量，抵抗这么强大的敌人，下了长期抵抗的决心，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应当赞佩。

朝鲜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它同国际上的其他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朝鲜人民的长期抵抗，将更增加问题的国际性。同时，朝鲜要胜利，也必须得到国际的援助，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国际的援助。我们应该发扬革命的道义。只有朝鲜胜利了，和平阵线才不会被打开一个缺口。如果朝鲜这个缺口被打开，则其他方面要相继被打开。东方阵线门户洞开，敌人打进我们的大门来了。怎么还能谈建设？

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从八月二十七日到昨天这两个月间，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已侵入我国十二次。最近不仅在鸭绿江。而已已飞到宽甸来示威、侦察、扫射和轰炸，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

我们国家的建设需要有三年五年时间先恢复生产，我们也正在进行恢复工作。最近拟定了一九五一年的经济计划，总想减少军费，增加经济建设费和文教费，把军费由今年占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三减为明年占顶算的百分之三十，以全部概算的百分之七十投入经济建设。文教事业等，并考虑改善公教人员的生活，收购农民的余粮。发展日甲品的生产。但敌人下让我们这样做。不久以前华。莱士[2]给毛主席一封信，他说，愿中国造拖拉机，不要将造拖拉机的力量造了坦克车。实际是敌人不许我们建设，逼得我们不能造拖拉机。

假如我们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那是不行的。消极防御也要花许多钱，例如改装一个飞机场就要一亿斤小米，东北修八个，关内修三个，就要十多亿斤小米，飞机场外还有许多设施，所费甚大。再有工厂搬家，许多工业无法按计划生产下去。军事上，除装备之外，还有兵力问题，鸭绿江一千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况且敌人如果将朝鲜侵占了，也不会就此罢手。所以，从朝鲜在东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展望来说，我们不能不援助；从唇齿相依的关系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援助。这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十八次常务委员会上的报告，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一个月前，就是说美军在仁川登陆以前，我们曾经考虑过，美帝打到三八线[3]后是否会停止，而后转为外交的谈判。在敌人占领汉城以后，尼赫鲁[4]曾经对我们说，三外长会议[5]已经说好，不过三八线，如要过三八线也要提到联合国来决定。但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要稳住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以后，再搞中国。我们看穿了骗局，所以在九月三十日声明：对美帝侵略朝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十月一日、二日的消息是美军已过三八线，南朝鲜军则在三八线以北深入很远。我们曾找印度驻华大使指出，以上情况与尼赫鲁所说不同，我们对朝鲜问题不能不管，要他通过尼赫鲁转告贝文[6]。过了几天，敌人的推进并不停止。不久，贝文通过尼赫鲁向我表示，过了三八线到距鸭绿江四十英里时即可停止。当时敌人已进到平壤。目前，敌人又由平壤北进。这显然是对我们第二次欺骗。如此下去，我们如坐视不救，敌人必然继续前进，咄咄逼人，直到鸭绿江边，然后再做第二步文章。

所以我们要理，要管。但如何理？如何管？要有进一步的决策。过去我们是管过理过的，例如向联合国控诉等。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应有新的决策。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一步步地制造并扩大战争。如果我们予以打击和斗争，它可能缩回去，否则它必然照计划继续推进。

美帝国主义在东方实行麦克阿瑟[7]的政策，利用日本的基地，继承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沿袭着甲午战争[8]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不过日本帝国主义是用四十多年的时间逐步进行的，而美帝国主义则要在四五年内来完成。

历史的教训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国一派主抗，一派主让，让到七七事变[9]，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抵抗，还抗不起来。甲午之战也是抗，不过那是在统治者中的抵抗，由腐败的朝廷领导，没有人民的支持，结果失败了。如果是人民的国家，就不会如此。

现在对美帝如果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反之，如果给以打击，让它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甚至会影响它派兵到西欧的计划。这样，敌人内部的矛盾也会发生。总之，如果我们让，只会缓和敌人内部的矛盾；管，则会促使敌人内部矛盾加深。只有管，才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不过，我们过去的管法现在已经无效，只有拿出力量来管，才能起作用。

朝鲜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单是朝鲜问题，连带的是台湾问题。美帝国主义与我为敌，它的国防线放到了台湾海峡，嘴里还说不侵略不干涉。它侵略朝鲜，我们出兵去管，从我国安全来看，从和平阵营的安全来看，我们是有理的，它是无理的。

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我们是有节制的，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必须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外国军队必须退出朝鲜。如果解决得好，美帝国主义受到挫折，也可以改变台湾海峡的形势和东方的形势。我们力争这种可能，使国内外人民一致起来，动员起来。

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愈打愈眼红，打入大陆，战争扩大。敌人孤往一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美帝有疯狂的一派，我们应该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们并不愿意战争扩大，它要扩人，也没有办法。我们这一代如果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我们的子孙。只好承担下来，让子孙水享和平。不过我们

绝不挑起世界大战。我们应力争前一种前途，力争和平。但也准备应付后一种可能，应付世界大战。

既然要拿出力量来管，那么我们的力量如何？

我们的陆军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空军海军不足，因为我们在去年春天才开始建空军和海军。那么是否要等到我们力量强大时再抵抗呢？不行。那样敌人就会把朝鲜压了下去，气焰会更加高涨，敌我力量对比会相距更远，所以我们必须全面地发展地考虑问题，到斗争中去增强自己，在狂风暴雨中锻炼自己。革命的力量有时看起来是劣势，在斗争过程中却会变为优势。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时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另外，我国大陆防卫的力量也要顾到。敌人可能来轰炸，或者用蒋介石的空军来轰炸，或登陆袭扰，我们应增强防卫力量。政治上，我们有同盟国家、友好国家的支援，力争和平。方式上，我们采取志愿军的形式，无须宣战。宣传上，我们应广泛宣传抗美援朝，保卫和平。同时，我们在国内要镇压敌特的捣乱，巩固广大人民内部的团结，经济建设不能停止，重工业要有重点地恢复，水利、铁道、纺织这几方面的建设要不动摇地进行，并且要照顾到人民生活的改善。

注 释

[1]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援朝、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2]华莱士（一八八八～一九六五），原为美国共和党人，后加人民民主党，在罗斯福任总统期间，曾任农业部长、商务部长和副总统。一九四六年加入美国进步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参加总统竞选失败后，在纽约州经营农业。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一方面支持美国政府的侵朝战争政策，另一方面又在九月二十九日以农人身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什么“如果新中国在学会制造卡车和拖拉机之前先学会了制造坦克，这将是一个世界的悲剧”。

[3]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美、苏两国商定在朝鲜国土上以北纬38°线作为两国接受日军投降的临时分界线，分界线以北为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这条线通称三八线。朝鲜战争爆发时，朝鲜人民已在这条线以北地区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条线以南地区还在美帝国主义扶植的李承晚集团统治下。

[4]尼赫鲁（一八八九～一九六四），当时任印度总理。

[5]这里指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美国纽约召开的美、英、法

三国外长会议。

[6]贝文(一八八一~一九五一)，英国工党领袖之一。一九五一年时是英国工党内阁外交大臣。当时我国同美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在关于朝鲜战争问题上同美国政府的一些交涉，是通过与我国已建立外交关系的印度，再由印度通过英国来进行的。

[7]麦克阿瑟(一八八~一九六四)，美国职业军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任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执行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任务。一九五一年六月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侵朝战争。

[8]甲午战争是一八九四年(甲午年)中国和日本发生的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日本军队先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继而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中国方面在陆上和海上都遭到失败，被迫于一八九五年签订了《马关条约》。

[9]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 (一九五 年十二月四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研究了一九五 年十月二十六日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先生递交苏联驻安全理事会代表马立克先生的备忘录，以及十一月二十日马立克先生奉苏联政府之命递交杜勒斯先生的备忘录之后，授权本人就对日和约问题发表下列声明：

一、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蹂躏我国广大领土，使我国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牺牲。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英勇抗战，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因此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参加·乃属当然之事。兹特郑重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绝对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因而它没有资格参加任何有关对日和约的讨论和会议。对日和约的准备和拟制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与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二、根据一九五 年二月十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中、苏两国政府同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他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由此可以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在力求于尽可能的短期内，缔结共同对日和约，以便早日结束对日战争状态，使日本人民早日获得民主与和平。与此相反，美国政府为厂实行长期的对日军事占领，关于对日和约采取了拖延政策。美国政府自一九四七年以来，屡次企图颠倒缔结对日和约的程序，破坏对日和约应先经由中、苏、美、英四国外长会议并同讨论准备的原则，并破坏大国一致的表决原则。现在，美国政府不仅企图破坏对日和约的程序，而且进一步企图推翻共同对日和约的基础。

三、开罗宣言[2]、雅尔塔协定[3]、波茨坦公告[4]：及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远东委员会[5]各国所同意通过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 这些由美国政府参加签字的国际文件，乃是共同对日和约的主要基础。然而，美国政府递交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其第一条，竟拟定“ 缔约国家：任何或一切愿意在所建议的和可能获得协议的基础上媾和的对日作战国家 ”。这就是说，美国政府业已公开表明推翻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但公告和远东委员会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中所规定的共同对日和约的基础，美国政府备忘录，显然是企图将他自己的建议及所谓可能获得的协议，作为对日和约的基础，来代替已经为盟国所达到的符合世界人民利益和日本人民利益的国际协议，如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但公告及远东委员会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等，并且企图将他自己的建议及所谓可能获得的协议，强迫其他盟国予以接受，否则美国政府就准备根据自己的方案，排除其他盟国，悍然进行单独媾和。

四、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业已依照开罗宣言决定归还中国，关于库页岛南部与千岛群岛，业已依照雅尔塔协定决定交还及交于苏联。这些业已决定了的领土问题，完全没有重新讨论的理由。美国政府要求对于这些领土问

题重新予以决定，是完全破坏了已经成立的国际协议，故意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合法权益，企图从中达到侵略的目的。美国政府业已武装侵略中国台湾省，就是一个鲜明的证据。关于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不论开罗宣言或波茨坦公告，均未有托管的决定，当然更说不上要指定“美国为管理当局”的事情了。美国政府此种野心，纯为假借联合国名义，实行对琉球群岛与小笠原群岛的长期占领，在远东建立侵略的军事基地。

五、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占领军应自日本撤退。然而，美国政府不但始终没有丝毫表示美国占领军有早日自日本撤退之意，并且利用日本作为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基地。美国政府在其致苏联政府的备忘录中，要求在对日和约中，规定容许日本的设备与美国的军队继续合作负责维持日本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这就等于强迫日本人民接受美国军队长期留驻日本，并对亚洲人民进行侵略。

六、远东委员会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原来规定日本不得保有任何陆军、海军、空军、秘密警察与宪兵，这就是说，不得再行武装日本。然而美国政府今天如其公开武装西德一样，正在公开武装日本。如所周知，美国占领军正借用日本警察的名义来重建日本的陆军，借用海上保安厅的名义来重建日本海军，并保留与修建日本军港；训练日本航空人员，以建立日本空军，并保留与修建日本空军基地。美国占领当局释放了大批重要战犯，解除整肃，恢复大批法西斯分子的活动，以重建日本的侵略势力。美国政府企图用它的军事控制，使日本完全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并驱使日本作为美国侵略亚洲人民的工具。

七、为了改善日本人民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甚愿日本的和平工业在为日本人民服务的基础上，获得发展。同时根据远东委员会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的规定，日本军事力量的现存经济基础必须摧毁，并不准其复活。但事实上，美国占领当局服从美国独占资本的利益，使日本的战争工业获得恢复和发展，并利用它来侵略朝鲜和我国台湾。相反的，和平工业则萎靡不振。美国政府这种绞死日本和平工业，鼓动战争工业的方针，只是破坏了日本人民的和平生活，加重了对日本人民的经济剥削。

八、美国政府在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备忘录中所拟定的方案，完全违反盟国共同对日作战的目的，并破坏所有有关对日政策的国际协议，同时，更抹杀我中国人民抗日奋战的基本利益，也无视日本人民的未来愿望。美国政府只有一个极端自私的目的，就是想霸占日本，奴役日本人民，变日本为美国的殖民地和侵略亚洲人民的军事基地。因此美国政府这一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备忘录的建议，是不符合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利益的。中国人民极愿与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其他盟国尽速订立共同对日和约，但和约的基础必须完全依照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及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只有以这些国际协定为对日和约，才能使日本民主化，才能清除日本的侵略势力，才能防止日本侵略势力的再起。一个没有外力控制的民主化的日本，才能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

注 释

[1]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莫斯科签订，同年四月十一日起生效，有效期

三十年。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决定条约期满后不延长。

[2]开罗宣言，参见本书《向安理会发表的重要声明》一文注[1]。

[3]雅尔塔协定即《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秘密签订。主要内容是，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为：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恢复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后俄国丧失的权益，将千岛群岛交予苏联。苏联在会上表示要和中国政府签订友好同盟条约。

[4]波茨坦协定是《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和《柏林（波茨坦）会议公报》两个内容基本相同的文件的通称。苏、美、英三国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在波茨坦会议上签订。主要内容是，设立中、苏、美、英、法五国外长会议，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缔结和约的准备工作 and 商讨成员国间的有关其他问题：在苏、美、英、法四国占领德国期间，关于处置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原则，其中包括解除德国武装，铲除或控制可供军事生产的德国工业，摧毁纳粹党的一切组织和制度，逮捕和审判纳粹战犯；以及有关德国的赔偿，准备同意意大利、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五国缔结和约等问题。

[5]远东委员会，是二次大战日本投降后、根据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协议成立的。由中、苏、美、英、法、荷、加、澳、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国代表组成，巴基斯坦和缅甸于一九四九年加入总部设在华盛顿。主要任务是制订使日本履行投降条款的政策、原则及标准：应成员国请求，审查盟国最高统帅所颁布的有关命令及所采取的措施。委员会通过决议须经多数赞成，其中必须包括中、苏、美、英的代表。一九四七年通过的《远东委员会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的决议》，规定了盟国对日本实行占领和管制的最终目标，政治、经济方面应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盟军在日本的权力。一九五二年美国宣布单独对日和约生效，远东委员会被解散。

中苏友好同盟伟大的一年 ——为苏联《真理报》作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四日)

今天，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签订的一周年。由于这个条约具有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人民把这一天看作最值得纪念的日子之一。

中苏两国的伟大同盟，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兄弟同盟。中苏两国是世界上两个强大国家，并拥有七万万团结一致的人民，他们结为坚固的同盟，就成为世界上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个力量的结成，不仅大大地加强了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优势，并且使帝国主义集团在东方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遭受严重的打击。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条约中规定：缔约国双方将为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充分贡献其力量，并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一年以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这些规定，不但已经在反对帝国主义在东方的侵略及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必将在今后产生更为重大的影响。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中国人民与苏联人民一样亟愿尽速订立共同对日和约，但对和约的基础，必须完全依照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及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远东委员会各国所同意通过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我们认为：只有以这些国际协定为对日和约的基础，才能使日本民主化，才能清除日本的侵略势力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才能发展日本的和平工业而有利于日本人民生活的改善。一个没有内外侵略势力勾结和控制的民主化的日本，才能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但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却不是这样想法。他们不甘心于对东方侵略政策的失败，正在阴谋进行对日片面媾和，重新武装日本，企图以日本国土为基地，以日本人民为炮灰，好继续和扩大其侵略朝鲜、台湾，干涉越南、东南亚的罪恶行为。美帝国主义这一阴谋，破坏了一切国际协定，推翻了共同对日和约的基础，正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坚决反对的，也是亚洲人民连日本人民在内所坚决反对的。可以断言：美帝国主义如果一意孤行，最后必将归于失败。中苏同盟愈加被为数极少的帝国主义掠夺者们所痛恨，就愈加为中苏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所拥护，因而就愈加巩固起来了。

过去一年中，我们伟大的友邦热诚地忠实地履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有关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以及其他关于中苏两国经济合作和贸易协定，给了中国人民以慷慨的援助，大大地帮助了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热烈感谢斯大林大元帅和苏联政府的这种伟大友谊。不管帝国主义侵略者如何暴跳如

雷，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是一天比一天亲密了。毫无疑问，占全人类三分之一的中苏伟大人民以和平和进步为目的的兄弟友谊；将给被帝国主义战争计划所威胁的世界，带来无限的青春和希望。

毛主席万岁！

斯大林大元帅万岁！

伟大的中苏友好合作万岁！

注 释

[1]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参见本书《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一文注[1]。

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 (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

一、我们的外交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坚持这一政策，相信以和平竞赛的方法来胜过帝国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为防备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应该在和平斗争中巩固国防，加强经济力量。要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它发动战争，就叫它遭到失败。

我们在执行和平政策中的一些外交方针是：

(一)“另起炉灶”。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历史上，有在革命胜利后把旧的外交关系继承下来的，如辛亥革命后，当时的政府希望很快地得到外国承认而承袭了旧的关系。我们不这样做。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毛泽东同志宣告后，我们以外交部长的名义把这一公告送达各国政府，向世界各国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为了表示外交上的严肃性，我们又提出建交要经过谈判的手续。我们要看看人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在和平阵营方面，首先是苏联，然后是各人民民主国家相继承认了我们。这些国家是真诚地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因此，我们同它们很快地建立了外交关系。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不能不经过谈判的手续，看一看它们是否接受我们的建交原则。我们不仅要听它们的口头表示，而且还要看它们的具体行动。例如，它们如果在联合国中不投新中国的票，而去赞成蒋介石反动政府，那我们就宁愿慢一点同它们建交；反之，如印度、缅甸等，能够真的同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那就可以在经过谈判之后同它们建交。

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二)“一边倒”。在一九四九年党的建立二十八周年纪念日，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宣布了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之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七月七日发表了联合声明，拥护这一方针。我国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旗帜鲜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如果没有这一明确的宣布，帝国主义者就会胡思乱想地望着我们，如司徒雷登^[1]在南京时还想钻空子。“一边倒”的方针给这种胡思乱想的人浇了一头冷水。

(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

这是在一次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节录。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但是打扫要有步骤，不能性急。我们在美帝侵朝的时期，针对美帝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并冻结我国财产的情况，先接管或冻结美帝在华资产，并接管美帝津贴的文化机关，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2]中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

（四）“礼尚往来”。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开国后我们用“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两手，在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至于在具体事情上，是可以后发制人的。

（五）“互通有无”。我们开国以来就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中国作为它们的消费品市场。美帝国主义对我搞禁运，我们就以货易货。不用结汇，这对打破禁运是极有利的。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换回来的是工业装备。我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大大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增加了，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字。我们想扭转国民党时期的入超，变为出超，这是好的，但我们当前的目标是进出口平衡。现在我们人口的东西是我们所需要的，出口的东西如鸡蛋、猪肉，是人家所需要的，这种互通有无是互利的。

（六）团结世界人民。我们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是“一边倒”的，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以上一系列的方针就体现了我们坚持的和平外交政策。

二、外交阵线

（一）建立什么样的外交阵线。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这一点要搞清楚。

（二）要分清敌我友。在建国开始时，我们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和友是一方面，敌又是一方面。具体地分析一下，朋友方面以国家来分有两种：第一种是基本的朋友，第二种是一时的朋友。这后一种朋友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只能在某一时期内成为朋友，有的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朋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从国家的性质上来说，它们是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但对战争它们不参加，表示中立，这是可能的。这种情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有过，那时苏联争取瑞典保持中立[3]，这对当时的局势是有利的。假如那时挪威也被争取保持中立，对苏联会更有利，对欧洲的形势会更好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在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对我们是有利的。所以对这些国家，我们不能采取敌对态度，不要把它们挤到敌人的营垒里去，我们可以和它们做朋友。当然在战争中，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但在战争爆发前，我们就要有预见，努力做争取工作。在战争一旦发生，这些国家守中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站在和平阵营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

可能性虽然极少，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要看我们和平阵营力量的增长，要看敌人阵营的分化情形。

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追随美帝的国家毕竟是少数。在朝鲜战场，和美国在一起的虽然有十五个国家，可是万一战争发生在中国，是否也有那么多国家参加对中国作战呢？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敢于坚决和我们敌对并走上战场的究竟还是少数。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

同我们最敌对的国家，应该对它坚决斗争。

同我国未建交、关系又较坏的国家，不能把它们看成同美帝一样。它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应该给一些影响，使它们不过分同我敌对。

同我国正在谈判尚未建交的欧洲国家，它们不愿意同我闹翻，就悬在那里。

同我国已经建交的欧洲国家，对他们要分别对待，做好工作。

同我国已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过去是殖民地，现在不仅形式已经改变，有自己的国会与政府，同时人民的觉醒也使得帝国主义不能不改变过去对殖民地的一套办法，而由当地资产阶级来统治。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现在还有人说是殖民地，那是不切合实际的。即使是现在的日本也不能说是美国的殖民地。日本人民的主要斗争对象有时是美国帝国主义，有时是本国政府。由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才是殖民地。东南亚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同帝国主义有矛盾，我们要在战争时争取它们中立，在和平时争取它们同帝国主义保持距离。

伊斯兰教国家，我们同它们关系较少，影响也小。工作可以逐步进行。

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我们要这样来打开我们外交工作的局面。

三、外交工作的思想领导我们的外交工作要绝对地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不能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当然更不能允许这些思想占据领导地位。我们的立场必须十分坚定，思想必须十分明确。

（一）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对这个问题，大家在理论上也懂得，但是在工作中，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就往往容易带着新中国胜利的骄傲，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思想。当然我们应该有民族自信心，可是如果有自大、骄傲的情绪，那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了，即使有时是不自觉的，也不好。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要肃清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确立国际主义思想。

（二）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我们的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4]。我们反对失去民族自信心的、投靠大国的“世界主义”。美国所说的“世界主义”、“大国领导”，其目的是要小国永远跟它走，永远受它奴役剥削。我们的国际主义是要各国都独立平等。

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的爱国主义。我们有些同志有时表现得失去立场，那是因为我们过去是半殖民地国家，羡慕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不审查其中有无毒素，盲目崇拜。说中国一切都好或一切都不好，都是不对的，应该批判地接受一切中外的文化。《大公报》有一栏叫“中国第一”。中国哪里有那么第一，这样提就不对，后来这一栏也只好取消了。新中国当然比旧中国好，祖国是

可爱的，但我们仍然必须向外国学习。

（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的，一切必须从集体出发，倘若从个人出发，就一定很危险。任何荣誉都是来自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努力，都是国家的荣誉。外交工作中不容许有个人打算，不要因为人家一说好就沾沾自喜，应该想这是人民的光荣；如果人家说坏，就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错了，要把个人完全溶化在集体当中。

（四）坚持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我们强调高度自觉的、合乎党的利益的纪律性，丝毫不能允许自由主义存在。乱说乱搞就会出乱子。外交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外交工作的一切都必须注意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国家同国家办事，说了就得算数，所以多说不如少说。但是，是不是什么都不说呢？不是。已经宣布的事，已经办成功的事，已经决定了的事都可以说；尚未宣布的，经验还不成熟的不能说。因为这不是在一个党内，而是办国家同国家之间的事。在一定原则下可以有一定限度的机动，也就是临机应变，但对新的问题处理迟缓一些并不错误。经验不足时，还是慢一些好。

（五）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我们大家对外交工作的经验都不多，还是要发扬民主。“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多听取大家意见是必要的，但是还要有集中。使馆内的民主一定要做到。光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成为官僚主义了。我们应该提倡民主，才能克服官僚主义。

（六）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政治空气首先要求有高度的党性，锻炼同志们的思想，一切从原则出发。政治化是多方面的。把原则变成教条来背诵不是政治，轻一点说是书呆子，重一点说是教条主义者。要调查研究，分析问题。平时谈生活、谈文艺都要注意从原则出发，这样，庸俗空气就稀薄了，政治空气就浓厚了。当然，并不是说只有张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叫做政治空气浓厚。

（七）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我们的外交工作中有不少浪费，这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我们在生活享受方面处处想跟苏联比是不对的。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也是十分俭朴的。毛泽东同志主张不要去提倡那些形式的东西，因为不适合我们现时的经济情况。生活上同他们比是不对的，今天我们的生产还没有发展到他们那样的水平。

注 释

[1] 司徒雷登，参见本书《答记者问》文注[1]。

[2] 抗美援朝运动，参见本书《抗美援朝，保卫和平》一文注[1]。

[3]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苏联与芬兰因边界问题发生战争，为此，英、法两国在美国支持下组织了一支远征军拟经瑞典进攻社会主义苏联。苏联政府警告瑞典政府，希望它不要违反中立政策，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瑞典政府决定同苏联保持正常关系。一九四一年四月初，希特勒军队占领丹麦和挪威后，瑞典面临被希特勒占领的威胁。十三日，苏联政府向德国驻苏大使发表声明说，苏联不能让德国破坏瑞典中立。这个声明引起了德国政府的重视。瑞典政府对苏联这一行动表示感谢。

[4] 沙文主义原指资产阶级反动的本民族至上主义。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产生于法国，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拥护拿破仑一世的侵略扩张政策，主张用暴力建立法兰西帝国而得名。它宣扬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主张征服和

奴役其他民族。在帝国主义时代，沙文主义成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侵略其他国家和压迫其他民族的思想工具。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

(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共同研究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提出的关于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双方病伤战俘的建议之后，一致认为根据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这一问题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关于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对于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显然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之，我们认为，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以保证停止朝鲜战争并缔结停战协定的时机，应当说是已经到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致主张，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停战谈判代表应即与联合国军停战谈判代表开始关于在战争期间交换病伤战俘问题的谈判，并进而谋取战俘问题的通盘解决。

过去一年多的朝鲜停战谈判，已经奠定了在朝鲜实现停战的基础，在开城和板门店的谈判中，双方代表除对战俘一项问题外已对所有问题达成协议，首先，对于举世关心的朝鲜停火问题，双方已经同意，“双方司令官命令并保证其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部队与人员，完全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此项敌对行为的完全停止自本停战协定签字后十二小时起生效。”（朝鲜停战协定草案第十二款）其次，双方还曾商定各项重要停战条件。在关于确定军事分界线和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上，双方已经同意，以停战协定生效时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线后退二公里，以便在敌对军队之间建立一非军事区……作为缓冲区，以防止发生可能导致敌对行为复发的事件。”（草案第一款）在关于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及处理违反停战协定事件的问题上，双方已经同意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所共同指派的五名高级军官和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所指派的五名高级军官组成军事停战委员会，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包括对于战俘遣返委员会的督导，并协商处理任何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草案第十九、二十、二十四、二十五、五十六各款）；双方并同意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所共同提名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指派两位高级军官作代表和由联合国军总司令所提名的瑞典、瑞士指派两位高级军官作代表组成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并在其下配备由上述各国派出的军官为组员组成中立国视察小组，分驻于北朝鲜的新义州、清津、兴南、满浦、新安州和南朝鲜的仁川、大邱、釜山、江陵、群山各口岸，以监督与视察双方对于停止自朝鲜境外进入增援的军事人员和作战飞机、装甲车辆、武器与弹药的条款的实施（条款中准许轮换和替换者除外），并得至非军事区以外据报发生违反停战协定事件的地点进行特别观察与视察，以保证军事停战的稳定（草案第三十六、三十七、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各款）。此外，双方还商定“双方军事司令官兹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后的三个月内，分派代表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草案第六十款）如上所述，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只有一个战俘问题阻碍着朝鲜停战的实现。而且就在战俘问题上，除战俘遣返问题外，双方在停战协定草案中对于有关战俘

的安排问题的一切条款亦均已达成协议。如非朝鲜停战谈判中断五个多月之久，则这个战俘遣返问题可能早已找出解决的办法来了。

现在联合国军方面既然建议按照日内瓦公约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解决在战争期间先行交换病伤战俘问题，我们认为，随着病伤战俘问题的合理解决，只要双方都真正具有互相让步以促成朝鲜停战的诚意，全部战俘问题的顺利解决，是完全应当的。

关于战俘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向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只有根据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特别是该公约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停战后战俘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才是合理的解决。但是鉴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目前达成朝鲜停战的唯一障碍，并且为满足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本着一贯坚持的和平政策，本着一贯努力于迅速实现朝鲜停战，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以维持和巩固世界和平的立场，准备采取步骤来消除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以促成朝鲜停战。为此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必须指出，我们这一提议，并非放弃了日内瓦公约第一百一十八条关于停战后战俘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的原则，也非承认了联合国军方面所说的战俘中有所谓拒绝遣返的人，只由于终止朝鲜流血战争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关系到远东及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安全问题，所以我们才采取这一新的步骤，准备将在对方恐吓和压迫下心存疑惧、不敢回家的我方被俘人员，提议在停战后转交中立国，并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能得到公正解决，而不致因此阻碍朝鲜停战的实现。

我们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结束朝鲜战争所采取的这一新的步骤，完全符合于有自己子弟在朝鲜作战的双方人民的切身利益，也完全符合于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联合国军方面对于谋取和平具有诚意的后，我方这个建议是应该能够被接受的。

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日于北京

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 战争与和平问题 (一九五三年六月五日)

经过三年朝鲜战争[1]，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毛主席的估计正确。朝鲜战争已经有了三个年头，谈判也已经有了两个年头。三年战争两年谈判，扩大了世界和平运动，增加了美国的困难，推迟了世界大战。毛主席说过，美国连朝鲜战争都打不赢，还能挑起世界大战，这是简单的逻辑。三年战争的胜利，不但教育了中朝人民，而且教育了世界上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连美国本身也得到教训。朝鲜战争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上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朝鲜战场是局部性的，但是朝鲜战争的意义是世界性的，把我们对国际问题中许多不清楚的事情都解决了。

究竟世界主要矛盾是什么？两大阵营的对立当然是基本的，但是究竟具体表现在什么问题？美苏之间的对立已经是剑拔弩张了吗？不是的。当前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战争与和平、民主与反民主、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四个方面。

当前，世界和平运动和战争集团之间的对立，由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力量壮大而加强。我们的阵营是和平的大本营，统帅是苏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国人民以及反对美国战争叫嚣的人，都是和平的力量，都包括在和平统一阵线之内，连不好战的某些政府也包括在内，宗主国不能维护其统治的国家，将来也要包括在内。和平与战争对立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民主与反民主的问题不仅是美帝敌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美国人民反对本国政府，英、法、西德，日本等国人民要自由，而且是美国要干涉，同老牌帝国主义有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矛盾加深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都有利于和平民主方面。现在已经很明显，这些矛盾是非常尖锐的，将来会更加发展。

美国依靠什么发动新战争呢？这个问题摆在美国新政府的面前。艾森豪威尔[2]一上台就想打，但是拿什么去打呢？他一直想这个问题，不得解决。艾克[3]的政策就是要从朝鲜战场脱身，不当先锋队，要做后备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是预备队，发了财，得了许多殖民地。这次朝鲜战争它当了先锋，打了三年一无所得，其他国家早就想撤了。美国靠什么包围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从阿拉斯加、冰岛、日本等地包围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也没有包围成。谁来当先锋？李承晚[4]、蒋介石、保大[5]可靠吗？菲津宾、希腊、土耳其可靠吗？西边的、东边的都不可靠。

美国第二个依靠的是西方的同盟国，但也不可靠，欧洲军始终组不成。朝鲜问题如果和谈成功，就更组不成了。东方无战争以后，欧洲更无战争了。法国人说过，历史上从来没有人从东方打过法国，但德国和法国是世仇，在普法战争[6]和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三次打了法国。因此，法国跟德国一起组织反苏，打苏联，不可想象。法国老婆对德国是谈虎色变。法国贸易代表团中有个人曾说，他祖父参加普法战争，父亲参加第一次大战，自己在第二次大战中打断了一只胳膊。法国人民实在不愿意打仗。英国说它支持欧洲军，但自己不参加。这个欧洲军条约何时批准也很成问题，法国议会中恐一

这是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节录。原载《周恩来外交文选》。

时通不过，杜勒斯[7]跑到伦敦、巴黎鼓吹一阵也不行。美国的同盟国靠不住。

美国也想搜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它卖命。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是摇旗呐喊，真正打大仗，就不来了。

最后，就剩下武装西德和日本。哪有那么容易？迄今西德还未武装，警察是有，但不是正规军。武装日本是以保安队的名义进行的，有十多人，离真正武装还差得远。“重新武装”，不是孙悟空一变即得的，要慢慢搞起来。武装德日是长期的事，夜长梦多，德日两国人民反对，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也有顾虑。即或五年后武装起来了，打谁还成问题。五年后我们的阵营更强大，铜墙铁壁，他们不一定敢打。“先打弱的”，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法则。因此，新战争可能被推迟。

如果新战争能够被推迟，也就可能被制止。美国想依靠傀儡和傀儡国家，但是靠不住。同盟国搞不到一起，殖民地仆从国家不干，德日武装起来是很远的事。这就同美国要使自己从战争中解脱出来的打算，发生了很大矛盾，因而在外交上政治上表现极大的动摇不定。我们看准了美国的这个本质。

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放空炮吓人，提出五条办法：（一）侧面进攻；（二）轰炸东北；（三）沿海骚扰；（四）原子弹恐吓；（五）进攻中国大陆。这五条都已经被我攻破。毛主席说过，我们打退了敌人，守住了阵地，能接济上前线。朝鲜战争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奇迹。铁道交通运输不绝，在轰炸中仍然保证畅通。敌人暂时占了上甘岭，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事实证明我们能攻、能守、能接济。敌人想从东西海岸侧面进攻，我们加固了海岸阵地，比正面还坚固。到东北来轰炸，就把敌机打下来。如果勾结蒋帮沿海骚扰，我们有准备，可以消灭它。原子弹轰炸，我们不怕，而它的同盟国就会闹起来。前三条我们有准备，后两条美帝的同盟国也不会同意，怕引起大战。

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和平与战争问题。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对方则主张用战争来解决。如果战争来了，我们毫不畏惧，敢于抵抗，而且一定能够击败战争挑拨者。朝鲜战争的事实已证明得很清楚。这是因为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美国的战争威胁可能使美国与西欧的裂痕加深，亚洲、中东、北非的国家大都不愿意跟着它走，跟美国走的没有几个国家，和平的影响一天天在扩大。

注 释

[1]三年朝鲜战争，参见本书《抗美援朝，保卫和平》一文注[1]。

[2]艾森豪威尔（一八九一～一九六九），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

[3]艾克即艾森豪威尔。

[4]李承晚（一八七五～一九六五），参见本书《亚洲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处理》一文注[3]。

[5]保大，参见同上文注[2]。

[6]普法战争，参见本书《英法最近之意见龃龉》一文注[1]。

[7]杜勒斯，指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一八八八～一九五九），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印两国的谈判在今天，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我们说过要在一九五三年开始这一谈判，现在实现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

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了谈判。这是周恩来同志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这五项原则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下旬，周恩来同志访问了印度、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在日内瓦会议[1]上的发言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主席先生、各位部长先生、各位代表先生：

全世界人民期待着的日内瓦会议已经开会了。这个会议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缓和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这是一项有着重大意义的任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法兰西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的外长们坐在一起审查和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这还是第一次。我们的任务是复杂的。但是举行这个会议的本身，就意味着经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的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代表们都为着实现这一任务作出真诚的努力。

亚洲人民和世界其他各地人民一样是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亚洲人民长期遭受压迫和奴役。他们的争取从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解放和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是正义的。这个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但是，美国有势力的集团为了建立它在亚洲的殖民统治，正加紧干涉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策动组织亚洲侵略集团，扩大在亚洲的战争。美国的这种政策是违反亚洲人民的愿望的。美国的这种政策是造成亚洲局势的紧张和不安的根源。

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坚决的奋斗，结束了为害人民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根据自己的独立意志，选择了自己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着全中国人民的意志，它所执行的政策获得了举国一致的支持。

在不到五年的时期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取得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巨大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实行了社会改革，稳定了财政和金融，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并逐步改善着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现在，中国正执行着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计划，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各级政权机关的民主普选。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做了国家的真正主人。全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为全国各族人民所热烈爱戴的中国政府像磐石一般地巩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挠中国人民沿着国家强大和繁荣的道路前进。中国人民的胜利根本改变了亚洲的形势，并鼓舞着亚洲人民为自己的民族独立和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获得最后解放而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一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我们从不侵略、也不会侵略任何国家，但也决不容许任何人对我们进行侵略。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而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世界各国都遵守这些原则，并抱有互相合作的愿望，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政府首先同新中国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中苏两国并立即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是维护远东和平的重要因素，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苏联人民具有传统的深厚的友谊。苏联人民一开始就对中国人民的光荣的民族解放事业给予热烈的同

情。将近五年以来，中苏两国遵照平等互助的原则，建立了并胜利地发展着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中苏两国日益巩固的友谊，不仅在远东、而且在全世界保卫和巩固和平的事业中，起了并起着极其巨大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已经为拥有十亿以上人口的二十几个国家所承认。但是，有些国家，首先是美国却仍然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力图无视中国人民选择自己国家制度的权利。他们不甘心于在中国的失败，一直在图谋把早被五万万以上的中国人民唾弃了的国民党残余集团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直到现在，他们还硬将这个国民党残余集团的分子安插在国际会议上冒充中国人民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和权利受到了不应有的歧视。中国的和平和安全遭受着经常的威胁。这种状态的极端不合理和极端不公正，是很显然的。这种状态的存在和继续，妨碍了世界迫切问题、特别是亚洲迫切问题的和平解决，增加了国际关系的紧张和不安。显然，这种状态是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这次会议应该成为改变这种状态的开端。

主席、各位先生：现在，朝鲜战争虽然已经停止，但是朝鲜的和平还没有巩固，朝鲜的统一还没有实现，与朝鲜问题有关的其他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印度支那的战争还在进行。全世界人民对于这种情况正感到深切的不安和焦虑。他们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使这种情况得到改变——使朝鲜问题得以和平解决，使印度支那的和平得以恢复。

这次会议已经开始在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于巩固远东和平的利益和朝鲜人民的民族利益，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极为重视。

朝鲜是中国的紧邻，同中国只有一江之隔，历来同中国有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友好关系，中国人民不能不关心朝鲜的和平和安全，一九五一年六月，美国发动了干涉朝鲜的战争，并同时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接着又不断轰炸中国东北，炮击中国商船，侵犯中国的领空和领海。美国政府更无视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警告，命令它的武装部队大举侵越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和图们江，进一步严重地威胁了中国的安全。显然，美国是在袭用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朝鲜以建立侵略中国大陆基地的故技。中国人民基于这种沉痛的历史教训和当前的切身利益关系。忍无可忍，这才志愿援助朝鲜，同朝鲜人民一道，共同反抗侵略保卫自己祖国的安全。中国人民不能容忍朝鲜重新成为侵略中国的跳板。

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击退了侵略部队并到达了三八线附近以后，朝中两国人民本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立场，迅速响应了苏联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联合国提出的关于举行朝鲜停战谈判的建议。美国政府曾借口所谓战俘问题，拖延了后来举行的谈判，以致朝鲜停战谈判长期不能达成协议。但是朝中方面对此却作了不少的努力，结果达成了朝鲜的停战，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如释重负。尽管如此，美韩当局仍在继续制造各种复杂情况，妨碍双方之间解决问题。这尤其表现在美韩当局在朝鲜停战前后强迫扣留了四万八千余名朝中被俘人员，使他们不能重返祖国这一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关于战俘的这一问题根本尚未了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认为，这次会议是不能避开这个问题的。

事实的经过如此。然而，并非这次会议所有的参加者都承认这些事实，譬如大韩民国的代表即不顾事实地再一次搬出关于在一九五一年开始的朝鲜事件的早已破产的滥调，颠到黑白，企图嫁祸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朝人民

的伟大邻邦——苏联，力图为朝鲜战争的真正祸首辩护。这当然丝毫不能改变中国人民志愿援朝、反抗侵略、保卫自己祖国安全的正义性，也不能抹杀中国人民和政府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所作的一贯努力。

朝鲜停战以来，美国和大韩民国对于朝鲜停战协定的某些重要条款的公然违反，更在这方面提供了新的证据。停战协定第六十款明白规定，停战后召开政治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自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但是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政府同大韩民国政府却缔结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给予美国在南朝鲜驻扎武装部队的权利。不仅如此，大韩民国政府直至最近还在叫嚣“北进统一”，并公开声称要在这次会议召开九十天后同美国一道退出会议，重新诉诸武力来统一朝鲜。这一切不仅证明过去是谁在发动战争，进行侵略，并且说明今天是谁在继续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企图重新破坏朝鲜的和平。然而朝鲜战争已经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对于一个已经觉醒了民族，任何外来干涉是注定要失败的，任何凭借外力来镇压本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的企图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日外务相所提出的关于恢复朝鲜的国家统一和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的三项建议。

朝鲜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以后，就一贯要求实现朝鲜的独立和统一。朝鲜的统一应该在摒除一切外力干涉、杜绝任何恐怖集团的压力、从而使全朝鲜人民都能在和平环境中自由表示其意志的条件下，举行全朝鲜的普选来实现。

在朝鲜举行普选，以建立全朝鲜政府并把朝鲜结成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国家，这样一个唯一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某些人所不喜欢的，根据昨天大韩民国代表的发言看来，李承晚政府是不喜欢这个办法的。他显然无视朝鲜人民的民族利益，企图证明似乎没有外国对朝鲜内政的干涉，朝鲜人民就不能解决自己的内政问题，其中包括举行全朝鲜的自由民主的选举。

大韩民国代表的这种意见，在他谈到关于在朝鲜的外国军队的问题时，表示得最为突出。他公然主张美国军队留驻朝鲜。仅仅这一情况就足以表明，所谓南朝鲜的统治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各种说法，它的价值究竟如何了。但是，中国人民所关心的不仅是问题的这一方面，中国人民更关心的是美国军队驻在朝鲜对于朝鲜和平的维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的直接影响。

和平统一朝鲜是朝鲜人民自己的事情。因此。为了实现全朝鲜的自由选举而不受外力干涉，一切外国军队必须首先撤出朝鲜。

从朝鲜停战谈判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正式提出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现在，朝鲜既已停战，一切外国军队就更没有任何理由再留在朝鲜。我们这个建议显然是完全符合于南北朝鲜人民和所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各国人民的利益的。停战以来有自己的子弟驻在朝鲜的各国人民无不要求他们的子弟早日回家过和平生活。朝鲜人民无不希望过自由生活而不受外国干涉，他们问：既然不打仗了，为什么还要外国的军队留在我们这里？我们认为，人民的质询是完全正当的，而人民对于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要求也是完全合理的。

朝鲜的和平统一，对于维护远东的和平和安全有着重大的意义。朝鲜的和平统一事业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关于维护远东和平的相应的国家愿意采取措施保证不妨碍朝鲜的和平发展，不容许外国干涉朝鲜的内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务相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

从朝鲜战争开始，中国的领土台湾即被美国同时侵占。这个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尽人皆知，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任何入侵占。美国侵占台湾的行为，严重地破坏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现在台湾已成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破坏活动和进一步侵略的据点。曾经长期侵略亚洲各国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在被加紧复活，这一情况日益严重地威胁着远东和亚洲的和平和安全。

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即已企图组织所谓太平洋“共同安全”体系。现在，美国政府又对印度支那战争进行进一步的干涉，并借此策动组织所谓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的防御集团，这些集团实际上是在追求侵略的目的，而且是为了要在亚洲建立新的殖民统治，并准备新的世界战争。

我们认为，美国的这些侵略行动应该被制止，亚洲的和平应该得到保证，亚洲各国独立和主权应该得到尊重，亚洲人民的民族权利和自由应该得到保障，对亚洲各国内政的干涉应该停止，驻在亚洲各国的外国军事基地应该撤除，驻在亚洲各国的外国军队应该撤退，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应该防止，一切经济封锁和限制应该取消。刚才杜勒斯先生在这里的发言，是同这些要求相反的，他的主张完全违反亚洲人民的利益，我们绝对不能同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亚洲国家彼此之间应该进行协商，以互相承担相应的义务的方法，共同努力维护亚洲的和平和安全。

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不仅关心亚洲的和平，而且也关心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目前，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并将欧洲分裂为几个互相仇视的军事集团的政策，威胁着欧洲的和平和安全，同时它的影响也超过欧洲的范围之外，并且也加重了亚洲局势的紧张和不安。因此，我们认为，为了维护国际和平，应该如苏联所建议的那样，经由协商、首先是大国协商的道路，停止武装西德，并在所有欧洲国家集体努力的基础上保证欧洲的安全。

同时，我们认为，为了和平的利益，必须停止扩张军备，实行普遍裁军，禁止使用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

主席、各位先生！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人民，都在非常关切地注视着我们会议的进行。他们期待着会议能够获得良好的结果。可惜，对亚洲和平表示关心的一些亚洲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未能参加这次会议，这绝不能认为是好的。

我希望，参加会议的代表能够本着巩固亚洲及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利益，共同努力，寻求途径，来解决会议议程上的这些迫切问题。

注 释

[1]日内瓦会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及英、美、法以外的其余十二个侵朝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傀儡集团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在日内瓦会议上关于 朝鲜问题最后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

主席、各位代表先生：

我在六月十一日的会上曾经说过，我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不少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我们应该把已经一致和可以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然后对分歧之点继续讨论，以便对各项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因此我们认为，本会议没有理由不根据六月五日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先生的建议[1]，继续讨论，以便对和平统一朝鲜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仔细地研究了反对莫洛托夫先生建议的各国代表的发言，但是，不能不指出，他们所持的论点是完全站不住的。

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先生在提出他的五项原则建议时就已经指出，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他决不低估这种形势的复杂性。正是为了要解决这些分歧，才有必要把已经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这本是每一种会议所遵循的合乎常识的程序，但是，反对莫洛托夫先生建议的人们却采取了一种不合常情的态度，他们说在每一项已经协议或接近协议的原则下面，还有很多的分歧之点，如果关于这些分歧之点不同时加以解决，肯定这些原则又有什么用处呢？其实，正是为了更好地进一步解决这些分歧，才有必要将已经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只有根本反对达成任何协议的人和他的附和者才会反对这种程序。

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是怎样达到目前的状况的呢？四月二十七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南日外务相就提出了恢复朝鲜的国家统一和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的方案。在讨论过程中，多数代表们强调了对全朝鲜选举进行国际监察的必要，五月二十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由未参加朝鲜战争的中立国家负责此项国际监察。这本应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展开达成协议的广阔的可能性。但是，在同一日，大韩民国的代表却提出了由南朝鲜政府统一全朝鲜的建议。为了推动会议的进展，六月五日苏联莫洛托夫外长提出了五项原则建议。这是总结了与会各国代表，包括大韩民国在内所已经取得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而提出的。但是，这些建议竟又遭到美国代表和其他代表们的反对。由此可见，美国代表和追随美国的代表们是根本不愿意对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达成任何协议的。事实上，早在本会议开始之前，美国政府某些有势力人士就已经公开宣布了不容许日内瓦会议成功的方针。日内瓦会议直到现在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美国对日内瓦会议的阻挠政策是本会议至今不能达成协议的基本原因。

主席先生，我们坚决认为，六月五日莫洛托夫先生关于和平统一朝鲜问题的五项原则建议是完全合理的。与会各国对于经由全朝鲜的自由选举实现朝鲜和平统一的问题现在还不能达成协议，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期待我们的会议能够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完满的协议。照目前会议的情形来看，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也应该努力对巩固朝鲜和平的问题达成协议。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

发表于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为了巩固远东及世界的和平，这是非常重要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日外务相今天提出了关于保证朝鲜和平的六项建议[2]，正好符合这种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南日外务相的建议。

朝鲜停战了，举世为之欢欣鼓舞，认为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里开会，也就是因为朝鲜已经停止了战争和朝鲜的停战仍然有效的缘故。但是我必须指出，朝鲜的停战由于大韩民国政府不断叫嚣北进统一朝鲜，正在受到日益增长的威胁，而这种叫嚣，又得到了某些美国当权人士的响应。他们正在企图利用每一种可能破坏朝鲜的停战协定。同时，朝鲜虽然停战了，但是停战的状态究竟还不是巩固的和平。我们应该努力使朝鲜的停战状态转入和平状态，因此，当我们对和平统一朝鲜问题一时尚不能取得协议的时候，我们就有义务采取措施来巩固朝鲜的和平，以便为和平统一朝鲜创造条件。

为逐步解除朝鲜的军事状态，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武装力量是首要的条件。在朝鲜停战协定第六十款中曾经明文规定在停战后必须解决这一问题，有关各国负有执行这一规定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完全同意一切外国武装力量于最短期内按比例地从朝鲜境内撤退。由于战争的关系，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数量都有了大量的增加，这就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很重的负担。因此，为逐步解除军事状态并减轻朝鲜人民的负担，缩减双方军队的数量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逐步解除军事状态并将双方军队恢复至和平状态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此有必要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代表组成委员会负责考虑这类问题。同时，为了有利于促进朝鲜的和平统一朝鲜的某一部分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军事条约，如“美韩共同防御条约”[3]，就不能被认为是可以容许的。

为了创造朝鲜和平统一的条件，要求南北朝鲜能够互相接近起来，而不是继续对立下去。因此，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双方代表组成全朝鲜委员会来协商有关双方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的一些过渡措施是适当的和必需的。

鉴于朝鲜停战现在仍然不是处于稳定的情况下，本会议与会各国有必要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认为南日外务相的六项建议提供了保证朝鲜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没有理由不可能在南日外务相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我们希望与会各国代表对于这个建议予以郑重的考虑。

注 释

[1]一九五四年六月五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日内瓦会议上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本原则提出了一个供会议讨论的决议草案，主要内容是：一、为了统一朝鲜，先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应在全朝鲜领土上举行自由选举，二、为准备和进行全朝鲜自由选举，并促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之间的和解，应建立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代表和“大韩民国”代表组成的全朝鲜机构，二、一切外国军队应在规定期间内撤出朝鲜，四、应该决定成立适当的国际委员会来监督全朝鲜自由选举的举行。五、鉴于防止对朝鲜和平的任何破坏的重要性，应该认为对维护远东和平有最直接关系的国家有必要承担义务，夺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这将促进朝鲜全国统一问题的解决。

[2]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在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保证朝鲜和平的六项建议。主要内容是：一、建议备有关国家的政府采取措施，遵照按比例的原则尽速从朝鲜境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二、在下超过一年的期限内，缩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军队力量，双方军队不得超过十万人。三、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创造逐步解除战争状态的条件、将双方军队转入和平时状态等问题，并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缔结相应的协定。四、认为不论南北朝鲜，同其他国家订有牵涉到军事义务的条件，是和平统一朝鲜的利益不相容的。五、为了创造使南北朝鲜接近的条件，成立一个全朝鲜委员会来拟订建立和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措施，并执行已取得协议的措施。六、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有必要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从而尽速解决把朝鲜和平统一为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国家的任务创造有利的条件。

[3]“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是美国和南朝鲜当局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军事条约。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将在无论何时，任何一方认为一方的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外来的武装进攻的威胁，进行共同磋商，双方将单独地和联合地，以自助和互助的办法，保持并发展适当方法以制阶武装进攻，缔约各方承认，在太平洋地区对缔约任何一方的领土的进攻，都将危及它自己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将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的危险；南朝鲜给予美国在双方共同商定的“大韩民国”领土以内及其周围部署美国军队的权利。

向印度人民发表的广播演说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我很高兴获有机会向印度人民致词。请首先允许我以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名义向伟大的印度人民致敬。

从远古以来，在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之间就有了深厚的友谊。将近三千公里的边界把中国和印度联结在一起。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在我们两国之间，历史记录和平的文化交流和经济来往，但是从来没有记录过战争和仇恨。

近代以来，中国和印度同样受到了外国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但是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受到的痛苦，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都加深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同情和了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成立以后，由历史所培育了的中印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又有了新的发展。

我们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新的国家。我们共同的愿望，就是要在和平环境中建设各自的伟大的祖国。这种共同的愿望，构成了进一步发展中印两国人民间的友谊的基础。

我们重视这种友谊。因为，友谊产生力量。当亚洲的和平目前还在遭受着外来威胁的时候，中国和印度九万万六千万人民的友谊是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的重大力量。

不久以前，我们两国签订了一个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在这个协定中，两国政府申明彼此对待的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依据这些原则制定的这个协定，提供了国际间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的一个良好范例。尼赫鲁总理昨天说道：“这些原则如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被承认，那末，对战争的恐惧就可以消失，而合作的精神就可以发展。”在我这次访问印度与尼赫鲁总理的会谈中，尼赫鲁总理和我都认为，这些原则应该贯彻到今天亚洲及世界的国际关系中。

我深信，中印两国的共同努力，一定会对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的友谊万岁！亚洲和平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1]的声明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

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历次的反对和警告，竟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同逃窜在台湾的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企图利用这个条约来使它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准备新的战争，这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一个严重的战争挑衅。

现在，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公敌。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任何战争威胁都不能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只能增强中国人民的愤慨。蒋介石卖国集团没有任何权利同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它是一个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条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如果美国政府不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仍然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美国政府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性的战争条约。美国帝国主义是敌视中国人民的。美国政府不甘心于它的帝国主义政策在中国的失败，一九五一年六月在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同时，便武装侵占台湾，庇护和指使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和沿海岛屿不断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现在，美国政府看到由于朝鲜战争已经停止，不能再用来作为侵占台湾的借口，于是索性制造了这个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来公开霸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和澎湖。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防御性的条约，它是一个露骨的侵略条约。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诡称这个条约是防御性的，但是这种说法丝毫不能掩盖这个条约的侵略实质。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政府在它自己参加签订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条款等国际协议中承认了这个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政府在一九五一年一月也曾经承认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美国不拟卷入中国内争。现在美国政府要在远离美国本土五千英里以外的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设防和建立军事基地，庇护已为六万万中国人民所唾弃了的蒋介石卖国集团，阻挠中国人民去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这是明目张胆地背弃国际信义、霸占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绝不能说成是防御。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是真正的防御行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曾经把他们在一九三一年侵占中国东北的行为说成是自卫。但是，这种说法从来就没有人相信过。谁都知道霸占别国的领土，侵犯别国的主权，干涉别国的内政，就是侵略。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胜利斗争中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决不会容忍美国在防御的名义下侵略中国的台湾和澎湖。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企图扩大侵略、准备新的战争的条约。这个条约同维护和平毫无共同之处。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企图用各种各样的论点来掩盖这个条约的战争目的，但是这是掩盖不住的。谁都知道，美

国政府自从武装侵占台湾以来，一直在支持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美国政府又企图利用这个条约使美国海空军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取得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军的权利，以加强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基地。美国政府在这个条约中公然企图以战争威胁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同时又为了它侵略台湾以外的中国“其他领土”作了安排。毫无疑问，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加深了美国对中国扩大侵略的危机。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他十二月一日声明中公开宣称，这个条约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的所谓安全体系中的“另一个环节”。这就说明，美国侵略集团不仅要侵占台湾，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且还要准备新的战争。不久以前在美国策划下签订的马尼拉条约，增加了在东南亚的战争危险。美国侵略集团现在显然是要把这个美蒋条约同马尼拉条约和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战争条约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东方侵略体系。美国侵略集团的这种做法，是同它在欧洲策划签订巴黎协定、复活德国军国主义、扩大西方侵略体系的做法互相呼应的。它的目的就在于加深世界的分裂，奴役这些地区的人民，和加紧准备新的世界战争。

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在这个“共同防御条约”中追求的目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事实上，美国侵略集团目前正在抄袭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故技；而有人竟希望中国人民忘记历史的教训，按照他们的意志接受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但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三一年沈阳事变所造成的灾难，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是沈阳事变的发展。对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记忆犹新的亚洲和太平洋各国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姑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政策产生了怎样惨痛的结果。同样，欧洲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恰恰就是纵容德国军国主义侵略的慕尼黑政策导致了第二次世界战争。历史的错误不许重演。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个危害中国安全和亚洲和平的美蒋战争条约，也坚决反对危害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巴黎协定。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远东造成了新的紧张局势。有人说，这个条约可以导致远东局势的和缓。这完全是一个颠倒是非的说法。美国政府在它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加紧干涉印度支那战争的同时，武装侵占了台湾，这原来就是它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的一环。由于朝鲜的停战，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远东局势开始有了和缓。为了进一步和缓远东局势，在日内瓦会议之后，我们又明确地提出美国应该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但是，美国政府不仅没有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武装力量，反而指使蒋介石卖国集团更加猖獗地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事实上，不断制造紧张局势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几年来，是美国的武装力量不断地侵犯中国的领空和领海，而不是中国的武装力量去侵犯美国的领空和领海；是美国派遣间谍分子到中国大陆上来进行颠覆活动，而不是中国对美国进行颠覆活动。在朝鲜停战中，朝中方面忠实地执行了停战协定和遣返战俘协定，而美国方面却破坏了遣返战俘协定，劫夺两万以上的朝中战俘，编入李承晚和蒋介石的军队、至今尚未交代。对于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中国方面保证了日内瓦协议的执行，但是美国方面不仅拒绝了参加对于协议的保证，而且还签订了马尼拉条约，并正在准备武装和训练保大的军队，来破坏日内瓦协议，现在，美国政府又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了这个侵略性的战争条约，企图在远东加强战争威胁，制造新的紧张局势。

这就证明，远东紧张局势不能和缓的一切责任完全在于美国。

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不得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这项原则是国际和平的基础。美国政府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这个条约，正如美国策划签订的其他所谓防御条约一样，照例都要重申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信念。但是所有这些所谓防御条约根本就是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背道而驰的。这些条约只能导致战争，决不能促进各国间的和平相处，这些条约只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嘲弄，决不能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保障国际和平。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坚持保障民族权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我们坚信，如果世界各国能够遵守这五项原则，努力建立和扩大和平地区，避免制造分裂局面，那么，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就能够和平共处，世界的集体和平和安全体系就能够建立起来。刚刚闭幕的莫斯科欧洲会议就是朝着这个方向作了巨大的努力，它已经得到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但是，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却竭力破坏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百般阻挠世界的集体和平和安全体系的建立，使目前国际局势不论在东方或西方都日益严重。我们认为，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有责任制止国际局势恶化的发展，为保障国际和平加紧努力。

为此目的，中国人民愿意向全世界郑重宣告：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只有把台湾从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暴政下解放出来，中国人民才能完成自己祖国的完全统一，才能进一步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一切关于所谓台湾“独立国”、台湾“中立化”和“托管”台湾的主张实际上都是割裂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为了和缓远东局势，为了消除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和保障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美国政府必须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美国没有任何理由远涉重洋来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

中国人民坚决地反对战争，但是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吓倒。如果有人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一定要对干涉者和挑衅者给以坚决的回击。

中国人民热烈地要求和平，但是决不会拿自己的领土和主权作代价乞求和平。牺牲领土主权，只能导致进一步的侵略，决不会得到真正的和平。中国人民懂得，只有反抗侵略，才能保卫和平。

注 释

[1]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由美国和台湾当局在华盛顿签订，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生效。条约共十条，主要内容是：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条约规定适用的范围经双方协议，还可扩大到“其他领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政府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将予以终止。

**坚决反对制造
“两个中国”的阴谋
(一九五五年一月五日)**

杜维廉说，艾登[1]要他来转达一个有关中英一般关系的口信。他说，艾登外交大臣很失望地看到了周总理在对政协的报告中所说的，英国的态度在日内瓦会议[2]之后有所改变。艾登要他来向中国政府保证，英国的态度不但在日内瓦会议之前，而且在日内瓦会议之后，都没有改变，英国的目的仍然是缓和远东局势和改善中英关系。中国报纸指责英国政府不守信义，使艾登大为惊奇。五年来，英国政府只承认中国政府，而同蒋介石没有关系。艾登认为，现在不能用战争解决任何问题。英国不是美蒋条约[3]的参加者。在英国看来，如果那个条约对过去的情况有任何改变，那就是引致了约制。因此，英国政府表示欢迎。英国政府了解中国的立场，但是不可能期望美国撤除它对蒋介石的保护，因为美国把蒋介石看作是它的同盟者。艾登相信，和平解决和缓和紧张局势的唯一希望，在于每一个人都根据实际情况来为此努力。英国政府的真诚愿望，就是中英之间有很好的关系，即使中英在远东问题上分歧的意见。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同伴欢迎和愿意改进中英关系和缓和远东及国际的紧张局势。改进中英关系当然需要双方的努力。两国的制度不同，想法不同，并不妨碍两国和平共处和改进关系。不过，如果在有关两国中一国的问题上存在着对立的作法，那么无论如何是要影响两国关系的。我可以直率地问杜维廉先生，如果中国对香港采取不同的态度，会不会影响中英关系？

杜维廉说，会的。

周恩来说，英国对台湾的态度就是不对的，这不能不影响中英关系。英国不敢得罪美国，却来责备中国，这是不公正的。美国侵占台湾，美国海军在台湾海峡活动，美国帮助蒋介石占据我们的沿海岛屿并对大陆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袭击，又劫夺来我国通商的船只，包括英国的商船在内。但是英国说这一切都是对的。中国去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打退蒋介石的骚扰性和破坏性的袭击。英国却说这一切都是不对的。这是不公正的态度，不能不影响中英关系。如果美国占据北爱尔兰，并且帮助北爱尔兰进攻英伦三岛，而又说英国无权打退这种进攻，这行不行呢？

杜维廉说，他不能同意周总理对英国态度的形容。英国不是始终支持一方和反对另一方的。英国是了解中国的态度的。英国反对的是加剧紧张局势，支持的是缓和紧张局势。刚才转达艾登的口信，其中心要点就是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不能期望美国撤除它对蒋介石的保护。英国的态度不是支持一方和敌视另一方，而是真诚地以实际情况为根据。

周恩来说，关于英国的态度是否不敌视任何一方的问题，可以看看事实。过去的事实证明是相反的。举例来说，卡祺亚[4]先生对宦乡[5]先生说，不要去论问题的是非，要承认事实。这句话代表英国政府态度中的可疑的地方和不公正的地方。

这是同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的谈话纪要。此后，周恩来又于一月二十八日和二月二十五日两次同杜维廉谈话。这三次谈话，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严正立场，批评了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原载《周恩来外交文选》。

第一，台湾已经归还中国，是属于中国的。这是铁的事实，怎么可以怀疑？但是，英国政府的代表在议会中却表示怀疑。英国参加签字的开罗宣言[6]、波茨坦公告[7]和日本投降条款都承认台湾应该归还中国。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政府的代表陈仪[8]在台湾接受了日本的投降。因此，台湾已经归还了中国。怎么能说台湾的法律地位还需要研究？杜维廉先生在北京已经很久，一定会了解这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有多大的伤害。英国政府简直已经不采取一个朋友的态度了。

第二，对中国人民的感情伤害得更厉害的，是英国政府称赞美蒋条约，指责中国解放台湾。英国一方面说，如果中国使用武力去解放台湾，就会引致战争，另一方面，又要中国容忍蒋介石在美国保护下所进行的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比这更坏的，是英国外交次官纳丁在美国公然说，如果中国去解放台湾，英国将同联合国一起行动。甚至连美国舆论都不赞成这句话。这是完全敌视中国的态度。有这么许多事实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却要中国政府不去论问题的是非。中国政府怎么能这样做呢？事实上，是非就在英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之间。这样颠倒是非，是非常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

我在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对政协的报告[9]中提到英国，是非常慎重的，并且是站在希望中英关系改善的立场上提的。

除上边所说的以外，还有更令人愤慨的例子。美国强迫扣留了未经表达自己意志的朝中被俘人员，英国政府对此一句话不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我们曾提出这一问题。艾登外交大臣在同我谈话时说，这个问题还要去提吗？甚至在同我个人谈话时，艾登外交大臣都没有说过一句批评美国强迫扣留朝中被俘人员的话。但是，关于判处十三名美国间谍这样一个完全属于中国主权和内政的问题，英国政府的代表却在英国的议会里对中国政府说了很不礼貌的话，用了很坏的字眼。我建议杜维廉先生去翻阅一下英国议会的记录。这种做法，已经不仅是不论是非，而且是颠倒是非。

几个月来，我们是很容易忍的，虽然同杜维廉先生见了多次，但是从来没有向你表示过我们的不满。杜维廉先生或许已经感到了我们的舆论所表现的情绪，现在我把中国政府的不满正式告诉你。

谈到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那就要问紧张局势是从哪里来的。英国说是从双方来的，甚至说是从中国方面来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紧张局势是从美国方面来的，中国是致力于和缓紧张局势的。朝鲜停战谈判拖延了两年，在快要达成协议的时候，美李[10]又强迫扣留了两万七千多名朝鲜被俘人员。但是，我们仍然赞成停战，为的是和缓紧张局势。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美国也竭力破坏，但是我们仍然赞成停战。艾登外交大臣在伦敦谈到印度支那问题时曾建议缔结亚洲的洛迦诺公约[11]，这是有利于集体和平的。我在新德里时曾对尼赫鲁总理说，我们赞成这个建议。但是等到我第二次到日内瓦以后，艾登外交大臣告诉我，英国已经不再主张缔结亚洲的洛迦诺公约，因为美国反对。日内瓦会议以后，英国同美国一起搞马尼拉条约[12]，这是我们反对的。英国不坚持我们已经表示赞成的建议，却跟着美国来制造分裂。现在，马尼拉条约的签字国又要在曼谷开会，加深分裂。这如何能说是为和缓紧张局势而努力呢？

在朝鲜战争[13]和印度支那战争[14]都停止了以后，美国就把力量集中在台湾，指使和帮助蒋介石对我们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从去年六月范佛里特[15]到东方来的时候起，美国就同蒋介石筹划签订美蒋条约。签订

这个条约的目的就是要霸占台湾和澎湖列岛，第二步就发动新的战争。这同日本侵占东北时的情形一样，同慕尼黑协定[16]签订以前德国侵占奥地利的情形也一样。艾登外交大臣和丘吉尔首相当时都是反对“慕尼黑”的，但是现在却要中国承认东方的“慕尼黑”！说穿了，就是有人想在世界上制造“两个中国”，使蒋介石在美国的保护下得以反攻大陆，在大陆上复辟。这不是和缓而是加剧紧张局势。

中国政府一直到现在都在致力于搞好中英关系。两国的制度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同，这并不妨碍两国的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但是不要彼此伤害，否则就会妨碍改进关系。如果对两国关系的伤害是由中国政府负责的，那么中国政府是勇于改正的，从不隐讳。例如，在海南岛上空我们误打了一架英国飞机以后，我们就道歉和赔偿。至于英国政府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使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事，我站在愿意中英友好的立场，认为值得英国政府深加思考。

中国政府赞成和缓紧张局势，并为此而努力。凡是英国政府所采取的合乎实际并且有利于和缓紧张局势的步骤，都会得到我们的赞成。但是不能要求我们承认侵略，让美国肆无忌惮地制造紧张局势，放手准备新的战争。如果艾登外交大臣愿意和缓紧张局势，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劝美国政府把军队从台湾撤走，这才能和缓紧张局势。如果英国说劝美国有困难，美国不会听，那么如何能和缓紧张局势呢？我们不能犯这个历史错误，不能容忍美国的胡闹。美国好战分子蛮不讲理，中国人民是不能容忍的，也不会被吓倒。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艾登外交大臣曾经告诉我说，美国政府中也有人愿意和平的。如果这是确实的，那么同美国政府还可以说理，而英国就恰恰能够起说服的作用，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很清楚的。只要任何国家愿意同我们建立正常关系，愿意同我们和平共处，并且放弃对我们的侵略，我们是会首先伸出手来，对美国也不例外。

我们欢迎并希望中英关系能按照去年日内瓦会议时候我同艾登外交大臣谈话的精神[17]，得到改善。

杜维廉说，感谢周总理所作的充分的叙述，一定如实地转告艾登。他感谢周总理在过去几个月中所采取的约制态度。但是他又建议，以后周总理有何不满之外，直接向他提，而不要通过报纸，他随时听候周总理召见。

周恩来说，我同意以后有意见时找你谈，但是，舆论是全国人民的事，况且中国舆论对英国的批评是由英国引起的，中国从不主动发动对英国的批评。自日内瓦会议至艾德礼[18]访华的一段时期中，中国舆论对英国的态度，杜维廉先生应当是知道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后发制人”。这就是中国的态度。

杜维廉说，对于周总理刚才所涉及的几点，他想作一些评论。第一，关于卡祺亚同宦乡的谈话，似乎有一些误解。英国政府并不是要中国政府不论问题的是非，而是建议按实际情况来寻求解决的办法。每一方对于问题的是非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英国的建议却证明了它是不敌视任何一方的。英国所作的积极建议是要求双方约制。这个建议不仅向中国提出，而且也同样向对方提出。

周恩来说，如果一个人打了另外一个人一拳，第三个人出来劝架，他不劝第一个人放下拳头，却要求第二个人不还手。这如何能说是要求双方约制？

杜维廉说，第三个人出来劝架，结果常常是自己挨打。

周恩来说，现在不是第三个人挨打，是第三个人不去劝第一个人住手，反而责骂第二个被打的人。

杜维廉说，周总理刚才提到，艾登曾说过在美国政府中也有人愿意和平。艾登当时曾加上一句：艾森豪威尔[19]就是这样一个人。英国认为，中国把美蒋条约的目的说成是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那是错误的。英国绝对相信美蒋条约的目的是要起一个约制作用。因此英国政府表示欢迎。

周恩来说，如果一个强盗跑到你的家里，占据楼下的屋子，现在说用一个条约来容许他占据楼下的屋子，只是不让他上楼去。试问：即使他现在不到楼上去，你住在楼上会感到安全吗？

杜维廉说，他的意思只是要说明美蒋条约的约制作用，而这正是英国政府表示欢迎的。

周恩来说，一个外国用武装霸占了我们的领土，这怎么还能说是约制？

杜维廉说，英国真正相信美蒋条约是起约制作用的。至于蒋介石反攻大陆，那连百万分一的可能性都没有。

周恩来说，暂且不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事。美蒋条约是要使美国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侵占合法化。英国赞成，但我们是永远不同意的。英国承认美国的侵略，这对中英关系是不利的。

杜维廉说，英国不是美蒋条约的参加者，因此不发生“承认”的问题。英国的意思只是要说，不能期望美国撤除它对蒋介石的保护。这是一个不可逃避的事实。

周恩来说，承认“慕尼黑”就是承认既成事实。但是，英国现在连慕尼黑的教训都拒绝接受了。

杜维廉说，他不能同意这种历史对比。接着，他转而谈另外两点。第一，关于纳丁所说的话，脱顿已经在下院作过解释[20]，那就是，英国除了作为联合国一员对台湾所承担的义务以外，没有别的义务；第二，关于台湾的法律地位。开罗宣言和彼茨坦公告都只宣布了一个意图要把台湾归还中国，但是还没有一个国际协议来履行这个意图。因此，在法律上说，台湾还不是中国的领土。至于蒋介石接受日本的投降，那只是把日本人从台湾移走而已。但是，现在不是要从法律的观点，而是应该从实际的观点来寻求解决的办法，英国承认中国，不承认蒋介石。曾经有人说，英国外交部发言人用了“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字样。经查询后发现并没有用过这种字样，即使用过这种字样，也是没有什么重要性的。

周恩来说，台湾的地位是毫无问题的，甚至连美国发表的白皮书[21]和杜鲁门发表的声明[22]都承认这一点。当时中国政府的代表陈仪既然接受了日本的投降，台湾就已经归还了中国。这是铁的事实。说台湾还没有归还中国，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极大伤害。过去英国政府并没有这样说过，这是最近的一个新论调，是为了替美国开脱，使美国有权侵占台湾。至于纳丁所说的话，那是不简单的。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中国去解放台湾，英国就要同中国打仗。英国舆论已经说明了这个含义。我们可以暂不争论，看看事情的发展。

杜维廉说，他不同意这种解释。纳丁的意思只是说，如果对台湾进行攻击，将会引致更广泛的战火，使联合国都被牵涉在内。

周恩来说，联合国至今对台湾并没有作过任何决定。纳丁的意思是否要联合国通过决议，使台湾不属于中国，而归美国保护？

杜维廉说，没有这种打算。

周恩来说，既然没有这种打算，那么只要美国不再霸占台湾，中国去解放台湾，如何会引致更广泛的战火，如何会使联合国都牵涉在内？是不是美国无论作什么事，我们都要承认？

杜维廉说，英国只是要求承认事实。

周恩来说，美国懂得英国的弱点，因此，造成了事实以后，就要英国承认，然后英国又要大家承认。

杜维廉改口说，英国要求的不是承认事实，而是考虑事实。然后他又重复说，美蒋条约是有约制作用的，而另一方面又不能期望美国撤除它对蒋介石的保护。他又说，即使考虑了这个事实以后，仍然可以努力来缓和紧张局势。英国不感到悲观失望，而认为只有考虑了事实才能找到出路。

周恩来说，如果考虑事实的话，那么只有美国撤走武装力量才能和缓紧张局势。如果艾登外交大臣愿意和缓紧张局势，那么努力的方向就应该是劝美国撤走武装力量。不能因为美国造成了事实，就要大家容忍。如果英国劝美国撤走武装力量，美国不听，那么英国当然不能负责。不过，如果英国说美国是对的，中国是不对的，这就伤害了中英的关系。

杜维廉说，对英国来说，并不发生在道义上作判断的问题。艾登嘱他转告的口信，只是说明了改善情况的唯一途径。

周恩来说，英国政府代表在议会所说的话和纳丁所说的话显然是对中国的责备。

杜维廉说，他不能同意。他说今天他所转告的口信才代表英国政府的意见。关于马尼拉条约，那是防御性的，正如中国同苏联之间的防御安排一样。

周恩来说，关于艾登外交大臣的口信，我们已经给予答复，请照我们所说的转告艾登外交大臣。马尼拉条约同我们建议缔结的亚洲洛迎诺公约不同，它是制造分裂的，因此许多亚洲国家表示反对。亚洲以外的国家用马尼拉条约来帮助某些亚洲国家造成集团，而许多亚洲国家没有参加，这是不能同中苏条约作同样解释的。亚洲以外的国家到人家的地区去，提供人家并没有要求的保护，在人家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这如何能解释成为是防御性的呢？美国正在越南南部破坏印度支那的协议。美国对保大[23]政府的援助和训练保大的军队，都是破坏印度支那协议的。

杜维廉说，周总理所谈的越南情况，他不熟悉。至于周总理今天所提出来的不满之处，他将转告艾登。

注 释

[1]艾登（一八九七～一九七七），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一九五一年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一九五五年任首相。一九五七年辞职。

[2]日内瓦会议，参见《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1]。

[3]美蒋条约，参见《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一文注[1]。

[4]卡祺亚，一九一五年生，当时任英国外支部副常多次官。

[5]宦乡（一九一九～一九八九），贵州遵义人。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代办。

[6]开罗宣言，参见本书《向安理会发表的重要声明》一文注[1]。

[7]波茨坦公告，参见同上文注[2]。

[8]陈仪(一八八三~一九五)，浙江绍兴人。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任台湾行政长官。一九四九年春因倾向中国人民革命，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五 年被处死于台湾。

[9]指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两个报告都讲到了中英关系，报告指出，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由于中英双方的努力，已经使两国的关系有所改进，这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但是，最近以来，英国政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竭力追随美国侵略集团的危险政策，特别是在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问题上，英国政府竟支持美国政府同蒋介石集团签订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鼓励美国强占台湾。这违背了英国政府在许多庄严的国际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并且使中英关系受到了损伤。中国对英国政府所采取的这种态度不能不表示很大的遗憾。

[10]美李指美国和南朝鲜李承晚傀儡政权。

[11]这里是说艾登主张在东南亚搞一个类似《洛迦诺公约》的条约。《洛迦诺公约》也称《洛迦诺保证条约》、《洛迦诺体系》，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条约的总称。其中主要是《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相互保证条约》(又称《莱茵保安公约》)，条约规定签约国相互保证德法、德比边界不受侵犯；遵守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莱茵区非军事化的协定。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在一九三六年向莱茵区进军，同时宣布废止洛迦诺公约。

[12]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在美国策动下，由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它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条约声明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条约附有美国提出的“谅解”，对“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解释为“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条约还以议定书的形式，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划为它的“保护地区”。条约于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九日生效。同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一九六二年七月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不承认它对老挝的所谓保护。一九六七年起法国拒绝派正式代表团参加该组织的部长级理事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一九七七年六月该组织宣布解散。

[13]朝鲜战争，参见本书《抗美援朝，保卫和平》一文注[1]。

[14]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法国为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统治，先后侵入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发动了印度支那战争。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经过八年多的英勇抗战，迫使侵略者在一九五四年七月签订停战协定。同年八月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

[15]范佛里特，一九五一年四月至一九五三年二月期间任侵朝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

[16]慕尼黑协定，参见本书《论敌寇两面政策》一文注[3]。

[17]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就中英关系问题进行了多次交谈。当时周恩来总理表示，中英两国关系还应进一步发展，艾登表示了同样的愿望。

[18]艾德礼(一八八三~一九六七)，英国前首相。当时是英国工党领袖、下院反对党领袖。

[19]艾森豪威尔，参见本书《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一文注[2]。

[20]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英国外交副大臣、出席第九届联大代表团团长纳丁在纽约发表电视讲话，声称：“中国共产党进攻台湾，将是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进攻，这毫无疑问需要联合国采取集体行动。作为一个会员国，我们当然被牵涉进去。”英国外交次官脱顿不久以后在下院代表外交大臣艾登对台湾问题作了类似的声明。

[21]这里说的白皮书是指美国国务院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五日发表的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全文共八章，叙述从一八四四年美国强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关于台湾的地位，白皮书第六章第十一部分中说：“根据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开罗宣言的条款，美国和中国宣布他们的意愿，即台湾应该归还中国。一九四五年九月，根据日本投降书，及日本政府按照盟军总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指令所发表的总命令第一号，中国军队在美国小组的协助下，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该岛的行政权。”

[22]这里指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关于台湾的声明，声明说，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台湾，归还中国”，“日本投降时亦曾接受此宣言的规定”，“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

[23]保大，参见本书《亚洲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处理》一文注[2]。

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九日)

主要发言

主席、各位代表先生：

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1]已经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能同与会的各国代表团一起在这个会议上讨论我们亚非国家的共同问题，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会晤，首先要感谢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家的倡议的努力，我们还应当感谢这次会议的主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为会议作了很好的安排。

亚非两洲有这么多的国家在一起举行会议，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我们亚非两洲的土地上生活着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民。亚非人民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代以来，亚非两洲的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以致被迫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停滞状态。我们的呼声受到抑制，我们的愿望受到摧残，我们的命运被旁人摆布，因此我们不得不起而反对殖民主义。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受到的灾难和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使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容易互相了解，并在长期以来就深切地互相同情和关怀。

现在亚非地区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摆脱了或正在摆脱着殖民主义的束缚。殖民国家已经不能用过去那样的方式来进行掠夺和压迫。今天的亚洲和非洲已经不是昨天的亚洲和非洲。亚非两洲的许多国家，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把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会议反映了这一深刻的历史变化。

虽然如此，殖民主义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而且新的殖民主义者正在谋取旧的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不少亚非人民还在过着殖民地的奴隶生活，不少亚非人民还在受着种族歧视，他们的人权遭受着摧残。

我们亚非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过程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争取和巩固各自的自由和独立的意志是一致的。不管我们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如何不同，我们大多数国家都需要克服殖民主义统治所造成的落后状态，我们都应该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按照我们各国人民的意志，使我们各自的国家获得独立的发展。

亚非人民曾经长期遭受侵略和战争的苦难。许多亚非地区的人民曾经被殖民主义者强迫充当进行侵略战争的炮灰。亚非人民不能不痛恨侵略战争。他们知道，新的战争威胁不仅危害到他们国家的独立发展，而且还要加强殖民主义的奴役。因此，我们亚非人民更加深切地感觉到世界和平和民族独立的可贵。

基于这些情况，保障世界和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并为此目的而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就不能不是亚非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接着朝鲜停战[2]之后，日内瓦会议[3]曾经在尊重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得到科伦坡五国会议[4]的支持，达成了印度支那的停战[5]。当时，国际的紧张局势确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给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人民带来了新

这两个发言分别刊载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的希望。但是，跟着而来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却和人民的希望相反。无论在东方和西方，战争危机都在增加。朝鲜人民和德国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受到阻挠。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6]有被破坏的危险。美国在台湾地区继续制造紧张局势。亚非以外国家在亚非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越来越多。他们公开鼓吹原子武器是常规武器，准备原子战争。亚洲人民不能忘记第一颗原子弹是落在亚洲土地上[7]，第一个死在氢弹试验下的是亚洲人[8]。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不能不关切日益增长的战争威胁。

但是进行侵略、准备战争的人究竟是极少数。世界上不论是生活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中的绝大多数人民都要求和平，反对战争。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运动有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发展。他们要求终止扩军备战的竞赛，首先各大国应该就裁减军备达成协议。他们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和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他们要求将原子能用于和平用途，为人类创造幸福。他们的呼声已经不能被忽视，侵略和战争的政策已经日益不得人心。战争策划者日益频繁地诉之于战争威胁，作为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但是，战争威胁是吓不倒任何具有抵抗决心的人的，它只能使威胁者自己陷于更加孤立和更加混乱的地位。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同世界上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决心维护和平，和平是有可能维护得住的。

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我们不仅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同时还要求经济上的独立。当然，我们要求政治独立并不是要对亚非地区以外的国家采取排斥的政策。但是，西方国家控制我们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亚非国家的命运应该由亚非各国人民自己掌握。我们要努力实现各国的经济独立，这也并不是要排斥同亚非地区以外的国家的经济合作。但是，我们要求改变西方殖民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剥削状态，我们要求发展亚非各国独立自主的经济。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

在中国，自从人民作了自己国家的主人以后，我们的一切努力就是要消除长期的半殖民地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五年以来，我们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并且从一九五三年起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这些努力，我们在各个主要生产部门，例如钢铁、棉布、粮食的生产量，都已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水平。但是，这些成就比之于我们的实际需要还微小得很，比之于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我们还落后得很。正像其他的亚洲国家一样，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国独立自主的经济。

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更加珍视自己的民族权利。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受到侵犯。所有附属国人民都应该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而不应遭受迫害和屠杀。各族人民不分种族和肤色都应该享有基本人权，而不应该受到任何虐待和歧视。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对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其他争取独立的附属国人民的暴力镇压还没有停止；在南非联邦和其他地区进行着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的迫害还没有制止；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问题还没有解决。

现在，应该说，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基本人权，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已经是觉醒了的亚非国家和

人民的共同要求。埃及人民为收复苏伊士运河地区的主权和伊朗人民为收复石油主权而进行的斗争，印度对果阿和印度尼西亚对西伊里安岛恢复领土权利的要求，获得了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同情。同样，中国解放自己领土台湾的要求也获得了亚非地区一切具有正义感的人民的支持。这证明我们亚非各国人民是互相了解、互相同情和互相关切的。

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如果各国保证互不干涉内政，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就是在有关各方保证尊重印度支那各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对其内政不予任何干涉的基础上达成的。据此，日内瓦会议并规定，印度支那各国不参加军事同盟和建立外国军事基地。这就是为什么日内瓦会议能够为建立和平地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在日内瓦会议之后，我们却看到了一种相反的情况在发展，这是不利于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利益的，也是不利于和平的。我们认为，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应该严格地和忠实地予以履行，任何方面不得加以干涉和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问题也应该按照同样的原则予以解决。

我们亚非国家需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合作，以便有助于消除我们在殖民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迫下所造成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我们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应该以平等互利为基础，而不应该附有任何特权条件。我们相互之间的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应该以促进各国独立经济发展为目的，而不应该使任何一方单纯地成为原料产地和消费品的销售市场。我们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尊重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不抹煞任何一国的特长和优点，以便互相学习和观摩。

在我们亚非地区的各国人民日益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今天，即使我们在目前经济和文化的合作规模还不可能很大，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合作是有远大的发展前途的。我们深信，随着我们亚非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各国间贸易关系中人为的外来的障碍的消除，我们亚非各国间的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将会日益增进，文化交流也将日益频繁。

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处境大致相同的亚非国家首先应该友好合作，实现和平共处。过去殖民统治在亚非国家间所造成的不和和隔阂，不应该继续存在。我们应该互相尊重，消除互相间可能存在的疑虑和恐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同意南亚五国总理在茂物会议[9]联合公报中所确定的关于亚非会议的目的。我们并认为，为了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贡献，亚非各国应该首先根据共同的利益，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的关系。印度、缅甸和中国曾经确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0]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支持。本着这些原则，中国同印度尼西亚关于两国侨民国籍问题的初步谈判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在日内瓦会议时，中国也曾表示愿意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印

度支那各国发展友好的关系。根据这五项原则，中国同泰国、菲律宾等邻国的关系没有理由不能获得改善。中国愿以严格遵守这些原则作为它同亚非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并愿促进中国和日本关系的正常化。为了增进我们亚非各国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我们建议亚非各国的政府、国会和民间团体实行互相的友好访问。

主席，各位先生，任意摆布亚非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决心维护世界和平，就没有人能够把我们拖入战争；如果我们决心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就没有人能够继续奴役我们；如果我们决心友好合作，就没有人能够分裂我们。

我们亚非国家所需要的是和平和独立，我们并无意于使亚非国家同其他地区的国家对立，我们同样需要同其他地区的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

我们的会晤是难得的。尽管我们中间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但是这不应该影响我们所具有的共同愿望。我们的会议应该对于我们的共同愿望有所表示，使它成为亚非历史值得珍贵的一页。同时，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建立起来的接触应该继续保持，以便我们对于世界和平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阁下说得对，我们亚非人民必须团结起来。

让我们顶祝会议成功。

补充发言

主席，各位代表：

我的主要发言现在印发给大家了。在听到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一些发言之后，我愿补充说几句话。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

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去年，科伦坡五国总理会议，还有亚非其他国家，都曾经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

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现在，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第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前一类国家并不多。但是某些人所不喜欢的，就是六万万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政治制度，而不再为帝国主义所统治了。后一类国家很多，像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亚非许多国家都是。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我们亚非国家，中国也在内，不论在经济上或文化上都很落后。我们亚非会议既然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次之，我要谈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拥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挑起宗教纷争的时代应该过去了，因为从挑起那种纷争中得到利益的并不是我们中间的人。

第三，我要谈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中国人民为反对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超过一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也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难困苦的过程，才终于达到了成功。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下所受的苦难是数也数不尽的，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力取得胜利的，决不是从外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古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一千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胁了别人。中国境内有几十种少数民族共四千多万人，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去颠覆别人的政府，倒是有人在中国的周围建立进行颠覆中国政府的据点。比如在缅甸边境就存在着蒋介石集团的残余武装分子，对中缅两国进行破坏。因为中缅友好，我们一直尊重缅甸的主权，信任缅甸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决无颠覆

邻邦政府的意图。相反的，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注 释

[1]亚非会议也称万隆会议，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等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

[2]朝鲜停战，参见本书《抗美援朝，保卫和平》一文注[1]。

[3]日内瓦会议，参见本书《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1]。

[4]科伦坡五国会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至五月二十八日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的会议。会议发表公报呼吁立即在印度支那实行停火，欢迎日内瓦会议通过谈判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并提出了召开亚非会议的问题。

[5]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法国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统治，先后侵入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发动了印度支那战争。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经过八年多的英勇抗战，迫使侵略者在一九五四年七月签订停战协定。同年八月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

[6]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指一九五四年七月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的《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最后宣言》等文件。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与会国尊重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它们的内政；上述三国交战双方同时全面停火；三国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容许外国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等。但美国没有在《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只声明美国政府将不使用武力去妨碍日内瓦协议的实施。后来美国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使这一协议遭到了破坏。

[7]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第一次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

[8]指一九五四年三月美国在中太平洋的比基尼岛附近的公海上进行氢弹试验时，使日本船员久保山爱吉得“原子病”致死。

[9]茂物会议是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继科伦坡五国会议后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会议发表了联合公报，决定联合发起在一九五五年召开亚非会议。公报申明：召开亚非会议的目的，在于促进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和睦邻的关系，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

系；讨论对亚非各国人民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例如有关民族主权的问题、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问题；讨论亚非国家和他们的人民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们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

[10]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在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两个联合声明中正式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关系的准则。以后，许多国际文件中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这个提法已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

不信教的和信教的要互相尊重

(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日)

你们来中国访问很好。每年来一代表团，考察考察，对我们提出批评，可以推动我们的工作。现在埃及已经和我们建交了，叙利亚等国和我们来往也很多。今后，我们和亚非伊斯兰教国家的来往将要更多。

我们的邻居不仅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还有很多信仰佛教的国家，他们的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对于我们的工作也是一种推动，会推动信仰佛教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发展。

我们不愿意隐瞒自己的缺点，而是告诉大家，让大家批评。在座的都是宗教家。宗教在教义上有某些积极作用，对民族关系也可以起推动作用。

中国的民族很多，其中汉族的人口最多，约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其他民族只占百分之六左右。但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很大，大概占我国领土的百分之六十。人们都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汉族是“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是“地大物博”，备占一条。所以，我们各民族必须互相合作，互相帮助，才能发展。而且，汉族应该更多地帮助少数民族。

要互相帮助，就要互相尊重，汉族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因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信仰宗教，并且有不少的少数民族是整个民族信仰一种宗教的。回族、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等都是整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藏族全都信仰喇嘛教。这一点和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信仰伊斯兰教，但你们民族中也有信仰基督教的，还有信仰印度教的。我国少数民族中信仰宗教的占很大比例。汉族当中也有很多人是信仰宗教的。汉族首先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其次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第三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对于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要帮助他们创制文字。但是，这些还不是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如果少数民族在经济上不发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所以，要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就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

诸位是宗教家，可能担心宗教在中国的前途如何。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中国的宗教徒比共产党员多。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在世界上是最多的，现在九百多万；但是，中国的宗教徒有几千万，如果加上在家里信教而不到寺庙去的就更多，差不多有一亿了。所以，怎么能够取消宗教呢？况且，对全民族信仰一个宗教的少数民族来说，宗教对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影响就更大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在实实在在地执行着的。我们要造成这样一种习惯：不信教的尊重信教的，信教的尊重不信教的，和睦相处，团结一致。这个话，我在万隆^[1]说过，当时那里有很多宗教家。这不是忽然想起来的，而是我国的真实情况。这种政策是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

你们都看了中央民族学院，那里有许多不同民族、信仰不同宗教的学生。我们在宗教上、风俗习惯上、饮食上都是尊重他们的。这个学校现在还办得不大好，今后要办得更好些。现在全国一共有八所民族学院，甘肃、广西、新疆等地都有。但是，我们觉得还少了些，和三千多万的少数民族还不相称，今后还要多办。我国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自治机关主要应该由少数民

这是同巴基斯坦伊斯兰教代表团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代表团的谈话节录。原载《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族自己的干部组成，靠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去办事，不然就搞不好。多办学校，才能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水平。

高级的经学院办得也还少了些。为宗教服务的人员还不够，还要扩大。我们已经请了埃及的教师来讲课，埃及是伊斯兰教研究经学的权威地方。今后我们的事业发展了，别的国家愿意和我们交换教师、学生，我们也愿意考虑。

我们对于信仰佛教的民族也要帮助。最重要的地方是西藏，那里是喇嘛教。西藏的交通很不发达。我们去年修通了通往西藏的两条公路，从青海和四川都可以通到拉萨，这是很好的事情。今年飞机也通航了。在七千米以上的高空飞行，在三千米的高地上降落，这是新记录。航线是开始通了，但是还要试飞。明年，印尼和巴基斯坦的朋友们来，就可以乘坐飞机到西藏去看一看了。

我们虽然有很多建设，但是要摆脱落后状态，还需要很多时间。这种痛苦，我们这三个国家是相同的。我们都曾经遭受殖民主义的压迫，经济文化还很不发达。现在要赶上去，需要时间。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这样有利于我们的建设。这也就是印尼苏加诺总统在美国所说的，亚非两洲人民不要殖民主义，而要独立；没有战争的要求，只有和平的要求。巴基斯坦总理今年就要到北京来访问了，我们要商谈合作和互相帮助的问题。我们不仅对印尼、巴基斯坦，就是对印度、缅甸、锡兰、泰国以至日本，都要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我们的合作并不排斥任何国家，也不排斥美国。我们反对的只是美国的侵略政策。巴基斯坦和美国关系比较好。我们希望巴基斯坦总理劝劝美国，改变它的政策。世界人民要和平，不要战争。

我们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要互相帮助，进行合作，并且我们也愿意和西方国家合作。但是，正像苏加诺总统所说的，不要有特权。这也就是亚非会议[2]的精神。

你们的邻国也是亚洲国家，应该共同团结起来。亚非国家内部的问题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你们说中国是“长兄”，这是不妥当的。亚非国家不论大小，大家都是平等的。中国虽是大国，也不能居“长”，好居“长”是不好的。美国就是好居“长”，要领导世界，结果搞得大家都不高兴作为六亿人口的国家，我们对世界的贡献还很小。比起我们的祖先来，我们做得还很差。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中国唐朝的首都长安，就是现在西安，曾有十几万外国的居民。现在如果有一万个外国朋友同时来北京旅行，我们的房子就很成问题。所以，我们要做的和应该做的事情是太多了，而我们现在的力量是太小了。

杜勒斯[3]说中国要扩张。我们自己的事情还搞不完，哪里还会要扩张呢？我想和杜勒斯在一起谈谈，让他来中国看一看。但是，他不来，他坐在太平洋东岸说我们要扩张，这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团结起来是个伟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为人类服务的，而不是为了侵略别人。

我祝贺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两国繁荣。希望伊斯兰教友之间今后多多来往，每年开斋节[4]都应该彼此往来。

注 释

[1]万隆，印度尼西亚城市。参见本书《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1]。

[2]亚非会议，同上注。

[3]杜勒斯，参见本书《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一文注[7]。

[4]开斋节，伊斯兰教主要节日之一。中国新疆地区称为“肉孜节”。该教机定教徒每年在伊斯兰教历太阴年九月斋戒一个月，叫做“斋月”。斋戒期满，十月一日为开斋节。每逢此日，教徒们沐浴盛装，举行会礼，相互祝贺。

台湾的解放一定能够实现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我国六万万不可动摇的共同意志。

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极为有利的。

现在，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长。这首先是因为目前国际形势肯定地趋向和缓，美国使用武力侵占台湾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遭到了越来越多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从国内形势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更加壮大和巩固了，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使所有爱国的中国人感到自豪。现在，不但具有革命传统的台湾同胞，已经不愿意继续过那痛苦的奴隶生活，而希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就是在那些从大陆上跑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只有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才是他们的唯一的出路。自从我们发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1]以后，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已经有不少人表示了他们的爱国愿望。我们相信，愿意促成台湾和平解放和祖国完全统一的人，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增加，这将是不可抗拒的趋势。

大势非常清楚，台湾当局追随美国苟延残喘的局面是决不能持久的。他们所追随的外国势力，决不是什么可以依靠的力量；相反地，引狼入室的结果，不但会使他们失掉自己所有的一切，并且随时有被人暗算和遗弃的可能。人们可以从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会谈[2]的不同态度中，得出重要的教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只有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才能由中美两国讨论和解决；至于台湾回到祖国的问题，不论采取什么方式，都只能而且完全可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处理，决不容外国干涉。可是，美国在谈判中却完全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它把台湾当作自己的殖民地，同中国讨价还价。人们还可以看到，现在美国不但侵占了台湾，把它的势力渗透到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并且还在施展它所惯用的分裂阴谋，在台湾内部制造猜疑倾轧，企图加强控制，从中渔利。但是，美国侵略势力的这种愚弄中国人民、干涉中国内政和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愈来愈强烈的不满。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已经表示再也不能忍受那种寄人篱下、随人俯仰的生活。他们要求提高民族自尊心，维护民族尊严，摆脱美国控制，并且要以独立自主的精神，处理自己的内部问题。我们欢迎他们的这种爱国主张。

我们是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也曾经努力争取实现国内的和平。中国人民即使在被迫拿起武器进行国内解放战争期间，甚至在大陆解放以后，也没有放弃和平谈判的努力。尽管这些年来，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我们和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仍

这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的第三部分。报告全文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我们相信，我们久经忧患的伟大民族一定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为了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力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

台湾的同胞从来就是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我们不但时时刻刻关怀着他们，从各方面支持他们反抗外国统治的斗争，而且随时准备欢迎他们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享我们民族的荣誉。

我们了解一切家在大陆、身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处境，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实现同家人团聚的愿望。他们可以同大陆上的亲友通讯，他们也可以回到大陆来作短期的省亲会友，我们准备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

我们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们将来的地位就会得到肯定的保证。如果他们还有疑问的话，他们可以通过大陆上的亲友得到解释，或者派人来大陆考察，我们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我们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人员积极地促成台湾的和平解放。如果这样做，他们就一定能够得到祖国和人民的信赖和照顾。过去在大陆上和平起义的将士所得到的待遇，可以作为先例。

我们也同样希望一切身在海外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而努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使自己免于流落异乡、受人轻视的命运。

我们重视海外广大的爱国侨胞在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曾经或者还在对祖国采取对立态度的少数海外华侨，认清是非，省察大势，跟广大的爱国侨胞站在一起，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的爱国事业作出贡献。

祖国的大门对于所有的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着。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都有权利和义务作出自己的贡献。依靠全民族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台湾的解放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注 释

[1] 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指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他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宣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别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回到大陆来参观和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凡是通过和平途径投向祖国的，中国人民都

将在工作上给以适当的安置。”

[2] 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会谈指中国和美国一九五五年八月开始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大使级会谈。双方商定会谈包括两项议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前项议程在同年九月十日达成协议，后项议程一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一九五八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二月，中美大使级会谈改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

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我们的国家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有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对谁民主，对谁专政，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革命胜利后，专政问题首先是肃清反革命的问题。我们在农村中进行了清匪反霸斗争[1]，然后在全国城乡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2]，清除五种反革命分子。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余地越来越小了，也就是说专政的威力把反革命打垮了。现在，虽然反革命残余分子还存在，今后也还会新产生一些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但是比起解放初期的情况来是大不同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估计，必须认识到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性。

根据这样的形势。今后处理反革命分子，在政策上会比从前更宽一点，而不是更严一点。我们在解放后第一次镇压反革命时，用杀、关、管、放四种办法处理反革命分子。对那些站在人民头上直接压迫人民，有血债，民愤很大又拒不坦白的，实行严厉镇压。在严厉镇压的同时，又执行了改造的方针，用徒刑、劳动改造等办法处理的人，大大多于处死刑的人。对罪行轻微又已经坦白的，从宽释放，对劳动改造中表现好的也提前释放。从去年开始的机关肃反和社会肃反[3]，在政策上比上一次镇反运动更宽一些。机关肃反工作，中央与省市两级已基本结束，正向专县、厂矿发展。由于我们有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机关肃反、审干[4]和解放后社会镇反的经验，这次就比以前做得好一点。我们要肯定成绩，同时也要承认还有错误。我们的肃反工作是在党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的，有了错误可以及时纠正。毛泽东同志提出：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就是说，进行肃反运动，先要引起注意，提高警惕；运动开展后，可能出现某些偏差，有了偏差就纠正。我们遵守这样的原则，一个没杀，大部分没有捉，这样就使机关肃反能够比较健康地进行下去。

关于社会肃反，这一次跟上一次镇反不同。上一次是大张旗鼓地镇压五种公开活动的历史上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这一次主要是清查过去没有发现的，隐瞒历史罪行的，或者新钻进来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从去年到今年的工作来看，情况比上一次好，反革命分子的数目少了，自首坦白的多了。这也说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进行社会肃反的有利条件更多了，我们应该更有秩序、更有步骤、更有准备地把它做完做好。在处理反革命分子从严从宽的问题上要解决得更确当。从严从宽是两方面，两方面都要有，但在从宽方面要比较多一些，这样可以使反革命分子中接受改造的人更多，不可救药、无法改造的只是极少数。这对于我们的社会改造是有利的。不仅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就是对于现在关押着的战犯，包括日本战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以及伪满皇帝溥仪等，我们也准备逐步采取宽大的办法。对他们宽一些，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祖国的完全统一，有利于争取日本人民走向中国友好的道路。

专政的另一方面是对剥削阶级。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地主阶级，我们采用专政的办法，直接没收他们的土地分给农民，这在彻底实行民主革命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节录。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的步骤中已经实现了。现在，地主分子经过了劳动改造，可以吸收他们加入合作社，或者做个候补社员观察一个时期，或者管制他们进行生产。对另一个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在民主革命阶段，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或合作的态度，这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解放后，他们又进一步同我们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经过合作来实现改造，就是通过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来达到消灭这个阶级的目的。所以从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而言，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对于阶级的消灭来说是专政；另一方面，对企业有改造、所有权的转移，一直到对个人的改造、个人的安排，都是用民主的形式来进行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政权，从政协到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里都有他们的代表。在经济组织、文教组织及其他各种组织中，我们都跟他们合作，这都是民主。对民族资产阶级专政、有民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特点。至于对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改造，那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改造是民主的，因为他们不是剥削阶级，而是劳动阶级，我们只能采取民主的改造方式。

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从国内来说，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从国外来说，帝国主义还敌视着我们，因此，我们的专政应该继续。但是，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下应该缩小。这一方面是形势许可，另一方面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比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现在还不是普遍实行直接的、秘密的选举，全国的经济和文化水平还没有发展到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来扩大民主，例如：

第一，使人大代表经常去接触人民。我们的人大代表，还有政协委员，每年应有两次到人民中去直接视察工作。他们可以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广大人民，接触实际，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得恰当，做错了没有，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偏差。就是说可以去找岔子。我们不要怕，我们有信心，不仅敢让党员，还让非党员、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看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偏差。只要不是恶意的，即使看错一点看偏一点也不要紧。这种方式已采用一年半了，要继续坚持下去。

第二，今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开了一个先例，就是把所有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发表出来。这就在人民中揭露了政府工作的缺点。我们不怕揭露，即使揭露错了一点也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有好处。政府应该让人民代表批评自己的错误，承认应该承认的错误。明年还准备进一步允许辩论，当然现在也允许辩论，小组会上就辩论得很热烈，将来在大会上也可以辩论。就是说，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

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我们共产党人相信真理越辩越清楚。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勇气面对真实，面对错误，有错误就不怕揭露，就勇于承认和改正。

第三，我们还要进一步使人大代表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应该承认，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有利于人民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二十年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不过我们也有缺点错误，必须经常检查我们的工作，发现了缺点错误就要改正。在检查工作中，即使有的人看法有偏差，有资产阶级观点，但是从那个观点也许会发现一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问题。

不仅这样，中央与地方也要互相影响。中央包括党中央和国务院，处在领导地位，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大局的发展，但也比较容易忽视某些实际问题、局部利益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而在这方面地方是处在有利地位的，地方比较容易接触群众，接近实际，能更多地看到实际问题、局部问题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这正好弥补中央的不足。单靠一方面不能够很好地实行领导，必须双方合作，互相影响，才能很好地领导。因此，中央与地方尽管是上下关系，必要时也要唱“对台戏”。比如我们在北京坐久了，政治的语言就是“北京话”，没有地方话，到上海来听一听，也学了一些“上海话”，知道了一些地方上所了解的情况。我来了两天就得到了不少知识，坐在北京就得不到。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经常出来，坐在北京的入一年总要集中或分散出来一两个月。两方面多接触，对问题就比较容易看得全面一点。如果在中央呆久了，又不接触群众和实际，就会比地方容易犯官僚主义。因此，中央与地方要相互影响，相互监督，不要以为只是上面对下面监督，下面同样要监督上面，起制约的作用。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央的同志要常到地方来看，有时要邀请地方同志到中央开会，还要摸典型。这样做能够推动我们的工作，减少官僚主义。要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实行得更好，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求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以及省、地、县、区的各级领导，思想上一定要警惕，要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特别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人民比较满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错了一点事情，容易为人民谅解，这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今天在座的同志，一级一级算下去，都是做领导工作的，区的工作、支部的工作也都是领导工作。大家要经常警惕这一点。

注 释

[1] 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为了彻底打垮封建势力，巩固革命秩序，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土匪、特务，反对恶霸地主的斗争。一方面展开军事活动，清剿土匪，掩护群众工作；一方面发动群众，进行反恶霸斗争，摧毁反革命统治势力，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动员群众力量支援剿匪的军事行动。清匪反霸斗争为以后农村

进行土地改革，作好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2]镇压反革命指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在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残存着大量的上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危害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了迅速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3]为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自一九五五年六月起至一九五六年底，在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党政机关、团体、工矿企业、部队和学校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机关肃反或内部肃反；农村、街道和私营企业等方面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社会肃反。

[4]一九四三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的运动。在这次审干中，一度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这一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总结了这次审干运动的经验。这个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等九条方针，反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方针。十月九日，毛泽东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样，就及时纠正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把亚洲变成一个
友好相处的大家庭
(一九五七年二月五日)

亲爱的印度朋友们：

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结束了在亚洲各国的访问，正在回到中国去的路上；承蒙全印广播电台的邀请，我现在在加尔各答向全印度的朋友们讲几句话。

我首先要乘这个机会，向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不但要感谢在我们访问印度的时候，你们所给予我们的热烈而盛大的欢迎；我还要感谢在我们访问其他的国家期间四次路过印度的时候，你们所给予我们的亲切而周到的招待。在印度的每一次逗留都使我们感到像到了亲戚家里一样，使我们体会到中印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

我们是抱着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的目的，访问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现在，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满意地说，我们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无论到哪一个国家，我们都受到令人感动的欢迎。在这种欢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的友谊在发展，也看到了亚洲各国人民的友谊在发展，在所有我们到过的国家中，我们都看到了人民要求和平和友好、要求扩大彼此合作的强烈愿望。同时，我们也看到，虽然亚洲国家一般说来是比较落后的，但是每一个国家，不论是大是小，都有各自突出的优点和长处，值得其他国家学习。殖民主义势力在过去长时期内造成的隔离状态，使我们相互之间缺乏很好的了解，也不能很好地学习。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做的愿望，也有了这样做的条件。我们亚洲各国如果坚持和平友好，努力相互学习，一定能够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有价值的贡献，并且一定能够促进我们各自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在我们的这次访问以后，我相信，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进一步努力，加强我们同亚洲各国人民的友谊，加强我们同亚洲各国的合作，并且加强我们向亚洲各国的学习。

我们在这次访问中，曾经参观了许多历史遗迹，它们使我们想到亚洲的辉煌过去。我们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期，就创造了自己伟大的文化。在悠久的岁月中，我们

曾经积累了无数宝贵的遗产。这种历史的光辉，即使经过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占领，也不能够被磨灭掉。它是亚洲人民伟大的创造力的证明。它构成了我们所永远珍爱的优良传统，而且鼓舞着我们努力建设一个新的、幸福的亚洲。

我们也看到了亚洲的今天。许多曾经沦为外国殖民地或者处于外国控制下的国家，已经取得了独立。这些国家的人民，都要求巩固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并且正在进行建设，争取经济上的独立。这些国家的人民都要求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都要求恢复和发展我们的历史联系。

这是在访问锡兰（今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回国途中在加尔各答机场上向印度人民发表的广播演说。本文刊载于一九五七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

为了实现这种强烈的要求，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已经取得初步的效果。亚洲今天正在开始一个新的生气勃勃的时期，亚洲各国人民，对自己所从事的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正充满着信心在前进。

我们注意到，殖民主义者还在拼命挣扎，企图保持和扩张他们的特殊利益。从他们手里夺回每一点本来属于我们的权利，都必须要进行严重的斗争。但是整个说来，殖民主义已经肯定地趋向衰亡，它的暂时的猖獗并不能改变这种注定的命运。只要我们亚洲各国人民保持警惕，坚持维护独立和自由的斗争，殖民主义的挣扎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也注意到，在新近取得的独立的亚洲国家之间并不是没有分歧和争端的，特别是因为殖民主义者曾经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今天使我们痛苦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可以用和平谈判的方法求得解决。无论如何，这些分歧和争端不应该妨碍我们之间的团结，更不应该容许殖民主义者从中制造是非，挑起冲突。事实上，已经有若干这样的问题，由有关国家以相互谅解的精神，达成了圆满的解决。我们希望而且相信这种精神将会继续得到发展，我们一定要把殖民主义者曾经在这里制造了无数的争端和冲突的亚洲，变成一个所有亚洲国家友好相处的大家庭。

在我们的访问中，我们还注意到，由中国和印度首先倡议的五项原则——潘查希拉，已经得到广泛的支持，而且已经开始应用到许多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去。同时，我还愿再重复一遍我曾经在印度国会中讲过的话：“万隆精神并没有枯萎”，它的影响正在扩大。帝国主义者对埃及的侵略的失败就是一个明证。我们深信，中印两国所首倡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所宣布的十项原则终将战胜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的阴谋。

在我们访问了这么多的亚洲国家以后，我们更加感到中国和印度的友谊的重要。中国和印度在支持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的合作，对于稳定亚洲和世界的局势，有着重要的作用。我深信，我们两国人民将会意识到自己对亚洲和世界的责任而作出必要的努力。

亲爱的印度朋友们，再见了，我们将带着你们的善意和友谊，带着我们所访问过的各国人民的善意和友谊回去。我们中国人民将永远坚持中印两国人民的团结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团结。我们相信，这将是我們能够赢得和平、能够进行我们各自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保证。

印地秦尼巴依巴依（中印人民是兄弟）！

潘查希拉秦达巴（五项原则万岁）！

香底秦达巴（和平万岁）！

西藏问题与中印关系 (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

我想讲一讲西藏问题和中印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迅速前进的新社会要代替停滞不前的、落后的旧社会。在西藏一百二十万人中，绝大多数人要求以新社会来代替黑暗的旧社会。反对这种变革的统治阶级只是极少数的人，他们害怕自己的统治被推翻。当然，这些人的态度也不一致，有的坚决反对西藏改革，有的不坚决，有的不反对。尼赫鲁[1]和印度上层人士很怕西藏改革，反对改革，甚至说改革不可能。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但他们却反对西藏的改革，这就发生了他们干涉我国内政和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的问题。他们希望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成为中印间的“缓冲国”。这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也是中印间的争论中心。

我先谈谈西藏的历史。世界人民对西藏历史有神秘之感，尤其是近一百年来，英帝国主义把西藏历史歪曲了，在世界人民当中制造一些虚假的传说和错误的概念。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世界上还有一些人不完全懂得，不完全承认，尤其是资产阶级，他们不承认，并制造一种传说，好像西藏一直是独立的。西藏在古时候曾是一个独立王朝，但七百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大家庭的一员了。十二世纪时，元朝蒙古族上层统治中国，西藏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现在盛行的喇嘛教派（黄教），就是在蒙古族上层统治中国时成为主要的教派的。达赖成为西藏的统治者是十六世纪时清朝册封的。“达赖”这个词不是藏语，而是蒙古语，是大海的意思。七百年来，西藏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新疆划给沙俄帝国主义，西藏划给英帝国主义。但俄国革命以后，列宁取消了不平等条约。可是印度一部分上层人士还继承英国过去的政策，把西藏说成是一个“独立国家”，说中国只有“宗主权”，或把西藏说成是“保护国”。

知道了历史背景，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围什么借口来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是说西藏曾经是独立王朝，因此现在也应该保持独立。这个论据如果能成立，世界上的国家就要四分五裂，天下就要大乱。七百年前，就是英国本土也不是统一的，印度更是四分五裂，有许多土邦。那么，现在是不是应该恢复原状呢？

二是说凡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就要保持完全的自治，照英国的解释，就是独立、半独立，也就是保护国。这个论据如果能成立，凡是多民族的国家都要分崩离析。印度、英国、美国也统统要分裂。印度的民族也很复杂，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语言，没有一种语言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使用的。那么，印度是否要分裂成许多国家呢？

三是说宗教相同就可以干涉别国内政。印度说西藏和印度都信佛教，而且佛教是从印度去的，因此印度对西藏要干涉。这个论据如果能成立，东南

这是会见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等十一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使节的谈话节录。原载《周恩来外交文选》。

亚许多国家，印度都可以干涉了。那么，天下岂不要大乱了吗？如果说佛教发展不发展，别人都要干涉的话，那么中国也可以过问印度的事情，因为中国信佛教的人比印度信佛教的人多。印度信印度教的人多，但印度教并不是佛教。如果这样，亚洲又要大乱。当然，我们对此毫无兴趣，决不过问。

这些论据都不能成立，都是站不住脚的。印度一部分上层人士，按照尼赫鲁的说法是同情西藏人。实际上是同情农奴主。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西藏停滞不前，不改革，作为“缓冲国”，置于印度势力之下，成为它的保护国。尼赫鲁说，这是印度人“本能的反应”。这很对，的确是他们阶级本能的反应。

我再谈谈西藏叛乱和我们平息叛乱的问题。西藏叛乱是因为西藏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存在着最落后的封建制度和农奴制残余。农奴主包括三部分人，一部分是大官僚，一部分是寺院的管事大喇嘛，一部分是贵族，总共六万人左右，他们拥有全部土地和绝大部分的牲畜。农奴没有土地，世代代农奴主耕种，子子孙孙都是农奴。不仅生产的東西要送给农奴主，而且还要服差役和兵役。农奴主可以互相赠送农奴，稍不如意，就对农奴打骂杀戮，割耳朵、割鼻子、剜眼睛，其残酷是骇人听闻的。这是中国土地上一个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的社会制度。旧中国不可能改变这种制度，不管是蒙古族、满族或汉族的统治，都不能使西藏起变化，只能使黑暗制度继续下去。英帝国主义者侵略西藏，更利用这种落后制度，通过一些农奴主残酷地剥削农奴，把羊毛、皮张和矿产搜刮出去。所以，这些农奴主同时又是大买办。现在跑到印度去的就有一些大农奴主，同时又是大买办。这些农奴主在西藏掌握实权，达赖喇嘛只是他们的工具。自从清朝册封五世达赖掌握政权后，不到三百年，一共十世达赖，其中一个被废掉，四个暴死，这一个被劫持去印度。达赖要到十八岁才能管事，他身边的人往往不等达赖大了，就把他废掉或搞掉，另找一个。这些反动的统治者最怕改革，在中国反动政府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西藏的黑暗统治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加深。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和中央派去的工作人员进入西藏以后，那里就起了根本变化。党和军队正确执行了民族政策，不能不使停滞不前的社会起某种变化，那里的阶级斗争有了新的变化。农奴敢于起来反抗农奴主，并且要求推翻农奴制度，一个静止的高原变成了一个要爆发的火山。这就使得农奴主中一些最顽固的分于极端反对改革。另一方面，有一部分开明的人看到变革不可避免，也向我们提到要设法改革，但主张用温和的办法，避免严重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原可采取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发动群众改革，这样快一点，一种是等待上层分子更多地觉悟以后再进行改革，这样慢一点。达赖[3]也表示要改革，但要求慢一点。尼赫鲁见了达赖以后也说，达赖表示西藏社会经济落后，需要改革。所以，我们就采取慢一点的方针。这是西藏的内部情况。

外来因素也妨碍西藏改革。印度一部分上层人士希望西藏落后制度不变，保持使西藏成为“缓冲国”的想法，在西藏反动集团中起了很大作用。西藏反动分子纷纷到噶伦堡去，他们同蒋介石、美国、英国的特务来往活动，没有印度的许可是搞不成的。所以我们说，多少年来噶伦堡就成为西藏叛乱分子在外国活动的中心。西藏上层统治阶级要维持剥削，反对改革，这是西藏叛乱的主要原因，但没有外来的鼓励、煽动，也不可能发动这样的叛乱。这些叛乱分子在印度听到和当年从英国听到的相类似的话，因此，他们就把

希望寄托于印度。另一方面，他们对我们的等待政策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不敢搞改革，会继续退让，甚至可能把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当他们搞起叛乱后，我们还是责成西藏地方政府平叛。这当然不可能，因为叛乱就是他们搞起来的。但是，这样可以暴露他们，使广大人民知道他们反对改革。所以，从三月十日到三月二十日之间，许多问题暴露出来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大多数人参加了叛乱，达赖被劫持，写了三封信[4]。在他们充分暴露并向当地驻军开枪以后，我们才还击。这时西藏人民都清楚了，我们一还击，两三天内拉萨的叛乱平定了，俘虏了四千多人，然后调兵去山南。我们等待了七八年，他们一叛乱，很快就平定了，所以如此快，是因为广大人民支持。全西藏的叛乱分子将很快肃清，因为一共只有两万多人，反动头子只是极少数人，被俘虏的人很快觉悟，现在，一部分人回家生产了，另一部分人跑到印度去了，大约有九千人。

西藏很快掀起一个民主改革的高潮，西藏的改革，前途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西藏人民的大喜事。对于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都是一件喜事。当然，对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则是一个悲剧，他们幻想的“缓冲国”幻灭了。这样，印度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首先是大资产阶级就和我们对立起来，在报刊上大肆污蔑煽动，使印度一部分人受到蒙蔽。历史上英帝国主义者的胡说八道，在印度的知识分子中散布得很广，影响还远没有肃清。因此，前一个时候从印度发出的对我们的攻击、挑衅和干涉的消息非常多，帝国主义对此很高兴，到处传播散布，民族主义国家也有一部分人出来说话，似乎乌云蔽日了。但是，分析一下，说这些话的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国家中的大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只占极少数，但宣传机构掌握在他们手里，就可以兴风作浪。他们说同情西藏人，实际上是同情连他们自己国家里也已经不存在的那种最黑暗的农奴制度。这次斗争，在国内是由西藏叛乱集团、在国际上是由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挑起来的。在国内，我们是行使主权，我们站在西藏广大人民一边，要推翻黑暗制度，用和平改造的方法进行改革。在国际上，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把西藏问题向全世界人民说清楚，把反动阴谋揭穿，把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干涉者的真面目揭露出来，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过去所不清楚的事和印度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当然，揭露需要时间，也要有准备。如果干涉者攻击我们一百年，我们也就准备回击一百年。真理越辩越明，印度的借口已经在一天天破产。印度想搞“缓冲国”，要西藏不改革，要解放军撤退等等打算，是不好公开说的，只好在幕后活动。他们公开还得说不干涉我国内政，对西藏没有领土野心，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巩固中印友好，等等。对这些好话，我们当然欢迎。尼赫鲁最近说，他们对西藏没有做什么事，只是接待了达赖和一些难民。印度当然有权力给予避难，我们并没有说它不能这样做。尼赫鲁一方面说印度报刊上发表的对我国诬蔑、攻击的话是同印度政府无关的，因为印度有言论自由，但另一方面又说他们各方面是一致的。这就自相矛盾了。印度有言论自由，难道中国就没有言论自由吗？对于这类冷战的攻击，我们一定要回答。不仅印度，对于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也要回答，因为英国怂恿印度，坐山观虎斗，供给印度子弹。对于全世界反动报纸的攻击也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回答，这是政治斗争。尼赫鲁也懂得，他们的做法并不能改变西藏的平叛，改革一定要进行，“缓冲国”也幻灭了。剩下的就是冷战。他们想用冷战和政治压力搞一个印度、中国、西

藏的三角会议，来干涉中国的内政。他们现在已从各方面透露这种消息并且开始进行试探，这是英帝国主义者在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四年搞西姆拉会议[5]的翻版。当时中国的袁世凯政府对西姆拉条约也是不接受的，怎么能设想现在的新国会接受呢？就连这种会议的方式也不能接受。班禅[6]说得很对，西藏问题只能在中国解决，怎么能到外国去解决呢？印度这种想法不可能实现，但它并未死心，还在试探。我们必须把这条路堵死。剩下来就只是达赖和一群难民，这就是它的资本。达赖如能摆脱劫持，是会回来的，但很困难。

我们同印度广大人民并无冲突，中印两国人民过去友好相处，今后还会友好相处。印度人民要维持中印友好，尼赫鲁不能不反映这种情绪，这也是他每次声明中的矛盾所在。我们对尼赫鲁还是采取留有余地的政策，又争取，又批评，又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注 释

[1] 尼赫鲁，参见本书《抗美援朝，保卫和平》一文注[4]。

[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见本书《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10]。

[3] 达赖喇嘛指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法名丹增嘉措，俗名拉木登珠，一九二五年生，青海湟中人。藏族。一九三九年被选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经国民党政府批准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三月十六日达赖喇嘛出走印度。

[4]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借达赖喇嘛预定这一天到人民解放军两藏军区礼堂看戏一事，大肆散布西藏军区部队要扣留达赖喇嘛的谣言，并以此为借口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劫持达赖喇嘛，打死打伤藏族爱国人士多人，提出“赶走汉人”、“西藏独立”的反动口号。事件发生后，达赖喇嘛分别在二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六日三次亲笔写信给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说明西藏叛乱分子以保护他的安全为名，进行危害他的活动，制造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他正在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并向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进行教育。三月十六日夜，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三月十九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对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的上面进攻，从而撕毁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六条协议。二月二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奉命平叛。

[5] 西姆拉会议指一九一三年十月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召开、一九一四年七月破裂的所谓“中英藏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国代表、中国政府（即当时袁世凯政府）的代表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英国代表一下把待会议，提出一个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和一份所谓《西姆拉条约》草案，无理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西藏有完全自治权，不得改为行省”；“中国政府除驻藏代表率卫队外，不派军队驻藏”；“英国人在西藏之商务，享受最惠国待遇”等等，妄图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中国政府在会前和会议期间反对西藏地方当局

代表以平等地位与会，不同意英国代表提出的“草案”。中国代表在最后拒绝签字，并于1949年6月3日正式发表声明，不承认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签订的条约及文付，指出所谓《西姆拉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以后中国历届政府均不承认所谓《西姆拉条约》。

[6] 班禅指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俗名贡布慈丹（1938～1989），青海循化人，藏族。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1949年6月3日经国民党政府批准，正式成为第十世班禅喇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副委员长，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6年首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1959年3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1989年1月28日圆寂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

中央常委要我讲一下国际关系，主要是共产国际[1]和我们党的关系。我先概括他讲六点看法：

一、共产国际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一九四三)。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成立，当然是必要的。它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各国党成长，成熟了，共产国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共产国际在建立的初期，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那时，尽管列宁有那么高的威望，但共产国际是民主集中地决定问题的，各国党的代表可以纷纷议论，各抒所见，非常活跃。共产国际划清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界限，也批判了“左”派幼稚病，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动员了各国革命人民拥护苏联，支持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革命运动。

共产国际的解散也很适时。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作了一个决议，说对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不要去干涉，以后也的确放手了一些。但是这时，共产国际的存在还需要，它在反法西斯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到了一九四三年六月，共产国际就解散了。

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在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他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

这是对共产国际的一个粗浅的总评。

二、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要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中国党的经验很丰富。中国党虽然犯过几次“左”的和右的路线错误，但也有很重要的正面的经验。

三、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国际的坏的经验在本国重犯，使国际的好的经验在本国得以发展。据我所了解，不独立思考、盲从迷信的人是很多的，破除迷信、独立思考是很不容易的。当然独立思考并不等于狂妄自大，唯心武断，拒绝国际提出的好的意见。陈独秀[2]是狂妄自大、唯心武断的。李立三[3]同志也是这样，他提出夺取武汉，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全国胜利的开始；打下武汉再和共产国际算帐；中国革命起来了，要苏联出兵；中国革命胜利，英、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都要濒于末日，世界革命就会起来。现在立三同志看一看这些话，他自己也会发笑的。

四、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毛泽东同志说，两个大国的革命胜利，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时候取得的。在现在的情况下，成立国际组织，相互间

这是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所做报告的节录。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总是不容易做到平等。不仅在政治上，就是在经济上也是如此。

五、研究国际的经验，要全面地看问题。斯大林管事的时间长，缺点错误多一些，但是在斯大林那个时期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就是在共产国际中期和斯大林的晚年，他也是支持革命的多，不许革命的少。我们顶一顶，他还是可以接受一点意见，也可以含蓄地承认一点错误。他的怀疑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4]，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斯大林还是讲理的。当然，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错误，但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主要应该由中国同志负责，犯不犯错误主要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我们过去犯的错误已经认识了，纠正了，革命已经胜利了。

六、团结高于一切，国际主义万岁。这是原则，过去如此，现在也应该如此。所谓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分歧，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同时批评要注意场合，要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如果批评或斗争都不生效，也需要等待，需要时间。中国党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年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5]，从遵义会议[6]开始到七大[7]经过十年之久才解决了问题。一个党如此，何况国际？我们要举团结的旗帜。这主要是对于苏联千百万党员、两亿人民，各兄弟党的党员，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要革命的人民。

下面分几个时期讲一讲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关系。

（一）共产国际的初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

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8]，还找过江亢虎[9]、黄介民[10]和戴季陶[11]；在北方找过吴佩孚[12]，在南方找了孙中山。中国有五四运动[13]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很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党很快地走到了群众斗争中去。这时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的次数也逐渐多起来了。一九二二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都讨论了东方革命问题。一九二二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认真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以后就大量吸收中国的知识分子到莫斯科去学习。一九二三年共产国际作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还讨论了中国搞土地革命的问题，并发来了指示。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召开三大[14]。当时党内有“左”的和右的两种思想：一种以陈独秀为代表，认为中国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是帮忙，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根本没有提；一种以张国焘[15]为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员只能少数人加入国民党，工人不能参加。实际上，这两种思想都是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党的四大的决议对这两种思想都批评了，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现在看来，批评也没有重点。当时群众斗争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但是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下，在关键问题上掌不好舵。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已经比过去嚣张得多，如西山会议派[16]。但在此以前广东打商团[17]，东征陈炯明[18]等等，左派力量大大发展。当时的政策应该是支持左派，排斥右派，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但陈独秀却要让右派回去，并且要保证他们在国民党二

大上当选，结果右派的气焰高涨。在军事上，我们也让步。蒋介石进攻，我们党没有警惕，他制造了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19]，把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力量搞掉了一部分。当时我们并不是没有力量，应该反击，但没有反击。结果使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力量仅仅留下了一个独立团[20]，这个团到了武汉发展成两个师。北伐的时候，我们应该争取群众，争取军队。可是，这边北伐，那边上海的《向导》反映陈独秀的主张，反对北伐，说现在是军阀战争，广东不应该北伐，应该防御，应该搞群众斗争。我们党放弃了对北伐战争的领导。土地革命轰轰烈烈起来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21]来了，但是党中央不支持。当时，陈独秀的确是有点怕革命，怕群众。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对中国问题作了一些不正确的分析，六、七、八三次会议对我国阶级力量的分析都有错误。特别是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会议，认为资产阶级都叛变了。到了武汉政府叛变[22]之后，共产国际又认为，小资产阶级也离开革命了。在领导权问题上，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领导已经有了雏形，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共产党已经起了领导作用。本来我们应该在广东革命政权的时候就抓军队，而且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党中央在那个时候放弃了领导权。这时列宁去世了，斯大林跟他们党内的反对派斗争很激烈，对中国革命的情况不大了解，方针也不大明确。当时我国革命的中心在广东，党的中心也应该在广东才好领导。但是党的中心在上海。请陈独秀到广东去，他也下去。两个中心常常发生矛盾。直到打下武汉很久，党的中心才移到武汉。所以，第一个时期还是中国党的领导人应负更多的责任。那时，毛泽东同志的威信还没有建立，也不可能建立。当时党的领导人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也不高，还有各种派别性，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更助长了派别性，这就影响了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发展。

（二）共产国际的中期（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三五年七月）。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基本上是错误的，对我们中国党影响最大。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政府叛变革命，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破产。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央来信。这封信强调了革命的前途，而对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分析得不正确，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叛变了。对革命的任务，提出了七条：

第一，退出武汉政府；第二，发表宣言；第三，不要退出国民党，在国民党内搞左派；第四，工人斗争；第五，武装工农；第六，党可能转入地下；第七，反机会主义。这七条，对搞军队、搞地方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没有重视，而当时恰恰应该是搞军队、搞地方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

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联系到组织问题。共产国际派来的鲍罗廷[23]直接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常委。这是仓促通过的。七月十三日中央有个声明，只提了退出武汉政府。当时我们党还有一点武装力量，如叶挺的部队[24]，所以决定举行南昌起义[25]。南昌起义的目的是南进汕头，占领海口，然后到广州。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当时，共产国际派了几个人来，在罗米那兹[26]的指导下，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27]。八七会议在反对机会主义这一点上是痛快淋漓的，但在怎样跟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深入群众斗争，建立军队、政权、根据地这些重要问题上没有作出正确的总结和指示，没有提出明确的任務。张太雷[28]到汕头给我们传达八七会议，只批评了机

会主义，没有提出如何做的问题。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

中国革命失败，反对派攻击斯大林更凶。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连写了儿篇文章[29]驳反对派，其中对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分析，形势的估计，许多是不合实际的。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先后都离开革命阵营了，但中国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并且有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在共产国际、斯大林的理论分析和形势估计的影响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就搞了盲动主义，号召到处暴动，认为革命形势还是高潮。在组织上，处分了不少人，最主要的是开除谭平山[30]，对毛泽东同志和我们这些人都有处分。十一月中央会议决定组织广州暴动[31]，也没有明确的方向。参与指导广州暴动的有一个德国人，还有一个苏联人。广州暴动失败，大雷同志牺牲后，中央把立三同志派到香港去领导广东的工作，这时是盲动主义的最高峰。盲动主义在广东搞得最厉害，广东干部牺牲得最多。当时的路线，根本没有接受上海、南昌、广州暴动的教训，仍然要到处搞暴动，结果使革命力量特别是白区革命力量受到了很大损失。当时在组织上还搞了一条，叫作领导干部工人化，使领导机关更加混乱，宗派性增加了。这个根也是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的。

现在讲一下中共六大[32]。六大是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召开的。中共有一个代表团，其中有向忠发[33]等人，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六大的召开，首先去的代表就有问题。当时强调工人化，在七十五个代表中，有四十一一个工人，后来叛变的十六个代表中，有十四个工人。当时共产国际指导六大工作的人，一个是布哈林[34]，还有一个法国同志，还有陶里亚蒂[35]，但做实际工作的是米夫[36]。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只强调工人成份，中央委员二十几个人中，很多是工人，而当时党内真正有威信的同志有些没有被选人。会后，翟秋白[37]、张国焘留莫斯科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六大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等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阶级关系等问题则作了不正确的分析，认为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叛变革命了。在土地问题上，只提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农民代表会议处理；对军事问题没有强调指出，六大后，中山大学里以工明[38]为首的宗派，集中力量反对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中山大学是一九二五年在莫斯科创办的，米夫做副校长，吸收了大革命时期党的一些干部和青年去学习，其中有王明这么一些人，还吸收了国民党的一些左派。在中山大学内，宗派斗争很厉害。六大后，中山大学的宗派斗争继续发展。王明宗派反对中国代表团，实质是反对党中央，认为中国党的中央不行了，要换人。到了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再加上联共（布）清党的影响，就搞得更混乱了，对有一点可疑的就开除，还流放了一部分。

六大以后，共产国际派了一个波兰同志和一个德国同志来中国。到了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陆续来了四封信。第一封信的内容是反右倾，第二封信的内容是反对联合富农，第三封信的内容是赤色工会公开，第四封信的内容是反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39]和第三种力量。这四封信，对立三路线都有影响。第四封信就号召中国搞政治罢工，准备革命，说直接革命形势快到了，我一九三〇年三月动身去共产国际。七月，我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在中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很重视。当时产生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

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国际的决议还附了东方部的六个决议[40]。斯大林说，这么多决议拿到中国大多了，作为草案拿去吧。国内，六月十一日产生了立三路线。立三路线提出，要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全国革命的开始。

同时在全国布置暴动，并提出夺取武汉、南昌、长沙等，大城市的计划。后来打下了长沙，于是在八月一日、三日，在上海连着开了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立三说，打下武汉再和共产国际算帐。立三路线持续时间只有三四个月，但使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受到很大损失，所以，九月就开了二中全会。三中全会还有“左”的东西，因为三中全会是传达共产国际上述决议案的。会上，向忠发和我做了报告，秋白做了结论，立三发了言。会上对立三的批评很尖锐，不过后来在会议决议上写的并不那么尖锐。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例如批评了何孟雄[41]，也批评了陈绍禹（王明），这些批评，也有对的，也有错的。三中全会补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向各地派“钦差大臣”，从三中全会就开始了。当时，共产国际说中共中央不重视苏区，所以中央就往苏区派了不少人，使苏区受到了影响。

一九三一年十月共产国际来信，说中央不对，是调和路线。王明他们就闹起来了。米夫一来，更造成了党内的危机。王明写了小册子[42]，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撤换中央的领导。所以，召开了四中全会。四中全会，我们起草了决议，不被采用，米夫自己起草了决议。三中全会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四中全会也是根据这个决议案的，再加上国际的信，用极左反对立三路线的“左”，作了决议。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小册子更加发挥了作用。他站在更“左”的立场来反对立三的“右倾”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形成了更“左”的路线，再加上中央几个负责人叛变，使我们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一九三一年八月，米夫回去了。共产国际的八月决议批评了三中全会，说四中全会后，中国党更加健全了。实际上，四中全会后，中国党更加混乱了。四中全会把我保留在政治局，把秋白去掉了。以后，王明到了共产国际，张国焘、陈昌浩[43]到了鄂豫皖苏区，我到了中央苏区。当时，中央只留少数人，多数派到各地去，抓各地的权。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这个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是批准了的。临时中央有一个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又有一个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当时要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要求攻打中心城市，对于正确的同志，如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指责他们“右倾”。宁都会议[44]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被取消了。一九三三年又反对罗明路线[45]，反对邓、毛、谢、古[46]，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47]。他虽然是个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48]的军事路线相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当时的军事路线执行的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现在看来，当时不退出江西是不可能的。到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才在军事上纠正了错误路线，挽救了中国革命。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有了遵义会议，虽然长征中受了损失，又遇到了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但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战胜了狂风巨浪，克服了党内的危机。

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导在中期是有很大错误的。中国党在这个时期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了那么大的损失，我们中国人当然要负责，但与共产国际有很大的关系。

（三）共产国际的后期（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三年）。

这个时期，中国党与共产国际联系少了。一九三五年七八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国内问题，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49]领导。当时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国际执委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当时，共产国际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国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合。西安事变[50]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西安事变，我们处理得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时期，中国党由毛泽东同志当家了，但是共产国际对我们中国党还有影响。主要的问题是第二次王明路线[51]。一九三七年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说他跟斯大林谈过话。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中国优秀青年的总汇。王明回来后，主持了长江局，蒙蔽了一批人，搞了第二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虽然时间不长，但对北方，对新四军，对上海，都有影响。第二次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关系也好。后来我去莫斯科对季米特洛夫谈王明的错误，季米特洛夫听了还表示惊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很多干部逐渐觉悟了，王明就逐步地孤立了。当时蒋介石也不要王明，连个部长都没有给他当。毛泽东同志说，要是给他一个部长当，也许情形更坏。

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由于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资本主义各国党处境很不利，思想也很混乱。毛泽东同志九月一日有个《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52]，我把它带到共产国际，发给各兄弟党。共产国际很称赞，说中国党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支持。

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但这个时期比共产国际初期对我们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对我们党的干涉就很少了。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就解散了。

注 释

[1]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同年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2] 陈独秀，参见本书《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一文注[20]。

[3] 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于一九三一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接受了

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党的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4]抗美援朝，参见本书《抗美援朝，保卫和平》一文注[1]。

[5]三次“左”倾错误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6]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7]七大，参见本书《建设与团结》一文注[12]。

[8]李大钊（一八八九～一九二七），河北乐亭人。曾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并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之一。一九一八年参加筹组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二年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9]江亢虎（一八八三～一九五四），江西弋阳人。早年游历日本和欧洲。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他标榜社会主义，在上海创办中国社会党。一九一三年，该党被袁世凯政府解散。一九二一年六月他以社会党人身份列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他为了投靠北洋军阀，重新组织中国社会党，次年又改组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一九二七年，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时，他不得不把这个党解散。抗日战争时期，他投身敌伪政府，堕落为汉奸。

[10]黄介民（一八八三～一九五六），江西清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九年在上海任中华工业协会总干事，参加过反帝爱国活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他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辞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候补监委等职务，从事司法和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江西省人民政府监察厅副厅长。

[11]戴季陶（一八九一～一九四九），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早年加入同盟会。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周刊，对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作过一些研究。一九二四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想上的准备。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继续追随蒋介石，历任国民党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

[12]吴佩孚，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

[13]五四运动，参见本书《革命救国论》一文注[13]。

[14]三大指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的立场，以及使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批评了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和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并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这次大会为国共合作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

[15] 张国焘，参见本书《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一文注[21]。

[16]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公开进行反革命分裂活动。十一月二十三日，邹鲁、谢持、林森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反共、反苏、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随后，他们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等地设立地方党部，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这批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17] 一九二四年，英帝国主义用大量金钱、军火支持广州大买办陈廉伯所控制的反革命武装组织商团，企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八月，广东革命政府扣留了陈廉伯为组织武装叛乱而偷运的军火。陈指使商团向孙中山请愿，并在各省各地煽动罢市。十月十日，广州群众为庆祝辛亥革命举行游行，遭到商团枪击。参加游行的十六个团体成立了“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坚决要求解散商团，严惩凶手。在中国共产党、广大工农群众和国民党左派的影响和支持下，孙中山采取措施，调集黄埔学生军、工农武装及其他军队，在十五日消灭了这一反革命武装。

[18] 陈炯明，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5]。

[19] 中山舰事件，参见本书《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注[16]。

[20] 独立团指一九二五年冬在广东肇庆成立的以共产党人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该团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在北伐战争中，英勇善战，战功卓著。

[21] 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一九二七年二月，毛泽东曾将这篇文章送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但是陈独秀等右倾领导者不予发表。三月五日，这篇文章的一部分首先发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第35、36期合刊上，其余部分在第38、39期上续登。三月十二日，《向导》发表了此文的一部分，当时在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主张全文刊完，被陈独秀等拒绝。四月，瞿秋白将此文交中共在武汉开办的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并为此书写了序言。

[22] 指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这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日趋反动。六月十日，汪精卫同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策划反共；十九日，冯又同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密谋蒋汪合作，共同反共。中国共产党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对国民党的阴谋不加戒备，没有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与共产党决裂，随后封闭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

[23] 鲍罗廷（一八八四～一九五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是苏联政府派到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和国民党的政治顾问。一九二三年十月到广州。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政府叛变后回国。

[24] 叶挺，参见本书《论统一战线》一文注[51]。叶挺的部队指南昌起义前以独立团为基础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由独立团一部分骨干编成的第四军二十五师。叶挺当时任二十四师师长。

[25] 南昌起义，参见本书《为庆贺朱总司令六十大寿的祝辞》一文注[4]。

[26] 罗米那兹（一八九八～一九三四），苏联人。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

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中国。此时，武汉政府已经叛变革命，他参加了中共八七会议的领导工作。

[27] 八七会议，参见本书《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一文注[6]。

[28] 张太雷（一八九八～一九二七），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在北平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五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和宣传部长。一九二七五月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八月出席党的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十二月领导广州起义时牺牲。

[29] 指斯大林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九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演说以及九月二十七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等。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98～325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84页、第132～143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

[30] 谭平山（一八八六～一九五六），广东高明人。一九二二年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第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时，是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十一月，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当时的“左”倾领导者开除党籍，后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抗日战争时期，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策。一九四八年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31] 广州暴动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领导下，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联合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经过激战，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二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炮火的掩护下，向广州反扑。张太雷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起义部队十三日被迫撤出广州。撤出的起义部队，分别与东江、湖南一带的革命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32] 六大，参见本书《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一文注[8]。

[33] 向忠发（一八七九～一九三一），湖北汉川人。一九二七年七月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二八年党的六大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被捕叛变，二十四日被国民党枪杀。

[34] 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二八），一九〇六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九三七年被开除党籍，次年被处死，（一九八八年六月，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为布哈林平反，恢复布哈林党籍。）

[35] 陶里亚蒂（一八九三～一九六四），曾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一

九二八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一九八八年六月、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为布哈林平反，恢复布哈林党籍。）

[36] 米夫（一九一〇~一九三八），苏联人。一九二八年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莫斯科大学校长。一九三〇年冬到上海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于他的支持，王明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

[37] 瞿秋白（一八八九~一九三五年），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〇年九月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党中央领导机关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一九三五年二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

[38] 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一四~一九七四），安徽金寨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长江局书记。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六十年后堕落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

[39] 改组派是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系。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政府实行反共后，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党合流。后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于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

[40] 指一九三〇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草案）》、《关于中国农民问题》、《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关于中国苏区土地农民问题（草案）》、《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草案）》等六项决议案。

[41] 何孟雄（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南酃县人。中国早期北方职工运动的组织言之一，曾创建京绥铁路工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曾任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委员、省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抵制过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错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牺牲于龙华。

[42] 指一九三〇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王明写的《两条路线》。这是一本宣扬“左”倾教条主义的小册子，一九三一年二月在上海出版，一九三二年在莫斯科再版，书名改作《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43] 陈昌浩（一九一六~一九六七），湖北汉阳人。当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

[44] 宁都会议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提出的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而要求红军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后，调毛泽东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45]罗明，一九〇一年生，广东大埔人。一九三二年任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省委代理书记时，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当时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种意见说成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46]邓指邓小平，一九〇四年生，四川广安人。当时任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指毛泽覃（一九〇五～一九三五），湖南湘潭人。当时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指谢唯俊（一九〇七～一九三五），湖南丰阳人。当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乐安中心县委书记等职。古指古柏（一九〇六～一九三五），江西寻乌人。当时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等职。他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执行正确的防御路线，被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斥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受到了错误的打击。

[47]李德（一九〇一～一九七四），又名华夫，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实际上掌握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同当时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遵义会议前夕，他被取消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48]博古参见本书《论统一战线》一文注[23]。

[49]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一九二一年任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回国后，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

[50]西安事变参见本书《悼张淮南先生》一文注[2]。

[51]第二次王明路线指抗日战争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随后，在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时，又擅自发表一些包含有原则错误的意见、宣言、决议的文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区扩大抗日根据地，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部分地区一度得到推行。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52]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580～58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当前世界局势的特点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国际形势的发展，一天天有利于我们，这是可以肯定的。肯尼迪[1]上台以来，其所作所为的结果，反而不利于美帝国主义。今年四月三日，我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面临着五大矛盾，这就是它同本国人民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它同它的同盟国的矛盾，它同民族独立运动的矛盾，以及它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这五大矛盾，它都是无法解决的。

肯尼迪上台之后，想解救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但他是始终走不出死胡同的。因为他发展军火生产，扩军备战，企图从战争中找出路，但是现在还不可能打世界大战。最近肯尼迪在联大的演说，尽管有战争威胁的成分，但是也可以看出，敢于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还小。军火不能吃，也不能穿，又不能用，生产的军火技术水平提高了，原来的东西就成了废物，这不是最大的浪费吗？现在美国国内五百万失业大军仍在继续增加，人民的购买力仍在继续降低；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独立运动一天天发展壮大，美帝国主义的世界市场越来越狭窄，它是无法逃脱经济恐慌的。美国垄断资本之间，军火垄断资本同和平工业财团，也是互相竞争的。它同它的同盟国的矛盾也在发展。美帝国主义同亚非国家乃至拉美国家的矛盾也在一天一天发展。它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是两个阵营、两种体系之间的根本矛盾。以上这些矛盾，它都不能解决。

现在矛盾的主导方面是世界各国人民，这是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谁掌握了矛盾的主导方面，矛盾就要由谁来解决。当然，要彻底解决这些矛盾还是长期的事情，斗争还会有起伏，但是可以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解决。两个阵营斗争的胜负，决定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和团结。其他矛盾的解决也决定于人民力量的强大。在今年四月三日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我在讲话中曾经指出，四种力量的汇合，就是社会主义力量、民族独立运动力量、人民革命斗争力量和和平运动力量的汇合，决定着世界的命运。这也是去年莫斯科会议声明中所说的。这是现在世界局势的第一个特点，不管有任何起伏和挫折，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当前世界局势的第二个特点，是美帝国主义玩弄反革命的两手。这次肯尼迪在联大暴露得更清楚了，公开表明，美国是假和平、真备战。但是，从肯尼迪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十年以前就说过，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是防御还是进攻呢？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防御不是进攻。当然，如果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削弱了，帝国主义觉得有机可乘，它会是进攻的。如果我们的阵营是牢不可破的，是巩固的，强大的，它就会是防御的了。所以，马尼拉条约[2]也好，中央条约组织[3]也好，北大西洋公约[4]也好，都是防御性质的。肯尼迪最近在联大的讲话就是带防御性的。他承认核战争不能打，他说要么核武器结束人类，要么人类结束核武器。他这种讲法，当然有讹诈的一面，但是也不能不产生另外的影响，因为他的讲话，他本国人民首先读到，这就不能不影响美国人民。前些年，美国的国防部长福莱斯特不就是因为害怕核武器战争而跳楼自杀了吗？肯尼迪在联大的演说

这是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原载《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说了一连串骗人的话，他说要停止核武器试验，要全面裁军等等，但同时他又要搞有限战争。西柏林弹丸之地，美国非占不可，对老挝也在争。这是因为它把中间地带看做是自己的防线。毛主席说，美国的这种做法，是想把我们社会主义阵营“钙化”起来。这当然是它的梦想。我们说它对社会主义阵营是防御的，当然，并不排除它可能冒险。帝国主义终归是帝国主义，总有一批冒险分子，想在战争中找出路，尽管世界在变，但是他们却仍然想走老路。美帝国主义有冒险性，也有软弱性，我们必须认清它的两面性。美国的软弱性，是由于人民的力量大于统治阶级的力量，而且在某些技术方面美国落后于苏联。杜勒斯[5]搞边缘政策，打到边缘就不敢再打了。肯尼迪比杜勒斯进了一步，要打局部战争，但是世界舆论一反对，国内人民一反对，就停一下，这说明美帝的软弱。

当前世界局势的第三个特点，是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五年就说过：如果原子弹发展起来，许多国家都有了，原子武器战争就打不起来。这次蒙哥马利[6]在中国访问期间，曾向我说：如果核武器不是由少数国家垄断，大家都搞，核战争就打不起来了。他还问我们核武器到底什么时候能搞出来。我说大家都在搞，我们当然也要搞。如果能够禁止核武器，我们很高兴，但是在禁止之前，我们还是要搞的。至于什么时候搞出来，我回答他：日子很难算，你也很清楚，这不是下个命令就能限期搞出来的。但是我们总是要搞的。现在美国要和苏联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议，美国的盟国法国就不听它那一套，跟它闹别扭，因为法国不是核俱乐部的成员。现在日本、西德在搞，印度也要搞。大家都搞，核武器战争的可能性就小了。美国有人说，可以搞一种干净的核武器，将来打起来，只杀伤人，物质仍然存在。这是笑话。人不存在了，垄断资本家剥削谁呢？怎样取得超额利润呢？谁来创造剩余价值呢？垄断资本家也要计算计算。因此，搞核武器的国家越多，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就越大，推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就越增长。打世界大战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核武器战争，一种是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战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禁止使用毒气一样。现在看起来，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因此，我们有争取一定时间进行和平建设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努力争取。

肯尼迪上台后主张打有限战争，这一点同杜勒斯不同，杜勒斯认为局部战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肯尼迪则宣传局部战争有可能避免世界大战。阿尔及利亚打了几年[7]，到现在也没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在台湾、老挝、古巴都试过了，确实没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炮声在世界上从未间断过，但是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肯尼迪政府主张打有限战争，是为了增加美国的军火输出，为了刺激军火生产，为了扩大军事条约。不管它找出多少理由来说明有限战争如何对它有利，但是有限战争的结果总是壮大了人民力量，削弱了帝国主义力量。因为局部战争总是在中间地带[8]打，将来也可能发生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间接的局部战争。在刚果、阿尔及利亚、老挝和古巴都发生过或正在打局部战争，这些地方都是中间地带。中间地带受到局部战争的破坏，人民就要起来反抗。因此，局部战争总是要削弱帝国主义力量，增强人民革命斗争力量。老挝的局部战争，结果是谁的力量发展了？还不是爱国战线党的力量发展了？苏发努冯[9]逃出来的时候，泰国战斗部队只有一个营，那时如果美国不发动局部战争，美国的影响可能大得多。但是，美国发动了局部战争，结果壮大了爱国战线党的力量。不仅如此，在

东南亚还壮大了南越人民革命斗争的力量。肯尼迪现在着急了，这怨谁呢？还不是他自己造成的？

总起来说，当前世界局势的特点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在世界各国人民，五大矛盾的解决在于四种力量的汇合；

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是防御的：不排除帝国主义可能冒险，同时又要看到它的软弱；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推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长，但有限战争即局部战争却不可避免。

注 释

[1]肯尼迪（一九一七～一九六三），美国民主党人。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八日当选为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在竞选中遇刺身亡。

[2]马尼拉条约，参见本书《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一文注[12]。

[3]中央条约组织，原称巴格达条约，即伊拉克同土耳其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的《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同年相继加入，美国也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巴格达条约组织是西亚地区性的军事联盟组织。条约的主要内容是：缔约国为了“安全和防御应进行合作”；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任何盟员国或“积极关心本地区的安全和平”的国家得加入本公约；在有四国成为本公约缔约国时，即成立常设理事会等。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伊拉克宣布退出。同年八月改名为中央条约组织。美国又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的常设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三月，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先后宣布退出。根据同年四月美、英、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四国代表的决定，该组织于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解散。

[4]北大西洋公约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美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葡萄牙、加拿大、丹麦、挪威、冰岛等国在华盛顿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实行“集体防御”；任何缔约国同他国发生战争时，必须给予援助，包括使用武力。一九四九年八月条约生效时，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先设在伦敦、巴黎，一九六七年迁至布鲁塞尔。土耳其和希腊于一九五二年，联邦德国于一九五五年，西班牙于一九八二年先后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

[5]杜勒斯，参见本书《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一文注[7]。

[6]蒙哥马利（一八八七～一九七六），英国前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子爵。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曾两次访问中国。

[7]这里指阿尔及利亚人民为反对法国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发动武装起义起，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三日正式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先后进行了近八年的民族解放战争。

[8]中间地带指二次大战结束后一段时期内，介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极其辽阔的地带。这个地带分为：第一中间地带，包括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第二中间地带，包括欧洲、大洋洲、日本、加拿大等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

[9]苏发努冯，一九一九年生，前老挝副国王汶孔亲王之子。一九五六年任老挝爱国战线主席，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任第一次联合政府公共工程和经

济计划大臣。一九五九年七月被捕，一九六一年越狱回到桑怒解放区。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家主席、最高人民议会主席。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 (一九六一年十月九日)

辛亥革命[1]，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在这里，我们向当时为中国革命事业披荆斩棘、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行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下发生的。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杰出的民主主义者，他在这次革命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在这里，我们向孙中山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

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旧式的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它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说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孙中山先生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能够通过革命实践，吸收经验教训，使自己的思想不断地向前发展和进步。在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产生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不顾反动势力的阻挠，毅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采取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是一个伟大的不朽的功绩。

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蒋介石叛变了孙中山先生，叛变了革命。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高举革命的大旗，同一切忠于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人们团结一起，同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一切革命力量团结一起，把中国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了长期的艰苦的奋斗，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作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不仅完成了辛亥革命的英雄们未完成的事业，实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许多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而且已经使我们这样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伟大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

我国人民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新生活。我们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的国家正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注 释

[1] 辛亥革命，参见本书《革命救国论》一文注[10]。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节录。全文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人民日报》。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

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结果像同志们所说的，他就会准备两本帐，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如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从现在起，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1]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

鼓真劲。有的劲就不是真劲。像你们所说的两个工厂，一个厂踏踏实实地干，说他“没劲”，“冷冷清清”，一个厂在那里造假，却说他是“轰轰烈烈”。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毛泽东同志说，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因为有上游，你才争上游。主观能动性要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我们提倡鼓干劲，不是鼓假劲，而是鼓真劲。鼓干劲也要实事求是，有的就是鼓假劲。比如有的提倡苦干几天几夜，过年也不休息。你在那里鼓劲，他就苦战，你走了，劲也没有了，他照样休息，照样过年。

做实事。做了实事，就有实效，否则强迫命令，就会搞一些不实在的东西。这几年《人民日报》宣传了许多不恰当的口号，如拔白旗^[2]等，他们已经做了检讨。我在这几年也开过几次大会，发了不少奖状，如果表扬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奖状”摔掉。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做实事，收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句成语，毛泽东同志做了新的解释，它代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要调查研究得好确实是不容易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浮夸风气，不易一下子改变过来。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乡，开始群众不敢讲真话，有人封锁了真相。我也曾到一个地方搞调查，去之前，先派了办公室的同志去，后来发现反映的材料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昨天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当然这一层不是一道墙，是一张纸。你们也都是老革命了，参加革命都有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你们鼓掌，我心里就不安。现在造成的这种形

这是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讲话的第四个问题：检讨的目的。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势，一定要改变，下决心改变。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

我们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在战争年代，军队讲民主，就能打胜仗。规模最大的是解放战争，那时军队也最讲民主，仗怎么打法，作战方案怎么定，允许连队讨论，提出意见。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创造，也是全军的创造。军队能够讲民主，为什么党内不能讲民主呢？我以为要按党章办事。少奇同志在七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小平同志在八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都讲到党内民主生活问题，但这儿年有的同志把它搁到一边去了。

当然有些事情是中央带的头。比如开电话会议，是中央先开的，以后一层一层开下去，电话会议又无法讨论，只能层层下压，这是不对的。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的修改党章报告，对党内民主生活都有过说明。乱斗行吗？不行。

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随便捕人、打人，都是不行的。

当然有些是属于违法乱纪性质的，这不只是党内问题了。

违犯了国家法律的，要按国法处理。

我们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尽快恢复起来，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要恢复起来，现在被搁在一边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通都要恢复起来。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

注 释

[1] 魏征（五八〇～六四三），唐初政治家。唐太宗在位时，任谏议大夫和秘书监等职。他敢于直言进谏，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2] 在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过程中，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右倾保守思想”的反面人物，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作法叫做“拔白旗”。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为在“拔白旗”、“反右倾”等运动中被错误地批判和处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

论知识分子问题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

这几年，特别是近两年，从事科学工作和戏剧创作的同志很勤劳，很辛苦。虽然生活供应差，工作条件受到限制，甚至精神上也有些不愉快，但在科学工作、戏剧创作方面仍然取得了显著成绩，值得庆贺。我特别要向你们致敬。

今天能有机会和全国高级的优秀的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戏剧写作者聚在一起谈一谈，对我个人来说是很高兴的事。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谈一个问题：知识分子问题。

这个问题也包括我在内，我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谈起来会更亲切些。

一 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

这个问题在党内部分干部中常常有不同的解释，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些疑惑。现在尽我的能力作个初步解释，不能担保今天讲的都是成熟的，如讲得不恰当就改正。

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在奴隶社会为奴隶主服务，在封建社会为地主阶级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服务。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时，知识分子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很少；只有剥削阶级才有条件求得知识，求得更高的知识。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常常容易接受并传播剥削阶级的旧观点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但总是唯心主义占上风。在旧社会，也会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能预见到真理，敢于反抗当时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和压迫，为新兴的进步的阶级说话，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敢于反抗当时的统治阶级，投入到新的阶级队伍中来，为新的阶级说话。他们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投降了进步的阶级。欧洲文艺复兴[1]时期，中国从鸦片战争[2]到辛亥革命[3]，都有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传播新的思想、新的学说。这些知识分子同样也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迫害，遭受反动知识分子的歧视和压迫。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处在统治地位，知识分子才转变到为人民服务。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又培养出了新的知识分子，两者结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现在还存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差别。将来到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和党派消灭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消灭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差别也就不存在了。以上讲的是一般情况，是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说的。

资本主义后期产生了殖民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亚洲、非洲、拉

这是对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的讲话。同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阐明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广大地区的知识分子，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他们大多数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的卖国贼、民族叛徒以及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豢养的走狗，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就连受外国欺压的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或先或后地站到了反帝爱国的立场上。所以毛主席再三地说，我们要团结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来反对帝国主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具体地说，是指工人、农民、进步的知识分子、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进步的民主人士（有一些还是封建阶级出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属于这种特定范围的社会阶层。

二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

中国什么时候有知识分子？讲起来很远，远在奴隶社会就有。这是属于郭老[4]、范文澜[5]等历史学家们研究的问题。我只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

（一）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无疑地都受到帝国主义、反动统治阶级的种种影响。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是封建家庭出身，头上留过辫子。存在决定意识，怎么能没有影响？

（二）我们曾为旧社会服务，纵然不是为北洋军阀[6]或国民党直接服务，也是为旧社会服务，不能说没有受旧社会的影响。

（三）我们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甚至一部分人还受过封建教育，如上塾馆，拜过“天地君亲师”[7]，磕过头，手心挨过打，罚过跪，封建教育嘛！不过现在也还有些用处，知道些诗云子曰。解放后我去天津，回到曾读过书的南开中学，第一句话就说：“我在这里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但是也要感谢，当时对我有启蒙作用。”受到资产阶级教育，不能光说不好，它对我也有启发。这样说才全面一点。

这三条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根”，这种“根”，不能否认。

还是以我为例。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为什么这样罗嗦呢？因为我的亲兄弟、堂兄弟都是绍兴人，我不能不说原籍是绍兴，否则就有企图摆脱这种关系的嫌疑。我生在淮安，祖父当过淮安县知事，外祖父是淮阴县知事，现在还有家属在淮安，如果我不说生在淮安，和他们的历史关系也无法交代清楚。一个人的历史关系要交代清楚，这样没有坏处。不管现在情况如何，不能抹掉过去的历史。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革命知识分子了，但写历史不能把过去那一段抹掉。毛主席很不满意有人写他的传记时，说他从小就懂得很多，什么都知道。毛主席说他小时候还烧过香。我小时候也迷信过菩萨，后来还相信过无政府主义[8]。五四运动[9]时，我们组织了觉悟社[10]。后来有人问邓颖超[11]：那时你们是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她回答说：还不能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是研究新思潮的一个组织。我们的社员有研究无政府主义的，有研究基尔特社会主义[12]的，也有研究共产主义的。以后有不少人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青年人不了解，以为这样说太谦虚了，其实历史是发展的，个人也是发展的。一九二二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13]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14]和张申府[15]，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16]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

克思、弗洛伊德[17]、爱因斯坦[18]的思想熔于一炉。

总之，有一点要肯定，大家是从旧社会来的，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时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直接为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真正成为他们的工具压迫人民的只是少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如此，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都是没有前途的。溥杰[19]过去到日本留学过，有什么作为？还是新中国改造了他，才有了用。他的叔父载涛[20]过去做过军谘大臣，不如现在当人大代表，可以为人民服务。在我们这里有不同等第的人，沈衡老[21]是进士公，黄任老[22]是举人公，董老[23]是秀才公，还有翰林公[24]。秀才、举人、进士、翰林都有。过去想做点事业，可是做不成，有什么办法？北洋军阀时代的李根源[25]是我的“同行”，当过国务总理，能为国家民族做什么有益的事？国民党时代的行政院长翁文灏[26]回来了，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当时跟他们走有什么出路？死心塌地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胡适[27]，直到了结生命，还是没有出路。反过来，历史的发展证明，知识分子只有同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同共产党一道前进才有出路。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证明了这一点。

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解放前，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讲过。解放后，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也讲过，他说：“无产阶级只有同广大的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的群众结成联盟，才能形成最大多数人对于反动阶级的专政。”我们是团结全国的最大多数人，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是最大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剥削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专政。他还引用列宁的话：“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是为最终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而成立的联盟。”[28]列宁在对“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的说明中包括了知识分子。这是讲的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中国又扩大了联盟，一直扩大到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任务，要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政治上的联盟。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同非劳动者的联盟。坚持这两种联盟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和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统一战线中将长期起作用，对知识分子的估计要以这个力纲。这一点，党内不少干部常常不注意，解释不清楚。无产阶级根据这个既要同其他劳动者结成联盟又要同非劳动者结成联盟的方针，就提出了一个改造的任务。

（一）无产阶级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天下没有完人，觉悟程度是逐步提高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要经常进行自我改造。无产阶级有自己的阶级本性，反抗剥削压迫，思想先进，但要发展成为有高度觉悟性、战斗性、组织性的阶级，也要进行自我改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在一个社

会里，不能不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而且还有封建的影响。所以，无产阶级、共产党要不断消除自己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把旧的东西剔除掉。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在延安整风[29]时，毛主席就首先要求党内进行学习和改造。

（二）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这主要是对农民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说的。改造什么呢？改造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使他们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观点。要求农民同农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作斗争，要求知识分子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习惯势力。这样，才能使他们和无产阶级一道建设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建设共产主义。

（三）无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在经济上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从加工定货到定股[30]定息[31]，进而取消定息，消灭其阶级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思想上则要改变其阶级立场和观点。这要经过长期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目的是要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也是我们的同盟者，但是属于另外一个方面的同盟者。

总起来说，无产阶级对其他劳动者或非劳动者的改造，是为了最后消灭阶级和阶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到那时，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都不存在了。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中间要经过许多阶段。

两种联盟的矛盾性质不一样。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同非劳动者之间还存在着对抗性矛盾的一面。无产阶级要消灭资产阶级，不是对抗性的吗？但我们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采取的是赎买的政策，而不是没收的办法，对农民则是逐步引导他们从个体所有制进入集体所有制，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采取说服、教育、示范、提高的办法。同样，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也要经过长期的过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互相学习，逐步接近，才能逐步消除的。这样看，我们同知识分子的联盟与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有根本区别的。

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有上述的发展过程，使得他们也有两重性：一方面是脑力劳动者，可以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党和国家有必要与可能对他们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知识分子也有必要与可能摆脱旧社会的影响，成为适应新社会需要的知识分子。所以说，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也是知识分子本身的根本任务。

根据这样的方针和自我改造的任务，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一九五六年我曾作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初步估计。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也说，“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到一九五七年六月才发表，那时已有右派进攻[32]，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原来的分析。他说：“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

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很清楚的。

从一九五七年到现在，知识分子受到了锻炼和考验，特别是最近两年，全国人民除少数反动分子外都经住了这种考验。我们一方面在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在工作中也出现了偏差和错误，加上三年来农村灾荒，粮食和经济作物减产，城市工业生产也有些下降，市场物资供应减少，物价部分上涨，实际工资有所下降。这种情况还要持续一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同工人、农民一样经得起考验。我们不能说没有人对这种情况有意见，意见是应该有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关心提出改进意见，希望情况有所改善。只有极少数人幸灾乐祸。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热爱祖国的。科学工作会议的《简报》我都看了。《简报》上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大家努力工作，生活上克服困难，甚至遇到心情下怎么舒畅的事情还能克制自己。你们热爱祖国，使我们很受感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中国人民是从民族苦难的日子里熬出来的。在座的有的是经过几个朝代的人，看到了民族解放，人民胜利了，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经受了困难，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从《简报》中还看到大家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不能不使我高兴。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知识分子队伍壮大了，从老一辈知识分子手里培养出了新一代知识分子，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都培养出了新的力量。饮水思源，是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起了作用，也是知识界共同努力的结果。青年人的成长是老一辈亲手培养的，这一点要很好地向青年人讲清楚。从老知识分子身上找毛病是很容易的，但要看主导方面，要看到各有所长。比如我讲话可能不如青年人讲得流利，但是谈问题、论经验则比他们深些。如果说要互相尊重，首先要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尊重老年知识分子。老年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些人加入了党，这是可喜的现象。

但是，十二年当中，甚至很长时期内，总有一小部分人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保持原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拒绝改造甚至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些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是右派。毛主席对民主党派领导人曾经讲过，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做“梁上君子”[33]，这部分知识分子应该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这才有出路。这话是有所指的，是在一九五七年五一前后说的，但是到六月，右派还是进攻。当时反击是必要的，但这决不会动摇我们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决不会改变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这些认识不清楚。

在知识分子内，也和党内一样有左、中、右。任何党派、社会团体内都有左、中、右，这是规律，是客观存在。左、中、右或者说进步、中间、保守，他们之间也会相互转化，保守可以转向进步、中间，中间、进步也会变成保守。但是有些部门和机关用左、中、右去排队就不好了，人的思想状态是会变化的，政治思想、主张经常有变化，特别是对科学上生产上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同，不属于政治思想的分野，更不能用左、中、右去划分。如在建设工作中，有个时期说高指标是正确的，低指标是保守的，这是不对的，现在钢的产量定在一千万吨以下，这不是保守，不是右倾，这样可以搞得扎实些，对建设更为有利。指标能高就高，该低就低，不能拿这些来作政治分野。

就是对一小部分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不进行反党反

社会主义活动，我们在政治上还是把他们算在联盟之内，对他们进行教育。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则作别论，那就是反革命，就是犯法了。对右派，还要给他们工作，还要容纳在统一战线之内，有的还在政协嘛。我们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能改造的改造过来，不能改造的孤立起来。

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发展过程应有的认识。党没有低估知识分子的作用，党的政策是明确的。知识分子也应心安理得地知道自己的作用。

三 如何团结知识分子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现在看来，毛主席这段话仍然是击中要害的，完全适合当前的情况。如何团结知识分子，应该根据毛主席的这段话去做。

首先谈一谈我们党能否领导一切。一九五七年以后，党对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进一步确立了。知识分子承认和接受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的胜利，也是知识分子的光荣。必须肯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党能够领导一切。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领导一切？什么是一切？这个问题正在逐步解决。我们已经制定科学工作十四条[34]、高等教育六十条[35]、工矿企业七十条[36]，文艺方面也提出了几个初稿[37]。关于党如何进行领导，存在着各种想法。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中央领导下提出一套办法来，征求党外朋友的意见。

下面我谈谈关于党的领导方面的问题。

第一，党的领导范围。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人家熟悉，要信任他们。如果他们做不好，可以检查，有意见可以讲，但党委的意见不一定都是对的。如果什么都管，连发戏票、导演戏都去管，结果忙得很，反而把大事丢掉了。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机构。

第二，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党员个人怎么能领导？一个单位的个别党员，怎么能说他就是党的领导？党章没有规定党员有这样的权利，实际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尤其是一些年轻党员，应该向有经验的知识分子学习。我们过去在广州搞革命时，少年气盛，有点“乱指挥”，这种不好的传统不要学。要学毛主席好的传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不管是谁。如果把我下放到剧团，虽然我也曾演过戏，现在必定是个蹩脚的演员，只有向人家虚心学习，哪能领导？我们到下层单位最怕听“请指示”。就有这样的党员，人家请他指示，他就俨然以领导者自居，摆出领导者姿态，发号施令。这是最坏的官僚主义者。要平等待人才是好勤务员，才不是官僚主义者。

第三，上下级要有区别。例如一个学校，党的领导是指学校党委领导，有些事情学校党委也不能解决，要请示上级党委决定。至于支部，如系支部、

剧团支部、车间支部，只是起保证监督作用，不是指挥，下命令还得要行政首长才行。

第四，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决定。行政上的事由行政决定，书记也无必要去干涉。

第五，外行领导内行要有个范围。以前我们讲过外行能领导内行，这是讲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党委书记、委员有些不懂专业，但可以超脱专业，看到全局，通过党委集体研究作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决定或贯彻上级指示的决议。我们说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对业务确实不懂嘛。外行变成内行，要经过学习，就是学会了，也要尊重专家，尊重群众意见。有些同志说，科学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群众运动，这个说法比较恰当。科学研究不是靠突击和群众运动能解决问题的。

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我以为有六个问题要解决好。

第一，信任他们。他们承认和接受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服务，愿意自我改造，党就要信任他们。你信任他，他也就信任你，彼此有了信任，就可以团结在一起工作。

第二，帮助他们。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需要党的帮助，以诚心诚意的态度去帮助他们，对工作才有好处。

第三，改善关系。过去关系不好的，应该改善，先从党委、党员方面做起，先检查自己，不能只责备人家。检查了自己就能引起共鸣。党的具体政策你在执行中有偏差和错误的，要作检查。党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要通过党员和党组织实现。

党内有些术语不合适，每次看到心里就不安，如在一些登记表上分“党员”、“群众”。这两个词不是同一组概念，党员、非党员才是同一组的概念。党员也是群众中的一员，包括领导人在内，不能自居于群众之上。“党员”、“群众”的分类，使党员居于群众之外、群众之上。我们犯官僚主义，一方面由于自己脱离群众忙于事务，另一方面是别人把我们封锁起来。我们也很苦。希望领导同志要自觉，不要把自己置于群众之外，不要被封锁。

第四，要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使人感到诚意不够。问题能够解决的，一定要解决。现在问题成堆，不能一下都解决。科学工作会议的《简报》，快出到五十期了，其中提到的有些问题不可能马上都解决，但要负起责任来，力求逐步解决。

第五，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对于党与非党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会上有些意见批评得很对。各级领导要以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党内我已道过歉，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再作个总的道歉。

第六，承认了错误还要改。只承认错误，不去改正，还是空话。凡是党和政府方面犯的 error 都要改正。改要有实际行动。

以上六个问题要解决好。

四 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

（一）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都要自我改造。改造有性质上和程度上的不同。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改造，是带有强迫性的，

这与人民内部通过劳动、生产、学习进行的改造有性质上的不同。人民内部的改造，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性质上的不同。旧东西多的多改，旧东西少的少改，去掉坏的影响。

（二）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把资产阶级世界观转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需要一个过程。首先是爱祖国，进一步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更进一步接受党的领导，逐步改变旧的立场和思想体系。就是长期在党内锻炼的同志，无产阶级世界观也不见得那么巩固。

（三）改造靠自觉。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

（四）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帮助人不能给人“上大课”，知识分子最怕别人给他“上大课”，要促膝谈心。

（五）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任何共产党员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帮助人家，首先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六）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事物总是有矛盾的，有矛盾就能促进事物发展，如果停止发展，就会灭亡。

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现在大家肚里有气，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帮助不够，要把这个扣子解开。毛主席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过去科学、文艺工作方面成绩是主要的，希望今后要不断改进，取得更大的成就。

注 释

[1]文艺复兴是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欧洲部分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的条件下，思想和文化范围内发生的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大变革。十六世纪资产阶级史学家认为它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复兴，所以称为“文艺复兴”。这个时期表现在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教育方面的人文主义思想，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反对中古的宗教桎梏；冲击了腐朽的封建文化，在当时历史上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文艺复兴为近代文学、艺术、教育、哲学和实验科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2]鸦片战争是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资本主义的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从十八世纪末期起，英国把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一八三八年底清政府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州禁烟。一八三九年六月林则徐下令当众销毁从英、美等国不法商人手中缴获的鸦片二百三十多万斤。一八四〇年，英国借口保护通商，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在战争中动摇妥协，只有部分军队和人民群众奋起抵抗侵略者。英军除先后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骚扰并入侵外，又攻占吴淞，闯进长江，直逼南京，迫使清政府在一八四二年八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3] 辛亥革命，参见本书《革命救国论》一文注[10]。

[4] 郭老即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

[5] 范文澜（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浙江绍兴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6] 北洋军阀，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

[7] 我国封建社会传统教育以“天地君亲师”五者为人类至尊，所以并举表示崇敬的意思。

[8] 无政府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蒲鲁东、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它否认任何国家和政权，否认任何权力和权威，鼓吹绝对自由、极端民主，主张建立一个“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青年中曾有过较大的影响。一些地方先后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最初它们也表现过某些反帝反封建的意思，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些曾经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青年转而信奉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则愈来愈趋于反动。

[9] 五四运动，参见本书《革命救国论》一文注[13]。

[10] 觉悟社是一九一九年九月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的进步青年学生团体。成员有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等二十余人。主要活动是出版《觉悟》杂志，讨论研究新思潮，抨击孔孟之道，积极领导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九二二年冬，觉悟社社员分散各地，社的活动无形停顿。以后，它的主要成员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1] 邓颖超，一九〇四年生，河南光山人。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在天津和周恩来等一起组织觉悟社。下面引用邓颖超的一段话，是一九四九年她回答《中国青年》杂志记者提问时说的。参见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国青年》第七期上的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一文。

[12] 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称行会社会主义（基尔特是英文“行会”一词的音译），是二十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是潘蒂、柯尔等。他们主张一个社会应设立两个平行的组织：一个是由工人、工程师等按行业联合组成的产业基尔特，领导和管理生产。一个是作为消费者的组织的国家，负责产品分配和保证全民消费。他们幻想等到基尔特发展到包括全体人民时，就可以和平地代替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实现社会主义。

[13] 费边社会主义是以英国费边社的主张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费边社是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八八四年创立的团体，以善于等待时机、实行拖延缓进战术著称的古罗马统帅费边命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维伯夫妇、肖伯纳等。他们以为用温和缓进的办法，通过细小的改良就能使资本主义制度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14] 刘清扬（一八九四～一九七七），天津人。一九二一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后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八年进入华北解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一九六一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5]张申府，一八九三年生，河北献县人。一九二一年去法国、德国留学。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任广东大学教授兼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二五年脱离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任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16] 罗素（一八七二~一九七〇），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〇年曾来中国讲学，在旧中国学术界有相当影响。

[17]弗洛伊德（一八五六~一九三九），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18]爱因斯坦（一八七九~一九五五），犹太人，出生于德国乌尔姆城，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创建的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19]溥杰即爱新觉罗·溥杰，一九〇七年生，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弟。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四年先后三次留学日本，曾任伪满宫廷侍从武官等职。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一九五〇年八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特赦释放。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20] 载涛（一八八七~一九七〇），清末曾任军谘大臣。一九六一年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21]沈衡老即沈钧儒（一八七五~一九六三），号衡山，浙江嘉兴人。清末曾考中进士。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后在上海任律师。抗战前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抗战期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

[22] 黄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字任之，上海川沙人。清末曾考中举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七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一九四〇年底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五年底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

[23]董老即董必武（一八八六~一九七五），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清末曾考中秀才。他早年是同盟会会员，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二年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24]陈叔老即陈叔通。（一八七六~一九六六），浙江杭州人。曾是清末翰林。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一九二七年后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抗日战争时期，支持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参加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从事反蒋民主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会主任委员等职。

[25]李根源（一八七九~一九六五），云南腾越（今腾冲）人。一九

五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云南省军政府军政部总长兼参议院议长，在一九一八年护法战争中被推为驻粤滇军总司令。一九二三年在北洋政府农商总长任内兼署过国务总理。

[26]翁文灏（一八八九～一九七一），浙江鄞县人。地质学家。一九四八年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不久辞职赴法。一九五一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27]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一七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宣扬实用主义哲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主张文学改革，提倡白话文。一九一九年七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随后追随蒋介石，反对人民革命运动。一九三八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一九四六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四九年去美国，后到台湾。

[28]见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34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9]延安整风，参见本书《建设与团结》一文注[11]。

[30]定股是指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对原来私营企业的资产和负债，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情理、估价，以核定私股股额。

[31]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资本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一）。定息从一九五六年起支付，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

[32]指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党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

[33]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中以及后来的一些场合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曾引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参见《左传·僖公十四年》）和“梁上君子”（参见《后汉书·陈宣传》）作比喻，说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那几张旧“皮”已经不存在了，因此他们不能不依附在公有制这张新“皮”上，即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不能像“梁上君子”（原意指躲藏在梁上的小偷，这里是借用）那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34]科学工作十四条即一九六一年六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同年七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中央批准这个草案的批语中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氏，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草案就正确

理解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的要求，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明确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出成果，出人才），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改进研究机构中党的领导方法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规定。中央认为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

[35]高等教育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后三年多高等教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针对当时学校教学质量降低，忽视知识分子作用以及劳动过多等主要问题，规定了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以及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

[36]工矿企业七十条即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有七十条。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由于许多企业没有实行严格的责任制，不讲究经济核算，工资、奖励制度上存在平均主义，以及党委包揽企业的日常行政事务等等，相当普遍地出现了生产秩序混乱、瞎指挥、乱操作，设备损坏严重，经济效果很差等问题。针对这些情况，工业七十条草案明确规定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和基本任务，要求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强调计划管理、按劳分配、企业经济效果和职工物质利益等项原则。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和试行，对于总结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贯彻执行当时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促进我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7]文艺方面也提出了几个初稿，指《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的初稿及《关于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剧院（团）十条”）、《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三十二条”）。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在政治、经济领域“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文艺工作也产生了不少缺点和错误，一些文艺领导部门、文艺工作单位和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没有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一些文学创作和艺术活动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批评、限制和不适当的干涉。为纠正这些偏向，在党中央以及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由中宣部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文化部起草了“剧院（团）十条”和“电影三十二条”。“文艺十条”经过充分讨论修改，最后改定为“文艺八条”，于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由中共中央批转，以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名义正式下达全国。文艺八条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加强团结，继续改造；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剧院（团）十条”和“电影三十二条”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只作为草案，分别于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和十一月十三日印发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及有关艺术单位征求意见并先予试行。这三个文艺文件的贯彻，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学习雷锋
(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

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注 释

[1]雷锋(一九四一年~一九六二)，湖南长沙县简家塘(今属望城)人。一九六一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一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班长。一九六二因公殉职。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随后在全国广泛开展了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

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我们中国人办外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

(一) 要等待, 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当双方争执不下时, 强加于人反而容易坏事, 最好的办法是等待对方自己觉悟。主席阁下同我讲过, 埃叙合并为阿联[1], 当时是有错误的, 后来又分裂了。现在再搞统一, 已经接受了过去的教训。这说明, 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纳赛尔总统在埃叙分裂时采取的态度, 我们很欣赏, 表明纳赛尔总统吸取了经验。

(二) 决不开第一枪。人家可以完对我不好, 我们决不会先对人家不好。

(三) 中国有句古话, “来而不往, 非礼也”。你对我不好, 欺侮我, 逼得我不得不有所准备, 要进行回击。否则, 就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欺。

(四) “退避三舍”。这就是说, 你来, 我先退, 给你警告。再来, 再退, 再给警告, 但事不过三。退为的是给对方以考虑的时间。这时候, 将发生两种可能: 一种是有远见的人会考虑, 这不是软弱可欺, 应该谨慎; 另一种是有人可能视我可欺, 逼我到墙角, 我只好还击。其实, 我们早已用这种做法来对付美国了。例如抗美援朝[2]。当时, 我们发表政府声明[3], 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4], 进逼鸭绿江, 否则, 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 我们再次警告[5]。除这两次公开警告, 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 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 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 一直进逼鸭绿江, 逼我们到墙角, 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去年轮到印度身上[6], 它却忘记了这条经验, 竟也以为我们的忍让是软弱可欺。我可以告诉阁下, 只要印度不挑衅, 我们决不主动出击, 即使印度挑衅, 我们也一定像我致班达拉奈克夫人[7]信中提到的那样, 在行使我们自卫权利以前, 先通知他们[8]。

我们中国人办事, 就是根据这样一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 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 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

注 释

[1] 阿联, 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一九五八年由埃及同叙利亚合并组成。一九六一年叙利亚脱离阿联, 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九七一年阿联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2] 抗美援朝, 参见本书《抗美援朝, 保卫和平》一文注[1]。

[3] 指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日, 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报告中, 针对美国在朝鲜进行的侵略战争所讲的一段话。

[4] 三八线, 参见本书《抗美援朝, 保卫和平》一文注[3]。

[5]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英、澳等国授权美国侵略整个朝鲜的提案发表声明, 严厉谴责美军大规模越过三八线, 再次警告美国政府: 中国人民对于美国及其帮凶国家侵略朝鲜的严重状态和扩大战争的危险趋势不能置之不理, 侵略者要对他们疯狂行为的一切后果负责。

[6] 一九五九年八月，由于印度军队侵入中国西藏的朗久而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印边境的第一次武装冲突。至一九六二年十月，印度军队先后在中印边界西段和东段越过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建立军事据点，不断进行军事挑衅。中国政府多次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建议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均遭拒绝。同年十月，印军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实行自卫还击，击退了印军的入侵。为了进一步谋求中印边界问题和平解决，中国政府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发表声明，宣布从次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从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从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中国政府还主动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度人员，交还战斗中缴获的武器。到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后撤计划。

[7]班夫人指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一九一六年生。当时任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九日，周恩来总理复信班达拉奈克夫人，同意她在适当的时候公布科伦坡会议的建议，同时表示中国政府原则上接受以科伦坡会议建议作为中印官员会晤的初步基础，并衷心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导致中印双方就稳定停火，脱离接触和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开始直接谈判。

[8]指为促进和平解决中印边境冲突而举行科伦坡会议的锡兰（今斯里兰卡）、柬埔寨、缅甸、埃及、印度尼西亚、加纳等亚非六国。

反对官僚主义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

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

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反对官僚主义，也就必须联系到反对这些主义。当然，不单单是这七种，但这七种特别突出。

官僚主义有各种表现，我现在把它分开来说。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党的路线、政策再好，如果执行的业务部门给阻塞住了，那就是把党和群众隔开了。所以我把这种官僚主义列为第一种。这种官僚主义是领导者尤其是高级领导者必须时时警惕的。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一个人站在领导地位，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这种思想并且在作风中表现出来，就危险了。这种人大概总是不去抓业务，觉得我是领导政治的，人家的话听不进去，觉得琐碎，也不研究人家讲话的内容，结果就蛮横专断，瞎乱指挥。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常有人说：“我做个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好像这种官僚主义还能容许似的。我看，这种官僚主义也要批判。如果是普通干部，忙忙碌碌，有时方向不大清楚，那还可以谅解。如果是领导干部，怎么能容许他是事务主义者呢？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这是顿顶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

这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关于反对官僚主义部分的要点。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凡是机关大而人多的地方，必定要出官僚主义，这几乎成为规律了。那里的领导人即使精明强干，也会有官僚主义。因为那个机关本来不需要那么大，机构搞得那么臃肿，一定会有很多人不办事情，吵吵嚷嚷，很多事情在那里兜圈子，办不出去。把机关搞小，有事情一商量就解决第十二种，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

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

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

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发展到这个程度，就严重得很了。一个干部、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革命的热情，要有朝气、有干劲。革命热情一衰退，政治上就要蜕化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

我举了这么多种官僚主义，分析不一定很科学，也不是说在一个机关中所有各种官僚主义都已经发生。但是，必须看到，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在我们领导干部中，官僚主义严重的虽然是少数，然而，正如党中央三月一日的指示[1]上所说，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

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注 释

[1]指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我们为什么反对
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一九六三年九月五日)

(一)

目前，美国又用三国条约[1]同苏联联在一起，几个大国垄断核武器。大气层核试验本来就已经停止了，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反对，事实上它们已经不需要大气层该试验了。为什么？因为主要的资料它们已得到了，除此以外，其他的统统保留。也就是说，允许使用核武器，允许地下核试验，允许继续生产，允许大量储存，允许向外输送扩散，允许美国把制造核武器的资料给它的盟国和受它控制的国家。本来这些事全世界人民都反对，都要求全面禁止核试验，彻底销毁核武器。签订三国条约，除了大气层核试验暂时不搞外，其他统统合法化。凡是在条约上签字的国家都受条约的束缚，这就等于凡是签了字的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没有拥有核武器的权利，但仍要遭受核讹诈和被核武器毁灭的危险，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的盟国仍然可以得到核武器和生产核武器所需要的资料。如美国对法国说，你不用在大气层试验了，我可以给你资料，你可以变成一个核大国。这点它们三国都承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国，美国说要在这些国家中组织多边核力量，使每个国家都得到核武器。三国条约没有禁止这些，而只是把我们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手脚束缚起来，它们却可以更肆无忌惮地进行核讹诈。可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这个权利，因为苏联已经承担了义务。英美取得这么大的让步才签了字，这还不是欺骗！签字后，美国马上就说话了，从肯尼迪[2]、腊斯克[3]、哈里曼[4]、麦克纳马拉[5]、副国防部长、各军种参谋长，直到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有一系列的发言。中心问题是说，这个条约并不禁止美国使用核武器，不禁止继续生产核武器，不禁止储存核武器，不禁止把核武器输出给盟国和它控制的国家，并且还要扩大地下核试验。果然，八月五日签字后就进行了三次地下核试验。美国副国防部长说，要把地下核试验的范围扩大，凡是禁止的核试验都要尽可能地在地下进行，还要增加国防经费，为生产核武器建立更多的核基地，还准备在需要时恢复大气层核试验，并公开指定在太平洋建立大气层核试验场地。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这怎么能不增加核战争的危险呢？世界和平不但没有得到保障，而且受到了更大的威胁。过去世界人民反对这些。现在变成凡是签字的国家都不能反对。首先苏联不开腔，因为它是签字国。签字后仅一个月，美国就更嚣张，从来没有这样过。英国不说话，因为它是美国的追随者。但苏联是对立的国家，它也一样不开腔。美国更自由了，继续进行核讹诈，却把我们爱好和平国家的手足束缚起来，所以我们反对。

(二)

为什么不全面禁止核试验呢？他们说要分步骤走。听起来好听，但这是骗人的。签字以后美国如此嚣张，哪有什么全面禁止的意图。既不算打，

这是同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的谈话节录。原载《周恩来外交文选》。

又不肯禁止，目的何在呢？目的是拿这个进行核讹诈。对谁呢？对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特别是弱小国家，亚、非和拉美国家。办法有两个：一是听话，签字，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一是不听话，它就用核武器来对你进行讹诈，因为你没有。如果你不签字，它就说你好战，是“战争贩子”。你们看，中国什么地方有战争的气氛？世界上还是有一些讲事实的人，西方资产阶级的报纸也有说真话的，说找不到中国人的文章和讲话表明中国要发动核战争，造成世界一半人口的死亡。不仅法国、日本、北欧、英国有说真话的，甚至美国也有。这很有趣。苏联说我们是这样的好战，西方说不是这样，难道西方对我们特别好？不是。西方是利用中苏矛盾。我们不上西方的当，不受挑拨。我们得出结论，三国条约是一个大骗局，它不是禁止核武器的第一步，而是很危险的一步。

（三）

我曾给各国政府首脑一封关于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信，并提出四项具体措施。

一、撤除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包括核基地；撤回在国外的一切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二、建立包括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和沿太平洋地区的无核武器区，建立中欧无核武器区，建立非洲无核武器区，建立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每一个无核武器区都承担相应的义务。

三、不以任何形式输出和输入核武器和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资料。

四、停止一切核试验，包括地下核试验在内。

（四）

至于是否可以在免除核威胁方面采取什么步骤，我们同非洲的朋友和一些非洲国家的首脑谈过，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步骤，就是非洲可以要求各大国保证，承认非洲为无核武器区。世界上有两个地方可能首先建立无核武器区，一个是非洲，一个是拉丁美洲。应该把这些地区变成不能使用、不能试验、不能制造、不能储存、不能扩散核武器的地区。这几件事情能够全部做到。因为非洲的主要任务是民族独立，发展经济，哪有力量搞核武器？只要求别人不进来，法国不来试验，美国不来建立基地，不搞核讹诈，要求核大国来保证，也要求可能制造核武器的国家如西德、日本来保证。如果说，中国能制造核武器的话，中国也愿意承担义务做出这种保证。各国首脑如果同意，这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非洲提出这个建议，中国首先同意。

这是对核大国的考验。拉丁美洲也可以这样做。他们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没有力量制造核武器，他们也在为民族独立和完全的经济独立而斗争，包括古巴在内。苏联向古巴运进了核武器，后来又从古巴撤出了核武器，还不如把拉美保持为无核武器地区更好。首先让美国和几个大国保证。如果非洲和拉美建立无核区，那就等于五亿人免除了核威胁。这样，你们首先得到了安全。如果大国同意，对这两个洲的国家都很有利，你们可以很快地取得独立，并发展自己的经济，让大国在军备竞赛中增加负担，你们可以真正得到安全。没有核讹诈，民族运动就更容易搞了。

注 释

[1] 三国条约指《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由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草签，八月五日在莫斯科正式签字。主要内容是：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包括领海或公海）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但并不禁止在地下进行核试验。三国企图以此巩固核大国的垄断地位，限制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条约签订后，美、苏频繁进行地下核试验，继续进行核军备竞赛。

[2] 肯尼迪，参见本书《当前世界局势的特点》一文注[1]。

[3] 腊斯克，一九一九年生，美国民主党人。当时任美国国务卿。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代表美国在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

[4] 哈里曼指威廉·艾夫里尔·哈里曼，一八九一年生，美国民主党人。当时任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一九六三年七月以美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英、苏三国禁止核试验谈判。

[5] 麦克纳马拉，一九一六年生，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国防部长。

关于中法建交问题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富尔(以下简称富):法国元首戴高乐将军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他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由于两国间没有外交关系,过去只是有一些来访的人带回去一些零星的消息,因此,戴高乐将军要我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他认为,我这次访华的使命不宜公开。这并不是想掩盖他对中国的感情,而是因为一旦公开出去,报界就会大做文章,那就不能安安静静地深入讨论问题。不过,此次访华还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戴高乐将军有一封亲笔信给我,信中授权我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

(富尔念信,并将副本递交周总理)

我来中国的任务是进行接触,没有一个特定的问题作为会谈的中心。因为长期以来两国没有接触,现在应该恢复接触。正如戴高乐将军在信中所说,会谈将涉及各个方面。这就是说,不仅是经济、文化方面,而且涉及政治方面。因此,他选择了一个政治家来中国。我了解戴高乐将军在很多问题上的想法,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我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向戴高乐将军报告。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以看出,法国很注意如何增进中法两国的关系。我们一向有这种愿望,阁下上次来华时,我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但是,当时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我们愿意等待,并做些推动工作。这几年,戴高乐将军当政,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有些大国可能不高兴。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应该如此,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因为一个国家的事务只能由这个国家自己解决。

法国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阿尔及利亚问题,已经根据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的意志得到解决,法国承认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想必你还记得,上次我们谈过这个问题,我也同孟戴斯-弗朗斯[1]谈过,觉得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可以通过和平谈判求得有利于双方的解决。结果还是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法国解决了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件好事。我们很重视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另外,阁下可能也有兴趣,那就是莫斯科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2],你们没有签字,我们也反对。可能双方看法不尽一致,我们虽然并未交换过意见,但表现出来的行动是一样的。因此,世界舆论,特别是某些大国,把中法两国拉在一起。实际上我们两国事先没有进行任何商谈,也没有任何默契,而且两国社会制度完全不同。这件事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任何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只要彼此没有互相侵犯的意图,并且互相尊重主权和独立,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即使两国没有正式往来,即使你们还继续承认台湾蒋介石集团而尚未承认中国人民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我们的行动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共同性,我们都要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不愿受任何外国的干涉和侵犯,我们都赞成在国际上应该维护世界和平,不允许几个大国垄断世界事务,因为这样不能维护世界和平,反而会增

这是同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的谈话节录。原载《周恩来外交文选》。

加战争危险。只有世界所有国家取得平等地位，大家都有权过问世界事务，才能真正达成协议，才能真正维护世界和平。

好，我就开这个头，请你谈谈，不受拘束。

富：我很注意地听了总理的谈话。首先你谈到法国的独立的政策。戴高乐将军对此很重视。你知道他一直很关心这个问题，即使在抵抗运动时期[3]，法国很弱，戴高乐将军仍然要保持法国政策的独立性。现在法国的政策完全独立自主，我们同某些国家有防御性的联盟关系，但这只在遇到侵略的时候才起作用，因而是有限的。除此以外，法国在政治上是完全自由的，可以独立处理问题。戴高乐将军对此非常注意，来华前他在同我谈话时也提到，要我就这个问题向你们作一些说明。

第二点，总理提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我还记得上次的谈话。先是孟戴斯-弗朗斯，接着是我自己，让摩洛哥、突尼斯独立。总理知道，阿尔及利亚问题比摩洛哥、突尼斯问题复杂得多。在这个问题上，戴高乐将军具有历史性的远见。这是一贯的。一九三九年戴高乐将军主张抗德，一九四四年他试图同苏联接近。一九五八年他开始实行全部非殖民化政策，现在法国已经不再有任何殖民关系，他不阻止过去法属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阿尔及利亚就是一例。

至于莫斯科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我们两国所处的地位相同，两国都有能力建立核力量。正如戴高乐将军比喻的那样，三国条约等于劝告一些疲惫不堪的人不要去游泳横渡英伦海峡。一些像微生物那样小的国家，根本不可能有原子弹，但是签了字，就说这是胜利，可笑之至。

周：勇敢的柬埔寨，国家虽小，但也没有签字。

富：是的，有些国家没有签字。正如总理所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些不同的看法，但主要方面是一致的。在策略上我们都拒绝签字，但我们承认必须进行裁军以维护和平，而莫斯科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则同裁军无关。有些意识形态和历史方面的问题，我不想详细谈。法国是第一个进行大革命的国家，法国所遇到的问题不同于中国。法国大革命时，还未达到工业化，马列主义也还没有。而你们革命时，需要打倒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外国干涉三大敌人。如果你们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避免外国重新干涉中国。这是我自己对历史的解释。两国情况不同，法国很早就推翻了封建主义，没有外国干涉，只有民族资本主义。此外，法国的经济和制度正在向温和的社会主义发展，很多部门国有化了，很多地方有农业合作社，国家能全部掌握财政、金融、货币。美国就不是这样，在美国，如果没有得到大银行的同意，政府不能采取任何措施。

现在谈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保持同蒋介石的关系。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不正常的，而且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不愿意像一个商人那样谈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要提出来，因为目前的局面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但是这种局面是不正常的，是奇怪的，因此，我们愿意同你们交换意见。上次来中国时谈过这个问题，当时的结论是：时机尚未成熟，需要等待。同时，那时我也没有受法国最高当局的委托来谈这个问题。从那时以来，情况变了，现在可以根据各自的看法来研究这个问题。戴高乐将军的信中用了“各个方面”这个字眼，因此，我们可以全面研究两国关系。如果现在建立正式关系还有困难，可以研究如何发展现存的关系。我这次访华表明了加强两国关系的愿望。因为两国长期未接触，

不能带来各方面的具体问题。总之，无论中国或是法国都没有迫切的利害问题要解决，但双方都愿意会谈。因此，根据戴高乐将军的指示，采取现在这种办法，对外是私人访问，准备在中国停留足够的时间，即两星期。希望总理考虑我刚才提到的问题。希望见毛主席、刘主席，请总理安排。会谈的方式也请总理决定。

周：我了解你的意思。可以不只谈一次，可以谈几次，自由交换各种意见。除了你要我考虑的问题外，今天还想问一个问题。中法建立正式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一个困难。我想了解一下，除了这个困难，还有什么困难？上次我说过，我们可以等待，要解决总要有个合理的办法。

富：坦白地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不考虑台湾问题，我们愿意建立正式关系。这是戴高乐将军授权我表示的态度。作一点个人的解释，作为你的朋友，我认为总统是以勇敢的精神、历史的眼光来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作出这个决定一定会受到苏、美的指责，只有像他这样的历史人物、政治人物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没有自私的利益。要恢复关系，必须使这种做法不使中国为难。如果法国同中国建立正式关系，要避免过去复杂的办法，交换大使的作法是很正常的。这种事情应该使中国愉快，而不是使中国为难，应该是对中国表示友好，而不是使中国难堪。你们方面，在戴高乐将军采取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时，也不要加强使他不愉快或丢脸的条件。在世界舆论面前，中法关系的恢复不能被看作是一项交易，而是友谊的表现。我个人认为，直到现在还不能利用这些条件是很可惜的。明确的说，我访华的直接目的不在此，我的任务是开始接触，讨论各种问题。但如你们有此愿望，我们愿意作有利的答复。

周：第一句是戴高乐将军的话，其余是你的解释。如果我记得不错，法国政府过去曾经表示，承认中国要经过国际协商，要西方一致。

富：总统授权我说，如果你们愿意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愿意作有利的答复。这就是说，我们不从自己的利益提出问题，也不必管其他国家的意见，愿意考虑。我个人意见，我们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戴高乐将军的想法是要迎合你们的意见。如果你们表示意愿，我有权表示法国的意愿。

周：可能我对你上面的谈话没有了解确切。你刚才谈要照顾两点，第一点是法国同新中国建交不能不考虑到苏、美的态度。

富：不，我只是说，如果总统这样做，势必引起苏、美指责，借此证明总统作出的决定是有历史意义的。

周：这也是客观事实。

富：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要征求苏、美的意见，自己可以作出决定。我认为总统这种决定是勇敢的，因为要受到某些国家的指责。希望总统这种立场能使我们达成协议。协议不要包含使你们为难或不满意的条件。

周：第二点是，也不要使法国为难或丢脸。对这两点，我说一说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态度很清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像英国、荷兰，双方都不大愉快。英、荷承认中国十三年，但同中国一直是半建交的关系，没有互换大使。因为英、荷一方面承认新中国，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集团，这使双方都不大愉快。与其如此，不如等待。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法国认为采取勇敢的行动，断绝同蒋帮的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我们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交换大使。这是友谊的表现，而不是交易。我愿意说明，如果阁下、戴高乐将军觉得时机尚未成熟，还有困

难，我们愿意等待。

富：你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不成问题，我们不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要么交换大使，要么维持现状。第二个是台湾问题，希望知道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如果承认中国，法国在联合国支持中国席位将是合乎逻辑的。台湾问题则是个微妙的问题。我们的想法不是迁就“两个中国”的主张，如果法国承认中国，那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会涉及一些同台湾的关系的程序和措施问题。法国应该如何做，希望了解中国方面的意见。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岛上存在着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而且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在战时他同蒋介石站在一边，不愿意突然切断关系。

周：这就困难了。蒋介石集团是被中国人民推翻和赶走的，这是中国人民的意志表现的结果。首都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国人民选择的，并且已经存在十四年了。没有台湾，就没有蒋帮，而蒋帮之所以能留在台湾，完全是由于美国的庇护和对我国内政的干涉。全世界人民都清楚。蒋帮之所以还留在联合国，还作为安理会成员，也是由于美国的操纵，这是现实的也将是历史的笑话。

说到法国过去在反法西斯时期同蒋介石的关系，这应该从国家关系来说，而不应该从个人关系来说。德国占领法国时，成立了贝当傀儡政权[4]。法国抵抗运动受到了戴高乐将军的支持和领导。当时中国是蒋介石当权，同戴高乐将军站在一边是自然的，当时任何中国政府都会这样做。现在蒋介石被推翻了，新中国政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所以世界上不少国家承认了新中国。英国、荷兰在承认新中国方面说是西欧国家中最早的，英、荷两国没有蒋介石的代表，因此本国没有出现“两个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蒋介石代表中国同代表法国抵抗运动的戴高乐将军有关系，也同英国保守党政府有关系，这是历史上的问题，不能把个人关系掺杂到国家关系中来。反过来说，如果法国处在中国的地位，将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现在法国是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如果外国势力在法国本土以外扶植一个反戴高乐将军的傀儡政权，说这是法国政府，法国对此采取什么态度呢？比方说，这个傀儡政权同中国有关系，那么中国要承认法国也只能承认戴高乐将军的政府，而不能承认傀儡政权。你们不存在这种情况，但你们可以设想一下。我可以举出一个不存在的甚至是可笑的设想。孟戴斯—弗朗斯领导过法国，日内瓦会议[5]上我们合作得很好，据知他同戴高乐将军的关系是好的。假如说，他反对戴高乐将军，在外国势力的扶植下，成立反对派政权，我们不能因为一度同他合作得很好，而承认他这个外国势力扶植下的政权，不承认法国现政府。还可以举一个更可笑的设想。皮杜尔[6]是反对戴高乐的，如果他在外国势力扶植下成立流亡政府，中国是否能因为一度与他有关系，就不承认法国现政府，而承认这个流亡政府或者两个都承认。你一定说这个设想很可笑。法国是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和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何况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一百多年的国家，现在美国还占领着台湾，欺侮和干涉我们。

现在世界各国同中国的关系有三种类型，也许还会出现第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不仅在国家关系上承认中国，而且在联合国支持中国，可以交换大使，社会主义国家如此，不少亚非国家和拉美的古巴是如此，北欧四国和瑞士也是如此。第二种类型，英国、荷兰，同中国建立半外交关系。第三种类型，像法国同中国现在的关系，法国愿意促进同中国的关系，但由于在台

湾问题上有困难，还未能建立正式关系。日本的情况类似，但不能说同法国一样，因为现在日本受美国控制，不像法国那样，是一个独立的、维护主权和拒绝外国干涉的国家。还可能产生第四种类型。刚才所说的第三种类型，与其长期等待，不如促进关系。台湾问题解决以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但可以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如先设立贸易代表机构，半官方的、民间的都可以。这个问题请阁下考虑。

富：回到开头谈的问题，如果能够找到建交的办法，要找前进的办法，不要先前进一步，又后退一步。如果其他问题都解决了，只剩下台湾问题不能解决，可以讨论贸易机构问题。总之，我的意思是：第一，先讨论建交、交换大使，台湾问题应如何处理。第二，如台湾问题不能解决，不能建交，可以考虑设立贸易机构。无论如何，这些问题都可以研究，我们可以研究各种方案，正因为如此，我们将采取秘密讨论的形式。因为如果消息传出去，说法国提出要求，中国拒绝了，或者是相反的情况，这都不好。可以考虑两种方案：第一，如何交换大使，也许在台湾问题上有困难，我不知道戴高乐将军在这个问题上最后会作出什么决定。

周：中国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不会改变的，即使不叫“中华民国”，叫台湾政府，也不能接受。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最近在日本召开的奥运会上，蒋介石要用中华民国的名义参加，国际奥委会只准他用台湾名义参加，蒋介石拒绝参加。蒋介石也说台湾同大陆的关系是内政问题。这就是说，他承认他听挑起的内战至今尚未结束，直到今天，他还是这样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意见一致，只有美国不同意。现在我再举一个恰当的例子，美国南北战争[7]的时候，有林肯[8]政府，有南方政府[9]，世界各国只能承认一个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两个。我们认为台湾同大陆的关系是内政问题，这一点不能动摇。上次已经谈过，你是了解的，希望不会有什么误解。

富：我的意愿不是推动中国同法国建立使中国不愉快的外交关系，如果没有台湾问题上的困难，我们准备建交。明确地说，我们有可能现在就在建交问题上取得协议，也许还要等待一个时期。戴高乐将军知道你们的全部看法以后，有可能作出完全符合你们意愿的决定，也许戴高乐认为要等待一个时期，再交换大使。但在这方面应该作出安排，时机成熟时就可以实行。因此要详细了解你们的意见。第二个方案，在建交前能做些什么，我可以把这方面的各种可能性报告戴高乐。今天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排除英国式的解决办法。如果我们要采取行动。那就交换大使，如果要发展经济、文化关系，我们可以研究最好的办法，如派遣常驻机构，政府的或者民间的。

周：是贸易机构吗？

富：可以包括经济、文化、交换大学生等。你们如何考虑第一个方案？如果明天法国承认中国，可能台湾主动同法绝交，这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困难的是我们不能肯定蒋介石会采取什么态度。

周：对，他不是一个人，背后有美国。

富：如果明天法国承认中国，法国需要通知台湾。如果台湾不作任何表示，照中国的想法，法国应该撤回驻台湾的人员。这样，你们会完全满意，但法国为难，因为这是突如其来的，不愉快的措施。戴高乐没有授权我表示这样的态度，但我想征求你们的意见，中法建交后，可否在台湾保留一个人，降低级别。

周：这不可能。英国承认中国政府为唯一的合法代表，在英国没有蒋介石的代表，但是英国在台湾有领事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所以造成目前的半建交状况。如果法国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对双方都不愉快。

富：困难的是这种情况已经延续了十三年，如果法国没有蒋介石的代表，可以承认新中国，不承认台湾。你们提出的理由都对，而十三年前同现在的情况一样。这就是说，法国在十三年前就犯了一次错误。我个人很愿意承认这次错误，但作为一个大国，很难承认这种错误。我愿意同你们共同找出一个办法，使法国不致对过去的错误表示忏悔。

周：第二个方案呢？

富：像你所建议的那样，在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之前，比较全面地发展两国关系，建立贸易机构。

周：今天就谈到这里，关于两国关系，我们初步交换了意见，以后还可以继续谈，也可以谈其他问题。

注 释

[1]孟戴斯—弗朗斯(一九一七~一九八二)法国前总理，激进社会党领袖。一九五四年六月至一九五五年二月曾组织政府。

[2]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参见本书《我们为什么反对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一文注[1]。

[3]抵抗运动时期指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法国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占领的斗争时期。

[4]贝当傀儡政权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权。亨利·菲利普·贝当(一八五六~一九五一)原是法兰西共和国内阁总理。一九四一年投降纳粹德国，组织“法兰西国家”，出任国家首脑。一九四五年八月法国解放后，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

[5]日内瓦会议，参见本书《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1]。

[6]皮杜尔指乔治·皮杜尔(一八九九~一九八三)，法国前总理，人民共和党领袖。一九四六年六月至十一月、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六年六月曾两度组织政府。多次任外交部长。

[7]美国南北战争也称美国内战，是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由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代表北部资产阶级利益的联邦政府总统林肯颁布了《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并采取其他民主措施，激发了工人、农民和黑人的革命斗志，因而联邦政府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经过这次战争，美国的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8]林肯指阿伯拉罕·林肯(一八〇九~一八六五)，美国共和党人，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五年期间任美国总统。他领导了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颁布了著名的《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这里引用的林肯的话，一般译为政府应该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参见林肯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说》(《林肯选集》，第239~240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9]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部十一个州脱离联邦政府、另立代表奴隶主利益的政府，通称南方政府。一八六五年四月这个政府在战败后结束。

关于非洲国家的独立问题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六日)

我们对非洲总的印象是，那里存在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大好形势，非洲人民迫切要求建设自己的国家。同亚洲相比，非洲的觉醒迟了一步。但是。在二次大战后，特别是在万隆会议[1]以后，非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自觉性空前提高，都要求站起来。当时，参加万隆会议的非洲国家仅有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可是，万隆会议在整个非洲的影响却很深。作为亚洲国家的成员，中国代表团在非洲受到很热烈的欢迎。非洲人民对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人民的印象是，认为亚洲比非洲先走一步，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增强自卫能力等方面，亚洲是他们的榜样。亚洲和非洲人民之间存在着兄弟的友谊、战斗的友谊、革命的友谊，休戚相关。当然。我们相信在拉丁美洲人民中也会有这种情绪，但我们没去过，不好说。

在非洲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受所谓西方文明压迫和剥削了四五个世纪的非洲人民比亚洲人民受到的苦难更多更深。举例来说，恩克鲁玛[2]总统现在住的城堡是过去英国总督住的。城堡建筑在海滩上，是十五世纪时葡萄牙殖民者开始修的，后来接着修建的是西班牙、荷兰。最后是英国。他们修这样的城堡干什么用呢？就是作为掠夺、贩卖黑奴的滩头阵地。西方殖民者通过收买当地酋长，用酒、布换人，把黑人当货物，贩运、骗往美洲。像这样的滩头阵地，从西非海岸的摩洛哥，沿海岸直到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每百十公里一个。这种城堡，就是为了在黑人反抗时进行镇压而修建的。据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3]的统计，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由于殖民者贩卖黑人，非洲损失了一亿左右人口。西方殖民者为什么要掠夺这么多的劳动力呢？因为居住在美洲的印第安人反抗殖民者，殖民者就将他们消灭殆尽，剩下一点跑到山上去了。西方资本主义不仅压迫、剥削本国人民，而且基本上消灭了美洲土人，奴役了非洲人，剥削了亚洲人。陈毅副总理为此做了一首词[4]，其中有一句就是“两洲血”，两洲指的是非洲和美洲。因此，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在非洲人民中印象最坏，一听到就讨厌，这已经变成了非洲的民族感情。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西方殖民者在非洲先贩卖黑人，后掠夺农产品、黄金、钻石和各种矿产，这些原料大部运往欧洲，他们从沿海起逐渐深入内地。到十九世纪末，西方各国发生争吵，结果开了会议[5]，他们不顾民族情况，瓜分非洲，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外，其他国家都被瓜分。因此，许多非洲国家的国界都像刀切的一样，是直线的。这次杜尔[6]总统对我们说，亚洲是在根据民族系统形成国家以后，西方殖民者才入侵的，因而他们不得不照顾当时的实际情况。而非洲就不一样，许多国家是人为划分的，不是按民族系统划分的。现在独立了，又不能不按西方殖民者人为划分的国家独立，否则各民族就会争吵不休，这些后是有道理的，如几内亚、葡属几内亚[7]、塞拉勒窝内[8]和利比里亚都是一个民族，却分成四个国家。马里也是如此，西边的塞内加尔、南边的象牙海岸[9]、北边的毛里塔尼亚的一部分都是同一民族，但都被法国分割。加纳、多哥、达荷美[10]也都是一个民族，但加纳被英国

这是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的会谈节录。原载《周恩来外交文选》。

占领，多哥和达荷美被法国占领。历史上，非洲有加纳帝国，存在了七八个世纪，后来又有马里帝国。这些帝国直到殖民者入侵后才瓦解。黑非洲的情况如此，北非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

因此，这里就有两个问题：第一，先按帝国主义划分的地区取得独立，然后，逐步争取全部非洲国家独立。已独立的国家要支持未独立的国家争取独立，最终要争取全部非洲国家的完全独立。如果不这样做，而要求依照民族系统独立，那就会纷争不已，正中帝国主义的诡计。对于这点，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首脑和人民都有觉悟，但有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的挑拨，发生边界纠纷。总之，要根据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首先是争取本国民族的独立。第二，争取非洲国家的统一和团结。非洲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愿望是并存的。关于这一点，这次我们访问非洲之后才了解。一九六三年五月，在埃塞俄比亚召开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上顺利地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争取非洲的统一和团结，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总口号是非殖民主义化。这个会议是成功的，这些原则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是相同的。

亚洲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日本发展得快，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还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中缅两国都受过它的侵略和压迫。日本属于西方国家的行列，当然它也是一个亚洲国家。非洲各国的发展也不平衡，但大体上是平衡的。北非稍发达一些，南非有些工业，东非、西非、中非落后一些。因此，它们的共同任务是要推翻殖民主义统治，建设自己的国家，建立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建立民族自卫武装，加速非洲统一。这次我们在非洲的讲话中就有一条是，支持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我们这些讲话，得到了非洲人民的支持。

非洲有两类国家，一类已经取得独立，一类尚未取得独立。在非洲有五十九个国家和地区，已独立的有三十四个，未独立的二十五个，现在只能这样分。

已独立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认识，即单是政治独立是不够的，还要求得经济独立。对于这一点，非洲有见识的首脑也认识到了。当前非洲还是贫穷落后的，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城镇过去是为殖民者享受建设的。既然这些地区如此落后，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否可能呢？

我们认为非洲遍地是宝，有广大未开垦的处女地。矿产虽被殖民者掠夺了一些，但大部未被开采，有石油、煤、铁等丰富的矿藏。撒哈拉的油田脉向四面伸延，科纳克里就在一个大铁矿上。煤少一些，但还未勘测。有色金属如铀、铬、铜都有，还有黄金、钻石，加纳原来就叫黄金海岸。这是地下资源。地上物产更多。缅甸出产的农产品那里都有，有些国家粮食能自给，如马里。蔬菜四季都有，冬季供给欧洲。水果产量最大，欧洲的热带水果大都是非洲运去的。还有枣类、木材等。畜产比亚洲多。马里四百七十万人，每人平均两头羊，一头牛。这样的水平，中国在本世纪内是办不到的。索马里每人平均一头半羊，两人一头牛。苏丹也是如此。总之，农、林、牧、渔资源都很丰富。非洲的面积比亚洲、美洲小，但比欧洲大，比中国大三倍多。人口仅两亿六千万，可耕地两亿公顷，比中国多一倍，每人平均的耕地也比中国多。现在他们耕作粗放，有的还刀耕火种。只要有水利灌溉，并稍加施肥，产量即可大增。经济作物有棉、烟、糖料、油料、麻等，苏丹在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交叉的三角地带种的棉花，是高产长纤维棉花。

只要非洲开发起来，农业发展起来，就能自给自足，从而打下可靠的国民经济基础，再逐步发展工业。未来的非洲一定是一个繁荣富强的非洲。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殖民主义者是无孔不入的，要彻底消灭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是长期的。因为他们的统治不仅在表面，而且还深入到非洲社会的各个方面。

要把非洲民族民主革命贯彻到底，还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建立民族自卫武装。殖民者培植自己的军队，并加以控制。本地人只能当兵，军官都为殖民者所掌握。英、法、比、葡殖民者都是如此。因此要保卫独立，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实行武装斗争的国家，这个问题解决得快一些，如阿尔及利亚、阿联。几内亚和马里已经赶走了法国军官。加纳正在斗争中，英国控制不了军队，就想控制警察。最近，在桑给巴尔[11]、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发生的事就是这样。在东非国家，英国不肯放弃对军队的控制。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三国首脑请英国军队回来，现在被动了。本月十二日非洲外长会议[12]决议建立非洲民族军队，看来还有一场斗争。我们这次推迟了对桑给巴尔、肯尼亚、坦噶尼喀、乌干达和布隆迪五个国家的访问，因为我们不能在英国军队保护这些国家的情况下去访问。布尔吉巴[13]总统和摩洛哥国王都对我说，要设法排除外国军事基地，突尼斯已收回比塞大，索马里赶走了英国军事教练。阿尔及利亚正在争取排除法国的导弹基地和海军基地。

第二，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民族的国家机器。一些国家虽然独立了，但国家机器仍在殖民者手里。这次纳赛尔[14]总统和萨布里[15]主席都同我谈过这个问题，纳赛尔在推翻法鲁克王朝[16]后，改组了旧的国家机器。

对于这个问题，非洲有见识的首脑，都如此认识。

第三，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除埃及古文化外，非洲一般的民族的文化比亚洲民族的文化更落后。殖民者不但不帮助，反而摧残民族文化，有的民族迄今没有文字，只有语言，因此只好用外文。亚洲值得欣慰的是，在殖民者入侵前就有了自己的文字。文字是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工具。阿拉伯国家的文字能一直流传下来，是有利于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也是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非洲各国首脑都已意识到这一点。当然，他们在过渡时期，还要借助于外文。这次我们去访问，各国都给我们看民族文化，从摩洛哥国王请我们吃的抓饭，到其他非洲国家的音乐、舞蹈，都是民族式的。

注 释

[1] 万隆会议，参见本书《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1]。

[2] 恩克鲁玛(一九一九~一九七二)，一九六〇年七月加纳共和国成立时，任第一任总统。一九六五年六月，再度当选总统。

[3] 杜波依斯(一八六八~一九六三)，美国黑人领袖、学者。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投身于美国和非洲黑人的解放运动。晚年加入加纳国籍。

[4] 陈毅副总理在一九六四年随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时，有感于非洲人民解放事业蓬勃发展填词一首，题为《满江红·黄金海岸》。其中有“惊世间残暴竟如斯，两洲血”句。

[5] 指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国家为瓜分非洲殖民地而召开的柏林会议。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一八八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根据德国首相俾斯麦的

倡议，在柏林举行有德、英、法、俄、美、比利时、意大利、奥匈、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瑞典、挪威、荷兰、土耳其等十五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建立“刚果自由邦”，承认刚果盆地“贸易自由”和刚果河、尼日尔河的“航行自由”，确定葡属安哥拉的边界，规定以后任何国家在非洲取得领地必须通知其他国家。这次会议成为西方殖民国家进一步瓜分非洲的新起点。

[6]杜尔指艾哈迈德·塞古·杜尔（一九二二～一九八四），当时任几内亚共和国总统。

[7]葡属几内亚即现在的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8]塞拉勒窝内是塞拉利昂的旧译名，即现在的塞拉利昂共和国。

[9]象牙海岸即现在的科特迪瓦共和国。

[10]达荷美即现在的贝宁共和国。

[11]桑给巴尔即桑给巴尔共和国；坦噶尼喀即坦噶尼喀共和国。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桑给巴尔与坦噶尼喀组成联合政府，同年十月二十九日改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2]非洲外长会议指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在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特别会议。会议讨论了东非局势、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边境争端、肯尼亚和索马里的领土纠纷等问题。会议建议以非洲独立国家的军队代替驻扎在坦噶尼喀的英国军队。

[13]布尔吉巴指哈比卜·布尔吉巴，一九 三年生，当时任突尼斯共和国总统。

[14]纳赛尔（一九一八～一九七 ），当时任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最高执行委员会主席、共和国总统。

[15]萨布里，一九二 年生，埃及前副总统。当时任埃及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九六三年四月曾来中国访问。

[16]法鲁克（一九二 ~一九六五），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末代国王。一九三六年四月其父死后继位，称法鲁克一世。一九五二年七月被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

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同日，中国政府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详细地阐明了中国对于核武器问题的立场。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之。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政府继续争取通过国际协商，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且为此，在自己的声明中，提出了以下建议，即：“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防止核战争，消灭核武器，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将得到贵国政府的有利考虑和积极响应。

这是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名义发出的致世界各国政府首脑的电报，发表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实现上述第一步任务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的工作做好了，再经过大约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可以有把握地使我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我们在今后发展国民经济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顺利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重要保证。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应该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

必须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工业的发展规模，要同农业可以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相适应。各行各业都应该面向农村，为农业服务。重工业部门应该首先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机械、化学肥料、农药、燃料、电力、水利灌溉设备和建筑材料，同时为轻工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原料、材料和设备。为了实现这个要求，进一步加快重工业首先是基础工业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

农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国家给以必要而又可能的财力、物力的支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

第二，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立足点。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从而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

各国人民之间的援助，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互助互利的。那种以“经济互助”为名，把别国的经济变成附庸，是大国沙文主义[1]的作法。国际合作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一个国家只有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才能更有力量去支援别国。而在援助别国的时候，又必须促进受援国家实现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方针。中国人民不是懒汉懦夫，过去没有、今后也决不会依赖别人过活。我们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同时，我们仍然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认真地加强对外援助，努力做出更大的国际主义贡献。

第三，实行技术革命。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大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

这是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部分中的一段话。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2] 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用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合。

第四，实行集中领导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领导群众运动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开展群众运动，也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这就是：要把任务交给群众讨论；开展比学赶帮竞赛；实行领导干部、专家、群众三结合；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要干劲十足。又要劳逸结合；对于群众的各种创造，必须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必须坚持党的阶级路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注 释

[1] 大国沙文主义，参见本书《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一文注[4]。

[2]从“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起的这一段话是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这个报告的草稿时增写的。

民族独立运动在不断高涨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这二十五年来，新的世界大战没有发生，原因之一的确是因为有了核武器，一场核大战不容易打。核武器越多的国家越害怕打。两个超级大国都在争取核优势，越争取开支就越大。尼克松在联合国提到美苏四个共同点[1]的时候，有两点就跟这个问题有关。继续搞军备竞赛，增加军事费用，垄断资本当然有利可图。但是结果怎样呢？只能使困难加剧，或者发动战争。如果发动该战争，自己的劳动力要损失，对方的劳动力也要损失。结果是剥削的对象少了，市场也小了。所以只能收缩，不能扩张。另一方面就是限制核竞赛，减少军事开支，至少停止增加。美苏核谈判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是他们自己也说，这不是几年能解决的。双方总想藏一手，以便取得优势，于是也就互不信任。所以军事开支还是减少不了，还会增加。军事开支增加，经济建设投资减少，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过去发生的经济危机有两种办法对付：一是紧缩经济，结果是失业增加，经济危机加剧。二是战争，但是核战争又不好打。怎么办？那就打局部战争。所以二十五年来局部战争没有断。二次大战后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打了三年半。那是一次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国民党先后动员了八百万军队，我们到后来增加到三百万。结果是美国失掉了中国。接着就是朝鲜战争[2]，美国动员了联合国十几个成员国参战[3]，最后还是不得不停战。美国人自己也说，那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拉丁美洲的问题很多，那是美国的后院，美国投资很大。苏联想插手，美国一凶，它就撤走了。在一九六二年，苏联本来可以叫美国从土耳其和以色列也撤走火箭部队，土耳其又是北大西洋公约[4]成员，但是它不敢。

另一方面，美国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基地遍及全球，局部战争没有停。在印度支那，如果美国的局部战争不停。战争会扩大。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战争扩大不一定是世界大战。仍然是局部战争。原因是大国不敢发动核战争。中东搞了三年，问题还要继续发展。

在局部战争中，只要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完全可以取胜。中国胜利了，古巴也独立了。在朝鲜至少可以算是将美帝打回到三八线[5]。印支三国如不发生别的情况，最终也将取得胜利。我们同印支三国的关系就是帮助它们，但不参加，除非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现在美国的空军有严格的命令，到距中国边界多少公里的地方就不能再前进。我们的工程兵和铁道兵在中越边境修公路和铁路，在老挝我们也修公路，美国很清楚地知道，但它就是不轰炸。像我何修建中巴两国之间的公路，美国也知道，但它也不提什么。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只要以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主，不听从超级大国的指挥，不论美国或苏联的干涉，都是要失败的。这样的国家虽然一时会遇到困难，但最终会胜利。现在世界的形势是两个超级大国自己找不到出路。尼克松上任两年，他的政策不断摇摆，说话不算数。苏联要解决经济困难，但解决不了。毛主席在五月二十日的庄严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

这是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会谈节录。原载《周恩来外交文选》。

要倾向是革命。”在这里，革命是广义的，包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这是更主要的。例如，拉美十多个国家发表声明，宣布二百海里内的捕鱼权，不许美国渔船入侵，进来就抓，这就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革命行动。它们扣了一二百条美国渔船，美国政府不得不从国库中拿钱交给渔业公司，由它们赎回这些船只。美国和苏联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会议上提出各国领海为十二海里，并提出水深超过二百米的海洋为公海，拉美国家不接受，它们也没办法。所以关键是依靠自己。如果全世界各国不分大小，都是依靠自己力量为主，抵抗超级大国的压迫、干涉和侵略，世界形势就会更好。许多国家同中国建交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个证明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建立了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受到柬埔寨人民的拥护。他们纷纷起来开展武装斗争。在不到十天之内就有近二十个国家承认，二十五年来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二次大战时，法西斯德国占领了法国，卖国贼贝当成立傀儡政府。戴高乐在伦敦成立革命委员会，没有几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大国，但是开始也没有几个国家承认，不用说十天，就是一年后也没有很多国家承认。巴基斯坦是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而柬埔寨不到十天就有近二十个国家承认了，这说明时代变了。

二次大战后，许多国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了民族独立国家。开始的时候，新殖民主义还起作用。现在经济上的新殖民主义仍然存在。但是民族独立运动正在一天天高涨，新殖民主义的作用正在一天天减弱。现在一些发达国家以武装力量作为后盾，要用新殖民主义的办法实行经济扩张。这种做法不合时代的潮流，就连它们本国人民的觉悟也在提高，不断起来反对它们。所以，看起来世界形势是紧张的，但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形势是在高涨的。

注 释

[1] 美国总统尼克松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联合国二十五周年庆祝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美国和苏联之间尽管存在深刻分歧，但有四大因素可以作为减少分歧共同合作的基础。这四点是：双方都不要核战争；双方都欢迎减少军事开支；双方都希望增加贸易和商业接触；双方都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挑战。

[2] 朝鲜战争，参见本书《抗美援朝，保卫和平》一文注[1]。

[3]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联合国军”的名义下，组织了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联邦、埃塞俄比亚、土耳其、希腊、菲律宾、泰国、哥伦比亚，连同美国在内共计十六个国家的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

[4] 北大西洋公约，参见本书《当前世界局势的特点》一文注[4]。

[5] 三八线，参见本书《抗美援朝，保卫和平》一文注[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二次大战结束不久，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了一篇反共反苏的演说[1]，想把西方以至整个世界动员起来一齐反苏，以此来维持大英帝国的统治。这篇演说在美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美国就利用这篇演说的调子，大搞反共反苏的宣传。当时就有一种论调，认为反苏战争很快就会爆发。毛主席看出了其中有问题，就叫别人写了一篇文章[2]，表示不同意说这场反苏运动就会导致反苏战争的爆发，指出，实际上美国是想拿反共反苏的宣传作烟幕，把美苏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统统霸占起来。战后二十六年来，并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但是在亚非拉这个第一中间地带，小的战争一直不断，其中首先发生的一个比较大的战争就是中国内战。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曾不可一世地称霸世界。哪儿人民要解放，它就派军队去镇压，它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派出很多军队。哪儿经济困难，要钱，它就给钱。它采用了两种方法：一个是马歇尔计划[3]，另一个就是投资。马歇尔计划的总数大约三百亿美元，而投资的总数更超过这个数目。结果怎么样呢？美国不仅在第一中间地带[4]，即亚、非、拉侵占了不少地方，对美苏以外的西方国家即第二中间地带，它的手也伸进去了。

今天的世界形势又是怎样的呢？今年七月六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作了一篇演讲，十月十六日英国首相希思在保守党年会上也作了结论性的讲话。这两篇讲话互相呼应。希思讲话的大概意思是：战后二十多年来，英国跟在美国后面跑，抛弃了欧洲，大英帝国终于衰落了，成为第二等的国家；现在英国应该回到欧洲，参加共同市场。结果，英国国会通过了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决议。在这以后，英法两国外长在伦敦会面，宣布英法合作，在西欧形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尼克松总统也不得不承认。

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讲话中说，战后二十六年来，美国地位这样下降，在战后初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苏联在战后也逐渐变成了超级大国，同美国争霸。在第二中间地带的西欧，又出现了一个共同市场，使欧洲工业发达的国家联合起来，同美国争霸。这是第三种力量。第四种力量是日本。我对许多美国朋友说过，是美国把日本养肥了的。日本的钢产量今年或到明年有可能接近或超过美国。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5]”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这一棒打中了中间地带，首先是打了日本，然后是西欧国家，同时也使整个西方世界受到影响。尼克松总统说，还有第五种力量，这就是中国，但他说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力量。希思也说了同样的话。我们承认，我们可以在几十年后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但我们声明，无论如何我们不做超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也不做。从整个世界来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的趋势。

这就是战后二十六年来世界局势的变化。

注 释

这是同英国作家马克斯韦尔的谈话节录。原载《周恩来外交文选》。

[1] 指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出“铁幕”的反共名词。宣称苏联用“铁幕”把东欧一些国家笼罩起来，共产党“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他主张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各个领域实行合作，加强实力，反对公开原子弹秘密，准备反共战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冷战”演说。

[2] 指陆定一撰写的、发表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四日和一月五日延安《解放日报》上的《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这篇文章曾经毛泽东多次修改。

[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由于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政治动荡，经济衰退。为了控制西欧和扩大国外市场，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的一次演说中，建议欧洲国家共同拟订一个“复兴”计划。由美国予以“援助”。七月，英、法、意等十六国在巴黎开会，决定接受马歇尔建议，成立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后改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提出“欧洲复兴方案”。由于方案是根据马歇尔的计划制订的，故又称为马歇尔计划，一九四八年四月杜鲁门总统签署美国《一九四八年经济合作法》（即《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后，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一九五一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执行这个计划。

[4] 第一中间地带，参见本书《当前世界局势的特点》一文注[8]。

[5] 尼克松自一九六九年就任美国总统后，面临着美国财政经济状况继续恶化的局面。当时，生产下降，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庞大，对外贸易连月出现逆差，美元地位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多次采取了应急措施，并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宣布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美国暂时停止外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兑换黄金，对进口商品增收百分之十的附加税，对援外金额减少百分之十，在国内冻结工资、房租和物价九十天。随后两年半，尼克松又分阶段实施对工资和物价的管制。这种政策是把美国日益恶化的财政经济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因而遭到西欧、日本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猛烈抨击和抵制。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十国集团”（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日本、意大利、加拿大、荷兰、比利时和瑞典）会议上，美国被迫同意将美元贬值，并取消百分之十的进口附加税。

中美友好来往的大门 终于打开了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首先，我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的美客人表示欢迎。

同时，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

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目前，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和缓紧张局势，已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强烈的愿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这种共同愿望，总有一天是要实现的。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中国政府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公开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这是我们一贯奉行的方针。我们注意到尼克松总统在来华前的讲话中也谈到，“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中日两国人民 应该世代友好下去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阁下应邀来我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我们感到高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对田中首相以及其他日本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两国间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和贸易关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不断发展。最近几年来，每年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人数超过其他国家朋友，中国同日本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贸易额也高过其他国家。这就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1]，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首相阁下，你来华前说，两国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也必须达成协议。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

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障碍。恢复中日邦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将为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扩大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开辟广阔的前景。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它将为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日本人民致意，并衷心祝愿日本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今天，中日两国领导人已开始就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谈。我们期望，我们的会谈将取得圆满的成功。

注 释

[1] 中国方面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

这是在欢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宴会上的祝酒词，发表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编者附记

为了学习和研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所撰写的大量政论文章，并纪念他生前对党的新闻工作者的长期指导和教诲，我多年来就想搜集发表于解放前和解放后各种报纸书刊上的周恩来文稿，编一本《周恩来政论选》。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熊复同志和金冲及同志的积极赞同和支持。现在，经过中央文献出版社和人民日报出版社同志们的辛勤工作，《周恩来政论选》终于同读者见面了。

关于周恩来同志从事政论活动的历史，关于他的政论活动同我党的战斗历程的密切联系，关于这些马克思主义政论文章构成了周恩来同志革命实践活动和革命理论活动的组成部分，关于周恩来政论所具有的风格特点，以及我们党报工作者从周恩来同志的政论活动中所获得的终生难忘的教益，熊复同志在序言中都作了精湛的扼要的论述。我在这里毋庸赘言。

需要说明的是：

一、周恩来同志在其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所发表的政论性的评论、文章、报告、声明、讲辞、书信等有数百篇之多，本书只从中选编了一百二十九篇，其中三分之一是选自解放后出版的报纸书刊，三分之二是选自解放前出版的报纸书刊，包括在海升出版的报刊。

二、所有政论都按当时发表的原文选录，但早期有些文章没有标点符号，或不符合现行的规范，我们按现行的规范加了标点符号。

三、早期文章中引用外国地名、人名或某些专用名词的中译名，改为现在通用的中译名。

四、为了便于阅读和研究，我们对大部分政论文章加了一些知识性的注释。凡从《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等书中选录的文章，均沿用该书原有的注释，其余的大量注释则为本书编者所加。

五、少数政论文章加了题解。

这是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报告全文发表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对本书的编辑及注释工作，有不妥之处，望读者予以指正。

本书在搜集文稿和选编过程中，得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北大图书馆和人民日报图书馆的大力协助，注释工作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协助，人民日报出版社白增华同志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吴少京同志为本书的文字编辑和注释工作花费了大量劳动，最后经请中央文献研究室赵春生同志费心审核了全部文稿，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崔 奇

1992年5月

